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 99 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gdsy_xbbjb@gd.gov.cn、
2001xb@126.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5.00 元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 任 方赛妹

副 主 任 鲁开垠 潘 清 杨应棉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赛妹 邓爱霞 冯颖红

张 山 杨应棉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鲁开垠

潘 清

主 编 潘 清

副 主 编 张 山 陈童敏

编辑部

主 任 张 山

副 主 任 余 伟 陈童敏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第二个结合”与“日用而不觉”理念的方法论意义……方绪银，林业强，姚大斌，梁秀秀 (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儒家“仁爱”思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邹陆林，蔡彩虹 (11)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民族精神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王 浩 (17)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石……王玉珍 (22)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毛泽东诗词的统战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兰 峻 (26)

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法宝……方 涵 (3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参政党民主监督与国家治理的耦合关系研究……张淑英 (38)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人才支撑体系的构建——以广清接合片区为例……

……彭秀林，祁先超 (43)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 新时代港澳青年国民教育比较研究..... 陈卓武 (48)
台湾统派的内涵及其团体的统一主张探析..... 林 伟，胡 时 (54)
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创新发展、经验及启示..... 梁 雯，夏 泉 (60)

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成果研究..... 何婉文 (66)
彰显人民政协制度优势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余 伟 (71)
实质－路径－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多维探析..... 宋 玉 (76)

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 导：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新形态..... 潘宏纹 (82)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一战线工作研究

- 新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研究..... 李婕颖 (88)

中华文化研究

- 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岳树梅，王婉清 (95)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探索..... 郭 嫒，卢楚婷 (101)
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研究..... 黄 鹏，梁辉荣，袁 彪，黄静瑜 (107)

Main Contents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s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daily use without awareness".....	
.....Fang Xuyin, Lin Yeqiang, Yao Dabin, Liang Xiuxiu (05)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Benevolence" Help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 Zou Lulin, Cai Caihong (11)	
The Generating Logic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pirit.....	
.....Wang Hao (17)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China's long-term stability	
.....Wang Yuzhen (22)	
The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Mao Zedong's Poetry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Lan Jun (26)	
The united front is a powerful magic weapon to realiz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ang Han (32)	
A Study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of Participating Partie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Zhang Shuying (38)	
The Construction of a Talent Support System for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aking the Guangqing Joint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an Example	
..... Peng Xiulin, Qi Xianchao (4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duc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Young Nationals in the New Era	
..... Chen Zhuowu (48)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aiwan Unification Faction and the Unity Proposition of Its Groups	
..... Lin Wei, Hu Shi (54)	
The Party'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ork in the New Era: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 Liang Wen, Xia Quan (60)	
Research on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Practic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He Wanwen (66)	
High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 Yu Wei (71)	
Essence Path Guarante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Empowering Social Governance	
..... Song Yu (76)	
Introduction: The New Theoretical Form of Marxist Religious View	
..... Pan Hongwen (82)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 and "Qing"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 Li Jieying (88)	
Strengthening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Firm Cultural Confidence	
..... Yue Shumei, Wang Wanqing (95)	
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People Centered Value Concept.....	
.....Guo Yuan , Lu Chuting (101)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 Huang Peng, Liang Huirong, Yuan Biao, Huang Jingyu (107)	

“第二个结合”与“日用而不觉”理念的方法论意义

方绪银，林业强，姚大斌，梁秀秀

（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第二个结合”中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两大要素。从他对“日用而不觉”的系列论述可以领悟到，这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念具有推进理论创新的方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见微知著立德树人的方法等三个方面的意义。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从“文化基因”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日用而不觉”之“道”的科学内涵。这从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时代精华。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用而不觉；文化基因；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4-0005-06

“日用而不觉”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的一段博大精深的名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觉，故君子之道鲜矣。”王阳明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之论，就是对这段话的最精炼的概括，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先秦思想家把人类文化与自然、社会的演化规律贯通起来的深刻思考，强调“道”的作用无所不在却难以把握，仁者、智者虽然各有所见但难免有失偏颇，百姓虽然“说不出个道道来”却总是体现在其“日用常行内”。注重深刻反思和准确把握老百姓赖以生存发展的“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及其所蕴含的“道”，是我国历代圣贤明哲创造和传承文化精华的一大法宝，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形成了“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的独特禀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等重要讲话中，至少有 10 次论及“日用而不觉”这个理念。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第二个结合”中所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两大要素。由此可见习近

收稿日期：2023-08-23

基金项目：2023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共产党人“心学”研究”阶段性成果（2023WTSCX286）

作者简介：方绪银（1962.2-），男，湖北利川市人，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广东茂名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二级巡视员，党史党建，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与方法；林业强（1966.10-），男，广东高州市人，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思想政治教育；姚大斌（1975.9-），男，湖北大悟县人，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梁秀秀（1981.7-），女，广东高州人，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平总书记对“日用而不觉”这个理念是何等的重视。综观这一系列精辟论述,我们不难领悟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视野里,“日用而不觉”这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念具有推进理论创新的方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见微知著立德树人的方法等三个方面的意义;同时,他还从“文化基因”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日用而不觉”之“觉”的科学内涵。

一、“文化基因”与“日用而不觉”之“觉”

习近平总书记的“日用而不觉”理念,并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从“文化基因”的视野来认识和阐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扬弃了这一传统理念中的“天赋论”或“先天论”色彩,具有颠扑不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有所认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学者福尔迈创立了“进化认识论”,他的代表作《进化认识论——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讨天赋认识结构》,以及舒里希的《心灵的自然史》、迪特福特的《精神并非从天降·我们意识的进化》、班内施的《心灵的起源》、洛伦施的《普遍的世界图景·进化与自然哲学》、李德尔的《认识的生物学·理性的种系进化史基础》等,对灵长类动物的精神现象的进化起源和人类“认识结构”的形成机制,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证(篇幅关系,在此不作引证),厘清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此为参考,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对“文化基因”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它是指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遗传本能的基础上,经过数百万年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同样具有可遗传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积淀),主要体现为人的情感模式、记忆力、理解力、意志力、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偏好等“日用而不觉”的独特禀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40 多次用到“文化基因”这个概念,是其论著中少见的“高频词”之一。他最早提到“文化基因”,是 2003 年在浙

江省委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之中。他当时着重阐述了“文化基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制问题,指出:只要遇上合适的社会环境,“文化基因”就好比种子一样,“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之后的系列论述中,他具体地揭示了“文化基因”、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文化精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基因”既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生活实践里,又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社会的公序良俗之中。后者是对前者的体悟、表达和传承,因而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换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及社会传承方式,才能使之始终具有令人喜闻乐见的永恒魅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在他的不同文本或语境里,“文化基因”概念有时指的是“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积淀”,有时指的则是已经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积淀”中感悟和提炼出的文化精华和文化理念,亦即是对“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之“觉”(传统心学称之为“悟道”)。注重对“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发掘、概括和传承、弘扬,是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一大特色。

“人猿相揖别”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历程已有长达数百万年,五千年的阶级社会与之相比,无疑是非常短暂的,因而在“文化基因”的“获得性遗传”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基因”的系列论述,主要从这个意义上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的深刻思考。各民族(族群)由于曾经在彼此隔绝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生存发展了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年,所形成的特质禀赋(“文化基因”)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文化基因”对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构成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长期生存发展于神州大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得以发展出最早、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最稳定的定居生活方式,为人口的聚集繁衍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积累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和条件,从而逐步形成了“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显著特点和规律,塑造

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生俱来”的特质禀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原创性概念,就是对这一特质禀赋的界定。他指出:“儒家创始人孔子……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这个论述把中华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人文始祖”伏羲,也就是旧石器中晚期(距今约十至一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微言大义”——原始公社时代是母系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中华民族最早的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妊,全都带有“女”字偏旁,这充分证明,不管仓颉是否确为黄帝时代的人,但他在“造字”的时候,中华民族还确定无疑地保持着对原始公社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的鲜活记忆,而他创造的文字所承载的,正是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所积淀的“文化基因”;只要汉字不失传,它就永远在不断唤醒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对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大多是源自远古的原始公社时代,所以那些神话英雄都是“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有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越绝书》)的道德典范;而西方的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则无不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且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重撰过的,所以那些神话人物个个都是贪婪成性、勾心斗角、热衷杀戮的“狠角色”。这种不同的民族起源记忆和文化母胎,是后来中西文化形成不同特质禀赋的根源。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而言,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特质,就在于自古以来就有着最强烈的人人相亲相爱的“大同情结”,这既是基于对长达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道德风尚的理想化的历史记忆,又是出于在“文化基因”的返观内省中形成的对“人性本善”信念的执着。^[1]孔孟之道的核心范畴“仁爱论”“性善论”所传承的,正是这个情结和信念,是对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所凝聚的“文化基因”的发掘和总结,或者说是对人的“类本能”特征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如何在“天下为家”的历史条件下矢志不渝地保持和弘扬人的“本心”,逐步通过“小康”回归“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的“可行性论证”(历代儒

家一以贯之宣扬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厚德载物之道”“至诚尽性”的“格物致知之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天地伦常之道”“明德亲民”的“成贤希圣之道”等等“人间正道”,就是这种“可行性论证”的具体体现),并以此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这是在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即所谓“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的圣贤明哲对人类文化宝库所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也是我们今天和未来仍然要“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中华民族的特质禀赋,也是对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的深刻揭示,所以他强调: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的圣贤明哲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的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从“百姓日用而不觉”中“觉悟”出了最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又潜移默化地引领百姓在“日用而不觉”中传承了这些“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骨髓里。这就是文化DNA”;由此而形成的“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包括近年彰显出的“伟大抗疫精神”,也是“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的。

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融通起来,推进理论创新

被后世尊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对“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有着深刻认识,他说:“故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夫尧、舜之道,岂有物可玩而乐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杨时集》)这意味着,“道”未必体现在那些“仁者智者”的一己之见中,但却

一定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中,换句话说,既然人的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生活资料的获得,那么劳动人民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创造者,他们的“日用常行”就必然是“道”之所在,所以只能在“百姓日用”的经验和智慧之中去观察、发掘和总结出来,然后又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回到百姓中去。传统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对此说得更明白:“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卷下)他的著名弟子王艮在给四方学者传授阳明心学时,“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王心斋全集·语录上》)。这就是说,只有从“百姓日用”中认识和总结出的“条理”,才堪称为“道”,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否则就是歪理邪说;只有与百姓融为一体、成为百姓中的一员,你讲出来的“道”才会令人信服。这些观点和方法,显然颇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趣,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实践观和历史文化观,可以说是神韵相通的。

始终做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契合党心民心、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由衷认同和信仰的奥秘所在。比如,当“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的时候,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则以1840年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起点,以华夏文明五千年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辉煌历史及在此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为背景,深刻把握支撑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17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梦想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最大共识”,为新

时代的创新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引起广泛共鸣,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奋斗激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起无比强大的正能量;实现“中国梦”也理所当然,势在必然地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核心理念。又比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原点、逻辑起点、价值支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无疑是建党前后的早期共产党人和此后百年来的几代共产党人“人人心中有”的,但这个概念本身则曾经是“个个笔下无”的,因而也可以说是长期“日用而不觉”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把“经过时间沉淀后”的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党史、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得更加清晰”之后所作出的原创性概括,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理论和实践创新历程的高度提炼。而一旦有了这个通过反思“日用而不觉”而总结概括出来的新概念、新理念,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成功之谜和未来的必由之路“看得更加清晰”,就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解释得更彻底、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的总结和提炼,也有着通过反思“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来“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鲜明特点和深刻意蕴。

三、通过“日用而不觉”的双向互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不仅是通过反思“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的方法凝结而成的,而且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教化手段和方式来传承的,使这些文化精华“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据此得出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认识:“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

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王阳明就是把这种教化方式贯穿到其“立德、立功、立言”全过程的楷模,或者说是“做到了极致”的典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说“我很景仰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先生”,也才会强调“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基于对“日用而不觉”这种“双向互动”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所赋予中国人的“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贯通起来,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要传承和弘扬古人把“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的历史经验,“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近几年来,党中央举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富于仪式感的庆典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满浓郁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极大地发挥了鼓舞人心、洗礼精神、凝聚力量作用,在全社会中激发出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澎湃热情。其成功之谜,也正在于吸取了优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智慧,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生命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制度化运作的成功典范;遍布全国城乡的“红色地标打卡点”、“大思政”模式的广泛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建立等等,也是在“日用而不觉”中凝聚和传承“红色基因”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式。

四、在“日用而不觉”之中见微知著,在见微知著中立德树人

如何体悟和弘扬“日用而不觉”之“道”呢?历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善于见微知著。习近平总书记也同样认同这种方法。他在与澳门大学师生围绕其校训“仁、义、礼、知、信”分享感受时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仁者爱人,人之初,性本善,要发扬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呵护它,使它发扬光大,那可能就是人了。”这段话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的德性教育理念:

其一,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心学的“善端”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情感,是人皆有之的“本心”和“良知”,是人们赖以形成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倪、萌芽,因而也称之为人的“四端”或“善端”;人皆有之的“善端”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依据所在。孟子的“善端”论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人性本善”的执着信念和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指的显然也是人皆有之的“善端”。

其二,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心学所揭示的“成人”之道。宋代心学开创者程明道曾一语道破传统心学的德性修养“秘诀”:“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程氏外书》卷一),一个人的德性养成之道,无非就是要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亦即通过内省找到人的秉性中固有的“善端”——道德萌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并在学习和实践中呵护它、扩充它,使其弘扬光大,从而逐步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的独特贡献则在于把这个“成人”之道发展成为了一套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显然是对这种“成人”之道的肯定,与王门后学、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所言“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陈确集》),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从“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两个方面对中华传统心学的立德树人方法作出了新概括。

传统心学的德性教育论强调：“夫小者大之渐，微者著之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传习录》卷上），意即既要“对善端”见微知著，也要“对小恶”防微杜渐。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否则就会有“温水煮青蛙”之虞。可见，把“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作为一个“对子”贯通起来，可以更完整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德性教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通过引用和发挥阳明心学名言所说的一段话，不仅深刻揭示了“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印证了他的立德树人观确实是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

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

综上所述，深刻把握和揭示“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发展法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姓日用而不觉”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他是身体力行“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对我们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方绪银,姚大斌,吴玉梅,葛翠茹.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下)——以《毛泽东早期文稿》为中心的考察[J].南方论刊,2023(08).

【责任编辑：陈童敏】

儒家“仁爱”思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邹陆林, 蔡彩虹

(江门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00; 贵阳市社会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5)

摘要: 随着全球化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但基于文化差异的中西方文明碰撞冲突不断。所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站在文化认同基础上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又打造东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念。儒家“仁爱”思想是一个由内而外不断发散的层次圈, 即“爱人”——“仁民”——“协同万邦”; 或“爱人”——“爱物”, “推己及人”将东方儒家“仁爱”文明与西方“博爱”很好结合起来。在追求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互相理解与文化认同, 培育“仁爱”到“大爱”的东西方共同价值理念,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儒家; 仁爱; 人类命运共同体; 博爱;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11-06

21 世纪以来,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 世界各类安全隐患也暗流涌动,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再次考验人类。

“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不分种族,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①。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 秉承“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理念, 不断同多数疫情国家在互联网上进行密切信息沟通、经验交流, 呼吁各国携手抗疫; 并对世界大多数遭受疫情国家尽其所能提供医疗物资、技术人员或资金支持,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世界各国人民已深深感触到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携手同行、和衷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风险和重大挑战, 回答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人类社会永恒命题。因此,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前途所在。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

早期的共同体思想强调血缘或情感见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著《共同体思想》一书^②。随着社会发展, 共同体越来越以一定范围的共同利益为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共同体思想发展的高级形式, 它在中国被提出,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和指导地位, 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息息相关。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及演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渊源。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③。这充分说明人是一种“类的存在物”, 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作为一种“类的

收稿日期: 2023-08-20

基金项目: 浙江省中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ZWHA201922)

作者简介: 邹陆林 (1974-), 男, 江西九江人, 江门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经济伦理学; 蔡彩虹 (1992-), 女, 广东湛江人, 贵阳市社会主义学院社会文哲教研室教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经济伦理学。

存在物”，人也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己，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每一个个体生命在这种潮流中紧紧相连，形成命运共同体，且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人的本质得以逐步解放。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外交上不断演化：“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南南关系”“南北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和谐世界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种外交政策演化，反映了我国长期坚持努力构建，发展与他国合作共赢、和平与共的关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正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包括多层级构成主体，多方面领域内容，经历不同发展层次的生命与共的存在。首先从构成主体来看，从一个部门与领域、一定范围与地区到全人类，建立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其次从涉及的领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政治、文化、国防、自然生态、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多领域。在政治上主张各国一律平等，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应对全球危机，建立平等、包容、共赢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上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在文化上加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在生态上遵循自然规律，实现绿色发展，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家园；在国家安全上主张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不断构建人类命运整体安全观。最后从发展层次来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同心圆，在寻求共同利益中不断扩大辐射范围，不仅是从古代迈向现代，从低端走向高级的过程，也是从利益共同、责任共同、价值认同不断走向全球命运共同的过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误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强调人类文明可持续性发展，从而构建起各国之间平等和谐、协作共赢、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然而，对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些国外学者仍存在传统零和博弈思维，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他们认为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在现实合作上会存在重重阻碍。所以他们据此认为，中国在理念上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而在实践层面特别是“一

带一路”合作包含着中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野心。中外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也有所差别。例如中方媒体从“大同世界”美好向往出发，强调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人民是一个整体，世界人民应该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分享全球成果，共同应对全球各种灾难。而某些西方政客与媒体刻意歪曲事实，污蔑抹黑中国。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肆意全球大多数国家，被西方不少媒体拿来抹黑污化、甚至妖魔化中国，不断发出甩锅中国的杂音。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传承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思想一脉相承，是我国外交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最终形成了这一智慧结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特别是内融了儒家“仁爱”思想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诠释。

（一）传承了儒家“仁爱”逻辑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是“仁爱”思想，它起源于孔子的《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汤一介对此的解释是：“‘仁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④。汤一介把爱自己的亲人看成是“仁爱”的根本，从这一根本出发，“推己及人”，直至“博爱”，最后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孟子在孔子“仁者爱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仁民爱物”，宋儒之后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广通性，也说明了“仁爱”思想具有三个层次性。

1. “亲亲”的家庭之爱。《孟子·尽心上》中讲：“亲亲，仁也”。“亲亲”是最早提及的“仁爱”思想，是以血缘至亲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在家庭本位思想中表现为“慈”、“孝”、“悌”思想。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是为“慈”，是一种上对下的伦理关系，是父母对子女爱护养育的真实表达；伺候供养父母是为“孝”，是家庭中一种

自上而下的伦理关系,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与爱意表达;善待友爱兄弟是为“悌”,是家庭中一种平行的伦理关系,是家庭内部手足友善关爱的真实表达。这就是家庭内部关系“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的理想境界。根据儒家“仁爱”逻辑,家庭中的亲情是一切人伦关系的开始,唯有在家庭关系中行“仁慈孝悌”,才会去对普天下之人释放关爱。

2.“仁民”的社群之爱。家庭关系中的血缘之爱延伸到空间模式中的社群之爱,于是就产生了“仁民”的思想。这种“仁民”思想,即是从家庭关系的“爱亲”到社群关系的“爱众”,实现情感上的“小我”到“大我”的转变,最后友爱之情达“天下”,这是孟子“仁爱”思想较为明显的特征。“仁爱”将社群之爱上升到治国之道,自上而下的关系来看,常常表现为君主对百姓施行仁政治国;自下而上的关系来看,常常表现为“忠恕之道”。儒家这种“忠恕”治国,“忠”即表现为保持忠心,对人忠实;“恕”的本意是指人际交往中“推己及人”。当“忠恕”在封建社会日益发展形成一种“对己忠,对人恕”、“内心忠,外在恕”方式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这种以待己之心、平等待人的交往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原则。

3.“爱物”的生态之爱。“仁爱”向外扩展就是“爱物”,这是孟子由人及物,要对自然万物施展爱心。同样的道理在孔子身上也有所表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就表达了孔子尊重自然生态与追求生态中得到乐趣。为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儒家还主张“时禁”的生态伦理规范,即按照自然节律来安排狩猎^⑤。这表明自然界的草木鱼虫等万物是平等的,对于人而言,既不能藐视,更不能残害其他生灵。宋儒张载指出:“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⑥。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统一性,反映了儒家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和人文情怀是以“仁”为媒介,凝结和升华“仁爱”的方式来规范生态道德。

总之,儒家“仁爱”思想是一个由“亲亲”—“仁民”—“爱物”这样自然形成的一种同心圆式结构,它包含着由里到外不断扩散的多重价值意蕴的理念体系。它推己及人,最后由“仁爱”推演为“博爱”。

(二)拓展了儒家“仁爱”逻辑外延

“仁者爱人”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魂与核心,它内蕴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中。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之后,“仁者爱人”这种中华民族伦理就自动上升到世界关怀的现实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人类世界这一整体,以人类自身发展为中心,将不同地区和不同种族都视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庭成员之间互爱互助、共同发展。这样,在情感关怀对象上表现出了多个层次:即本国民众——世界人民——自然生态。

1.本国民众。封建社会执政者将儒家“仁爱”思想用于治国理政,适用于本国民众,即为“仁政”。在“仁政”影响下,人与人之间“敬之”,“爱之”,营造一种“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和谐社会氛围。正如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这种智慧引申到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之道,那就是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世界人民。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中国正在以其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传遍世界,不断以地区或领域为范围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如中非、亚洲、网络空间等,中国也在不断用其诚心与实意感动着世界。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意全球,习近平总书记在多国(国际组织)领导人通电话时指出,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派出医疗援助队、提供医疗物资和资金等,中国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尽己可能,施以援手,不断释放中国人民“仁爱”与善意,这也得到大多数国家人民的理解欢迎与大力支持。

3.自然万物。儒家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时,阐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儒家思想关于“仁”的内涵不仅限于人与人,还在于将对人类的情感“仁爱”延伸至自然界“爱物”,这充分表达了儒家对自然界生命体的友爱。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合理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做到取之以时、取之有度,这是儒家“爱物”、“惜物”思

想的体现。仁者能够把“自然万物”都作为“爱”的对象,将仁爱之心拓展至天地万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博爱”。因此,由“仁民”扩充到“爱物”是儒家思想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外延。

三、用“仁爱”思想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世界发展至今,全球化已经不可阻挡,而实施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必被时代所淘汰。当全球面临卫生疾病、经济危机、武器智能等威胁时,人们必须放弃成见、求同存异,共同应对。正如前文所述,儒家“仁爱”思想是一个层级“爱心圆”,由内向外依次是“亲亲”——“爱人”——“仁民”——“仁政”——“协和万邦”,也就是由家庭—社群—国家—世界,由里向外不断释放“爱”的同心圆。在这里,儒家“仁爱”思想引导人们不断放弃成见、求同存异,达到世界大同。为此,必须构建共同认知基础上的世界伦理、构筑“协和万邦”的思想体系、付诸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动。

(一) 构建共同认知与价值基础上的世界伦理

众所周知,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未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全球化发展使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影响他国,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蔓延,将人类带入文明浩劫的阴影之中。当西方文明不能引导人类社会继续发展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明该负起其应有的历史责任,那就是要充分利用儒家“仁爱”思想,向外传播爱心。世界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文化不同常常产生交流隔阂。但信仰与伦理是文化之根,如果在伦理方面达成共识,形成世界伦理,从而形成全球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方式,以此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中国方案。要让全人类接受这种方案,必须打通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通性,那就是从中国儒家“仁爱”思想到西方国家“博爱”思想,传承与发扬“仁爱”思想,推己及人、传播世界。

(二) 糅合中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博爱”思想

“仁爱”与“博爱”分别源于东方儒家文明与

西方耶教文明,他们同属于一种道德行为规范,二者关系十分密切,难分彼此,儒家“仁爱”思想向外延展就是“博爱”。但学界有人将“仁爱”归结为一种推己及人、由远及近且有层次感的差等之爱;将“博爱”归结为爱无亲疏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将二者真正糅合起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博爱”思想。孙中山说:“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⑧。孙中山既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儒家“仁爱”思想,又批判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成功将二者结合,做到西体中用,具有很强的革命指导意义。可以说,孙中山的“博爱”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仁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当代的“博爱”思想,已将东方道德智慧的“仁爱”与西方宗教情怀的“博爱”汇聚一脉,明显突破了地域和民族的限制,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提高个人品行修养和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基本思想。

(三) 吸收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思想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深沉最稳定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儒家“仁爱”思想引申到人与人交往的道德高度,那就是儒家的“礼”。随着时间的沉淀,人与人之间的“礼”发展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礼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民族,中华文化就是一种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文化。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平共处原则已成为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名片,也续写着我国的和平外交史。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基因已经渗入到这个民族的血液与骨髓里,它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流逝,也不会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再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始终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目标,已经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成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最优解。和平外交基本原则内蕴着儒家“仁爱”思想精华, 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一是“和”, 即从处理国际关系原则入手, 主张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是“礼”, 即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 主张礼让他国, 反对倚强凌弱、以大欺小, 诚实守信, 以仁义超越发展中的矛盾; 三是“治”, 即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主张着眼于地球大家庭, 就人类共同关心的诸如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卫生防疫等全球问题, 寻求合作, 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因此, 吸收和平外交的核心思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利于人们摒弃分歧, 致力平等尊重, 共同为建设一个地球村和美好世界而努力。

(四) 汲取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进行了深刻阐释,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战争、殖民、掠夺的老路, 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本质要求之一,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和不懈追求。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强调仁民爱物, 具有亲仁善邻、和谐相处、协和万邦的鲜明追求, 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讲,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不竭动力, 开辟了广阔道路。因此, 新时代新征程, 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根植于儒家“仁爱”思想,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汲取精神内涵, 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结束语

全球化的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世界文化具有天然多元和多样性,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媒介。但由于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影响, 世界文化交流处于不对等状

态: 西方文明话语体系占绝对优势地位, 东方文化仍处于弱势地位, 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缺乏话语权。特别是东西方文明和制度差异因疫情暴发而冲突不断, 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被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政治化同时, 也反映了基于文化差异上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冲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因而, 世界各国应该在文化交流上做到兼收并蓄、相互吸收、取长补短; 文明交流上做到相互借鉴、平等对话、共同进步, 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随着全球化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就是持续包容与开发, 不断加强沟通与构建互信, 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基础上互相理解和高效交流合作, 以期达到某种文化认同, 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作为人类的普世哲学, “仁爱”思想必然成为链接中西文明的结点,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 ①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
- ② 张志星, 赵世奎, 任之光, 杜全生, 韩智勇, 周延泽, 高瑞平. 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10)。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394。
- ④ 汤一介. 李中华主编. 总序[A]. 中国儒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第24页。
- ⑤ 吴志攀, 李玉. 东亚的价值[B].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370页。
- ⑥ 张载:《张载集》, 章锡琛点校, 中华书局1978年版, 第62页。
- ⑦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日报[N]. 2012年11月18日。
- ⑧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 孙中山全集: 第6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第22页。
- ⑨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N]. 人民日报, 2014-06-29(02)。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17-01-18.
- [2] 习近平.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 [N]. 光明日报, 2018-04-11.
- [3] 习近平. 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5-09-23.
- [4]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4.
- [5]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6] 吴根友. 儒家仁爱思想论纲 [A]. 孙熙国, 李翔海主编.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 1 辑)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7] 牟钟鉴. 儒家仁学的演变与重建 [J]. 哲学研究, 1993, (10).
- [8] 苏丽娜. 孔子“仁”的思想和基督教“博爱”思想之比较 [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08, (4).
- [9] 张改娥. 博爱与仁爱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5).

【责任编辑: 张山】

民族精神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

王 浩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伟大团结精神作为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国人民同心同行、同舟共济, 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发展了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民族关系, 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伟大团结精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演进过程中的生成逻辑, 主要体现为: 同根同源的手足之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血缘基础, 同域同流的自然环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缘条件, 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缘纽带。

关键词: 民族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 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17-05

2018 年 3 月 20 日,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概括、深刻阐释并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 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1]。伟大团结精神作为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国人民同心同行、同舟共济, 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发展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 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准确把握伟大团结精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演进过程中的生成逻辑, 对于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同根同源的手足之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血缘基础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基于共同的历史条件、

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国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了唇齿相依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同根、同源意识以其朴素的手足之亲和“一体”情怀, 成为伟大团结精神得以生成的重要源头, 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萌发的血缘基础。

(一) 同源共祖的手足亲情

源远流长的“同根”意识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很多民族, 在他们看来, 各民族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地域, 有着不同的习俗, 但都是同源共祖的兄弟姐妹, “同根”意识经过代代的口口相传, 鲜活地反映在很多民族的史诗中。彝族的创世史诗《查姆》认为, 距今 2800 多年前的蜀洪水时代, 肆虐的洪水过后, 人间只留下阿普笃慕两兄妹, 后来, 他们产下三十六个小娃娃, 每个娃娃各成一族, 从此, 三十六族共分天下, 常来常往, 彼此和睦相处。尽管各民族同根同源的史诗, 只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作品, 但都鲜明地映射出不同民族关于远古时期的共同记忆,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渊源^[2]。

收稿日期: 2023-06-02

作者简介: 王浩(1975-), 男, 汉族, 陕西周至人,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部副主任、副教授, 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基本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我国当代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上的同源性,目前已经不同程度地得到科学研究的证明。现今藏缅语族的彝、藏、怒、独龙、景颇、纳西、拉祜、哈尼、阿昌、土家等民族,均源于我国古代的氏羌族群;现今壮侗语族的壮、侗、水、傣、仂佬、布依等民族,都从我国古代的百越族群分化而来;而佤、德昂、布朗等民族,则源于我国古代的濮人族群,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汉藏语学界已经公认汉族与藏缅语族各民族的语言亲缘关系,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学科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佐证。

(二) 葫芦崇拜的神话叙事

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中的葫芦崇拜。我国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认为,一个巨大的葫芦生出最早的人,由此诞生了世界,由此,葫芦成为母体崇拜的吉祥物。

傣族的神话故事认为,远古时期,洪水泛滥,河面上漂来一个葫芦,八名男子从葫芦中走了出来,一位仙女让其中的四名男子变为女人,与其余的四名男子两两婚配,由此繁衍出后代。阿昌族的神话故事认为,天公地母相爱之后,生下一颗葫芦籽,结出一个大葫芦,天公与地母剖开葫芦之后,九个娃娃从葫芦里跳出来,他们成为人类的共同祖先。傈僳族的神话故事认为,天神降下两个葫芦之后,男人西萨、女人诺萨分别从第一个、二个葫芦里出来,他们生育了九男九女,九男九女两两结为夫妇,繁衍出汉、藏、傣、彝、缅、纳西、景颇等各族人民。毛南族的神话认为,天神哥为了拯救人类而射下太阳,可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忘记了还愿,只有盘兄、古妹懂得感恩天神哥,送来一条狗,为天神种田,并结出一个葫芦。大地洪水肆虐之时,盘兄、古妹两人由于躲进天神哥种的葫芦而得救。此后,盘兄、古妹二人成亲,繁衍后人,成为人类的祖先^[1]。白族也流传着葫芦渡水的神话故事:天神阿妣告诉人们,地上要发洪水,让人们搬到葫芦里去住,只有阿公、阿婆两兄妹听了天神的话而得救,后来兄妹成亲,繁衍出人类。总之,葫芦文化源于各族先民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早已深深融入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信仰,葫芦文化以其强烈的济世情怀和团结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典型。

(三) 不同族群的深度融合

在中华大地上,尽管有些兄弟民族之间也许没有上述同宗共祖的传说文本,但经过数千年的双向迁徙、交错杂居和深入接触,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早已形成了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仅就汉族来说,我国北方的汉族人口中,曾经大量融入了匈奴、党项、鲜卑、羌、氏、羯等众多古代游牧民族;而我国南方的汉族人口中,则大量融入了古代百越族群和苗瑶的先民。数以千年的深度融合,使得各民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初步认知,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各民族是兄弟,各民族是一家”的朴素意识。“同根同源”的意识固然是感性的、朴素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铭刻于中国人民心中的同根同源意识,是中华儿女共有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精神之源,也是催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血缘基础。

二、同域同流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缘条件

任何民族的生存繁衍,都是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内展开的,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前提。我国的地理空间相对独立封闭,地理环境辽阔、温和而宜居,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祖国广袤疆域的过程中,成为同域同流的“天然邻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萌发的地缘条件。

(一) 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空间

自然环境是一种无可选择的规定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周边均有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东有浩瀚的大海,西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有河道纵深的热带雨林,北有寒冷荒凉的蒙古大漠;四周的自然屏障,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数千年来,中华各族先民在这个广阔的地域内生活劳动、繁衍生息,相对封闭的地貌特征无疑是中华民族同外界交往的天然阻隔,但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地理空间。同时,我国地形西高东低,西部有号称“世界

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部却是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有人把这种地形比作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受到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境内东部湿润多雨，西部干旱，北部严寒，南部炎热，又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内部结构。

由于地形多样，气候不同，不同地区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程度不同，中华先民根据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环境，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生存、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辽阔的中华大地在史前文化阶段，就形成了六个小的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中原文化区更容易吸收周围其他文化区的养分，因此发展水平最高，成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诞生地。文明首先产生于中原地区，其次是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最后是第三层即最外层的各文化区。考古学家形象地将这种文化结构称为“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大局面”：“中国文化一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借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周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及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4]。

（二）辽阔温和宜居的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生活的地理、气候、环境特点，大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幅员辽阔、腹地纵深。至少在西周时，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的地理空间，同时，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气候和自然景观，造成了各民族性格与气质的差异，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特色。在如此辽阔的空间中，高山耸立，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土壤肥沃，物类繁多，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不仅使中华民族得以自给自足，而且具备了足够的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虽多次遭遇外敌入侵而不致毁灭或中断，终究保持着文化

的绵延和完整。

另一方面，气候温和。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人类生存与居住。我国的气候特点主要表现为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九月至次年四月，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来干寒的冬季风，南北温差较大；每年的四月至九月，从东部和南部海洋吹来暖湿的夏季风，普遍高温多雨，南北温差较小。在我国境内，随着海陆季风的影响，南北气候呈现梯度变化，形成了不同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的自然场域：既有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大草原，有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黄土地和大平原，也有渔猎民族赖以生存的海洋和发达水系。

巨大的地理单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中华各族先民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并吸引、汇聚了大量的其他部落，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各族携手开拓的广袤疆域

长期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疆，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外向型发展，他们往往通过互市贸易、长途迁徙等方式，不断加强同中原地区的互动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干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寒冷期，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为了谋求生存、反抗压迫，逐渐向南迁徙，并多次突破长城防线，意图南下占据中原。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先后归附，中央政权大大加强了对西城的管理，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进一步巩固了对今新疆、青海和蒙古高原的控制。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等民族入主中原，北方民族与中原内地发生内向性交融。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首次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范围，为今日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实行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对于不同区域，分别实行八旗、行省、土司、伯克等不同制度，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使得清朝一度成为历朝历代中，有效控制国土面积最大的朝代。

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在亚洲东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生产条件，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得益于共同生活的广袤地域，

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发展和壮大,中华各民族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结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言:“美哉中国之山河!美哉中国之山河!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源莫不由于地势”^[5]。

三、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缘纽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缘于共同的地缘和相似的环境,更缘于共同的历史命运和牢固的情缘纽带。“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6]。正是在各民族长期的共同奋斗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形塑了弥足珍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团结奋进史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远至史前传说时代(原始公社后期,约公元前21世纪),原居于陕西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统一了游徙于黄河流域的各氏族部落,奠定了华夏族的历史基础。之后的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兴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多民族国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载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的铭文,成为“中国”一词出现的最早记录,标志着多民族国家新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统一东方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大一统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唇齿相依、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等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成为中国人民伟大团结精神的生动写照。而最典型的反

映团结精神的诗歌,莫过于《诗经》的《秦风·无衣》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首先秦时期秦国人民英勇抵抗西戎入侵的豪迈战歌唱道:“谁说没有战衣?一旦国家有需要,我愿与君同穿战袍、共赴战场”,生动表达了先人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浓烈情感。无论是秦汉雄风,还是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结成了彼此不可分离的命运共同体。

(二) 各族人民共同积累的同质性特征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尽管客观上存在着生活生产方式、文化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但又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积累了众多同质性的特征,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有机整体。中华民族的“同质”并非“同化”,亦不否定“多元”,而是各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共生、共存,以及在本质上相同、相通的状态。中华民族的同质性表现为,各民族在生活地域、经济形态、精神追求等方面,具有整体性、匹配性、共同性特征。同质性往往以各民族的心理特质为基础,在内在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日渐趋同,构建出共同的政治基础、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精神文化^[7]。

(三) 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的“大一统”目标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出现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但从纵向的角度看,总体来说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统一的程度越来越深,统一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自视为中国的当然成员,即便发动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争,也是为了入主中原,争夺中华正统,而不是另起炉灶,企图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些建立了中央政权的王朝,也都不自外于中国,都以中华正统自居,并以实现中华“大一统”为己任。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数万名建设者、医护人员逆行出征,各行各业自觉担当疫情防控责任,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成为新时代伟大团结

精神的生动写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访华给他留下的最为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的那种既异常热烈，又高度团结一致的精神。中国人不相信上帝，而是认为人民就是上帝；中国人不崇拜超级英雄，而是认为无数的普通人本身就是超级英雄^[8]。一些外国学者也禁不住感叹：“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9]不少西方人很难理解：在中国这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面积接近整个欧洲的超大型国家，何以能够迅速形成这种一呼百应的协同力？其实，早在2200多年前，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在《王制篇》中深刻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并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正是“群”的团结力量，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千百年来，基于同根同源的手足之情、同域同流的自然环境和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寄托，始终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伟大团结精神的激励凝聚下，全体中华儿女必将以更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0/c_1122566452.htm，2018-03-20.
- [2] 王锋. 伟大团结精神：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复兴伟业的内在力量[N]. 中国民族报，2019-5-17(6).
- [3] 刘锡诚. 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7.
- [4]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4-5.
- [5] 晁天义.“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6]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2019-9-28(2).
- [7] 强健. 论中华民族同质性特征及影响因素[J]. 贵州民族研究，2020（10）.
- [8] 鄢一龙. 关键时刻体现民族精神[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4-2(5).
- [9] [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06.

【责任编辑：张山】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石

王玉珍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 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 通过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民族, 是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天下大同理念,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 继续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得出“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选择的重要论断, 进而提出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基石的最终结论, 以期对优化民族政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相应理论逻辑和政策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中华民族; 少数民族; 多样性; 社会治安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22-04

党的二十大号召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迎来一个更为关键的历史节点和战略机遇期, 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的重大挑战也接踵而至。面对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务必要妥善解决好因其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社会矛盾频发, 预防和处理好国内各阶层、各族群的关系, 是十四亿人口超级大国治国理政的基石。苏联这个大国的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崩溃, 而主要是因为自己国内社会矛盾、民族分裂、政治危机, 简单归结于外部势力是不客观的。近年来, 国内有责任感的学者不断提出一些需要警觉的问题。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而不是强化族群意识和差异, 就是一个很重要很现实的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一、“多元一体”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真实描述

费孝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承上启下的领军人物, 也是这个时期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领军人物。他从学术生涯早期到人生暮年, 对文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自始至终, 在占有大量理论、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系统梳理总结出“多元一体格局”等重要理论, 其影响十分深远。

费孝通在 1998 年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 将民族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引起海内外普遍赞誉, 成为他“进入成熟阶段树立的学术高峰”。文章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发, 从多个角度探究多元民族的产生过程和演变规律, 提炼得出“多元一体”这一关键理念及其对中华民族格局的重要影响, 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费孝通通过大量考古资料与史实, 论述了一万年的发展史, 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认定过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 费孝通指出

收稿日期: 2023-08-30

作者简介: 王玉珍 (1967-),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正高级经济师, 从事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与西方对抗形成的自觉、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主流由多个单独族群组成。在历史演进中,各族群通过杂居、融合、分裂和消亡等社会交流,逐步形成“交融贯通”的族群特点,进而构成了特性各异的多元统一体。费先生的论述是由“空间一体”内的民族多元——民族多元后的中华一体”这样两个层次展开的。东亚大陆地理单元是费先生所指的“空间一体”,南北跨30个纬度,分为从西向东的高低三级阶梯。中华民族在这个一体空间内由分散孤立的多元状态逐渐趋于一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域的以汉族为主,中原各其他民族为辅的融合统一民族。

生活成长在东亚这块辽阔的地理空间的各个族群,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概念,我们国内的民族理论对“民族”这个概念的解析有偏差,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语义上应解析为“族群”,而不是“民族”。这样才不会误以为“中华民族”不是“民族”。

看待民族问题,一要有全局视野,二要有历史深度。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格局不但决定现在,而且影响将来,正确认识中国民族构成,分布特点及其历史成因,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正确制定政策,维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围绕“凝聚核心”逐渐发展,汉族、藏族等群体在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部分以核心为依附,部分以核心为主体,进而构成多层级的统一整体。在以“凝聚核心”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群体间存在频繁的分合变化,并逐步形成了层次各异的序列,从而构成“差序格局”。费先生把他早年的差序格局理论扩大到中华民族大结构中,是他晚年理论思考的亮点,也给后人极大的启发。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和时代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概念恰恰是出现在晚清中华衰落、外敌入侵之时。而目前是民族振兴的历史节点,也是国内国际各种矛盾交织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己不乱才复兴有望。当前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不是单指少数民族的文化,而是包含各民族族群的共同文化

精髓,在文化自信的大旗下,既要关注“多元”,更要强化“一体”。

二、“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六年来,虽然经过“文革”那样灾难性的破坏,但民族团结融合的氛围始终良好的。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首先响亮的提倡“两个离不开”,即少数民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理念。正因这样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使得自治区在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大变革中稳定发展,无愧于“模范自治区”称号。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成果。“离不开”是很通俗易懂的解析。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千年形成的复杂而壮阔的历史沧桑,也展示了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必须成为一起攻坚克难、共渡惊涛骇浪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历史客观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在社会客观物质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从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两千年更替,众多族群在国家的扩张和王朝更替中融合,在黄河中下游广阔的中原形成早期的民族实体,也就是汉族早期的雏形。而汉族的族称应该起源于南北朝,当时北方族群纷纷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并接受中原农业文明,最后造成大量新的族群融入汉族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纯粹的汉族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生成史。

从夏商周千年更替开始,汉族逐渐地在多族群的融合中成型。秦汉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又造成中华民族新一轮的大融合。众多的族群又一次进入中原,融入汉族。

费孝通认为,我们现在通行的民族概念有三层涵义:一是中华民族统一体;二是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单独的民族;三是各民族内部各具特色的民族群团。这就给民族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提出非常广阔的空间。他认为民族学研究不应该成为单纯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不应是单纯对某一民族的研究。中国的民族学不能离开汉族研究,应涵盖对汉族与少

数民族关系的研究。

汉族形成本身就是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结果。离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无法在中国全面地研究民族。他的民族研究重要特点是:在少数民族研究中,总是结合他们与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这就从历史视角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研究推进和深化了。这就是说,中国民族研究必须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研究,而不是仅对占人口百分之六的少数民族研究。同时他也认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也有体现,比如在元朝时的蒙古族和清朝时的满族。这样的思路对“中华民族”整体研究是根本性的突破。

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根本

文化自信的表现不是封闭的、排外的,而是包容的、开放的,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文化的视野和历史的视野是我们深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道路的理论武器。

文化是人类的标志,是人类独特的创造,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是社会的魂;文化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是生活在某个特定自然环境中的族群为适应这个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文化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不断行进中的社会生活留给某个国家、民族、族群和社区的传承。因此,文化自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基于对古希腊或古罗马的自信,也不是基于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自信,而是对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沿革的大家庭核心凝聚力的认同。从政治上讲,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的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悠久历史的认同。

汉族的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文字和文献方面,汉族人的方言上百种,但书面语自秦汉以来基本固定,文献文学作品保留下来的精华记载了民族的文化遗产。而现存的汉语言中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留下来的,这在北方语言中特别突出。

费孝通指出,文化是一个由量到质积累转变的过程,只有经过历史的洗礼,才能出现超越生死、时空的文化传播。中国有着古老而连续的文化传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统一帝国分裂后还能再次建立更高度的大一统帝国。如此反复多次,其中还经历了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华的元朝和清朝近 400 年。但中华文化依旧长盛不衰,在专制帝国完结后,依旧能经过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确立了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现代国家。

谁也无法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和独特、博大和多元。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执政七十多年,一直努力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取得了革命胜利;又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积累,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

中国不但具备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丰富深邃的传统文化,也同样传承了汉族各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北国到南疆,从西域戈壁到东南海岛,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接客待物,各有千秋。中华辽阔国土上,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的不同,汉族的地域文化本身已经是多样化的,某些差异不亚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各少数民族更是有自己丰富的族群文化,不同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风俗习惯、服饰仪式、生活方式五彩缤纷。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我们历史传承的多元文化体现。对世界而言,就同“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华哲学传统一样,是中华文化巨大包容性的体现。不仅接纳过各种宗教意识形态,近百年来中国还大力引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成果,并不同程度的使之与中华传统相结合。使之既适应时代,又适应中国,迄今仍在努力实践中。

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指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传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体现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地方特色,各美其美是天然合理的,美人之美是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基础,是维系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心理共识。做到这八个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有可能。推而广之,中国与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历史发展过程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也是必要“大同”的必经之路。

四、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要求，要把持续将加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战略任务抓牢抓实”。民族是一个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概念，中国现在所说的55个少数民族，是新中国通过行政方式调查认定的。历史是研究与改革社会的必要前提条件，任何社会结构均需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在前一社会结构中继承发展。

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与西方对抗形成的自觉、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主流由多个单独族群组成。在历史演进中，各族群通过杂居、融合、分裂和消亡等社会交流，逐步形成“交融贯通”的族群特点，进而构成了特性各异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由56个群体组成，虽然汉族占比人数最多，但是汉族不等于“中华民族”，两者间存在整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存在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

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必然牵涉到“民族”的概念内涵，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民族，融合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民族A）和由单一族群构成的民族（民族B）。也就是费孝通说的民族的第一、二层涵义。民族是一个动态的进程，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族群的生生灭灭，以及它与别的民族和族群的融合或分离，使我们无法找到凝固的永恒的民族。今天世界上存在的民族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族。民族是在个性向共性逐渐发展转化中形成的，即民族是人类的一体化和组合的一种形式。

中国的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当代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在过去一

段时间，民族研究较多地强化“民族共同心理”，对社会分工体系发展这一物质基础缺乏摄入探析。社会分工是社会融合的客观基础，抛开客观条件谈“共同历史”犹如无本之木，即就现象谈现象而非本质。新中国建政后在民族事业上有两大举措，一是民族区域自治，把民国时期的一些“省”改建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二是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民族识别”。北京大学的回族学者马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的民族问题主要受前苏联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影响，将“民族”狭义理解为56个“民族”这一局部层面，忽视了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藏族作家阿来认为，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本是模糊的、有弹性的，这既有利于各民族间正常交流，也有利于解决民族矛盾与问题。当前，较为清晰的公民民族属性和地理区域划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弹性，从而不易形成统一的国家共识和情感认知。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认为：交往交流交融是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要持续减少强化和细分民族边界，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认知。

不言而喻，他们的见解是有问题导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能否实现，民族工作至关重要。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往往取决于把握的分寸和执行的尺度。况且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社会变迁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信息传播之广都是极大的挑战。“三种势力”的挑衅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以多族群多信仰国家为目标的。要保证能不战而屈敌御敌，在加强民族族群融合的大氛围下，下大气力强化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话语权，让中国民族团结再上新台阶，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

【责任编辑：温开照】

毛泽东诗词的统战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兰 峻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坪山分院, 广东 深圳 518118)

摘 要: 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毛泽东诗词是其政治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 闪耀着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光芒。在“分田分地真忙”“环球同此凉热”的阐释中, 生动揭示统一战线的本质规律; 在“尊前谈笑人依旧”“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导中, 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 从“谁主沉浮”到“还看今朝”的问答中, 诠释党的领导是统战根本保证。深入学习毛泽东诗词中的统战思想, 有助于深化对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认识, 推动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 统一战线; 工农联盟; 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26-06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集体智慧。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指导中国统一战线实践, 留下了许多统战工作光辉范例。毛泽东诗词是其政治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 他透过诗词阐释深奥的统战理论、搭建起广交党外朋友的联系桥梁, 他的诗词中闪耀着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光芒。深入学习毛泽东诗词中的统战思想, 有助于深化对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认识, 推动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揭示统一战线的本质规律: 从“分田分地真忙”到“环球同此凉热”

(一) 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自从党的二大正式提出统一战线后, 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1936 年, 刚结束长征、到达延安的毛泽东给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写信, 引用四句韵文诗: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暴虎入门, 懦夫奋臂”。诗前两句取自《诗

经·小雅》, 意指鸟类尚且飞翔、鸣叫寻求伙伴, 何况人类呢? 后两句意指凶残的日寇已踏入国门, 面对强大的敌人, 虽是“懦夫”只要“奋臂”就是我们的友人, 何况“爱国有志之人”呢? 正如他给高桂滋的信中所说“居今日而言, 抗日讨卖国贼, 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赶走日本侵略者的迫切心情和宽阔胸怀。一年后, 《四言诗·祭黄陵文》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认识。1937 年清明节, 国共两党同时派出代表祭奠黄帝陵。毛泽东亲自撰写《祭黄陵文》作为共产党人的祭文。祭文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 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讲述国运变化; 从“东等不才”开始, 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 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祭文中, 毛泽东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国良方”, 只要“亿兆一心”就能“战则必胜”。两首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科学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 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不可能的。”^[1]

收稿日期: 2023-05-08

作者简介: 兰峻(1982-), 男, 汉族, 浙江松阳人,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坪山分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与统战理论。

故而，他把统一战线被誉为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认为“中国共产党握有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统一战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习近平强调：“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4]这些论述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法宝论”，表明党对统战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关于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5]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6]。在领导党的统战实践中，他总是着眼统战工作的本质问题，因时因势调整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不断壮大党的统一战线。

1. 面对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风起云涌，他着眼巩固“工农联盟”这个基础，热情讴歌“分田分地真忙”“唤起工农千百万”。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毛泽东发展马克思的工农联盟思想，主张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倡导实行符合实际的工农联盟政策措施。他鲜明提出“解决农民问题，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这是点燃农民革命热情的关键。这在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诗词中有鲜活呈现。如1929年秋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写到：“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

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首词描绘了趁着蒋、桂之间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时，毛泽东带领红军将士开拓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为农民分田分地，团结当地农民的情境。词末两句，描绘了土地革命给灾难深重的根据地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通过分田分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工农红军所到之处一片欢呼和拥戴。这充分表明，通过土地革命给予农民切身好处，是团结农民、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策略。同样，在1930年2月到1931年春创作的《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三首词中，分别出现的“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等“十万”“百万”“千百万”三个数量词，勾勒出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不断壮大的壮美图景。

2.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深的侵略，他富有远见地提出“环球同此凉热”，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思考建立反国际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如前所述，1935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侵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四言诗·祭黄陵文》提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此同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7]在此情况下，单单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战胜敌人是很困难的，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外交往方针，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以便集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御敌。在他1935年冬创作的《念奴娇·昆仑》中写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关于该词主题，作者在1958年12月21日批注中阐释：“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8]在当时无疑是指反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在诗中阐述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环球同此凉热”，与抗日爆发后党积极推动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高度契合，可以说是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源头。

3. 面对社会上对统战工作的错误认识，他强调“僧是愚氓犹可训”，通过分清敌我、争取中间派进而巩固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道路。针对社会上诸如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一样”等错误认识，毛泽东予以批驳并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但社会上仍存在错误认识。1961年10月，郭沫若观看越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诗对唐僧进行了毫不留情抨击，认为他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愚昧不堪，“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毛泽东在看到郭沫若诗后，于11月17日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主席旗帜鲜明提出“白骨精”才是真正的敌人，唐僧只是被蒙蔽的人，可以教育过来，不应该“千刀当剐”。分清敌我、争取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正如《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9]“僧是愚氓犹可训”，我们必须争取唐僧这样的“中间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无论巩固工农联盟的“分田分地真忙”，还是推动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环球同此凉热”，抑或争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间力量的“僧是愚氓犹可训”，都充分体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的统战工作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3]

学习毛泽东诗词，要求我们：一要固守“圆心”。我们常说“统战工作要画出最大同心圆”，只有找准圆心、固定圆心，才能画好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政治底线这圆心固守住。这就要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二要做长“半径”。在固守圆心基础上，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凝聚的力量越大越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对象。针对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占领人类道德最高点，是建立最广泛国际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事实证明，只要把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

二、把握统一战线的方针方法：从“尊前谈笑人依旧”到“风物长宜放眼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领导干部要精通此中门道。统战工作原则性强、政策性、策略性强，艺术性也很强。毛泽东诗词对许多统战方法进行了鲜活阐释。

（一）惟有牺牲多壮志：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的。”^[10]在《七律·到韶山》、《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对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有清晰阐释。《七律·到韶山》采用回忆追叙的方式艺术地概括了韶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11]在蒋介石、反动派镇压下，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革命失败了。究其重要原因，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分裂革命联合战线的行动，一味地妥协退让导致“团结亡”。总结历史教训，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拿起斗争武器：“（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12]《西江月·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是生动写照，充分说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赢得主动、赢得胜利的重要思想源头，是统一战线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统战工作“要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又要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我们既要在斗争中求团结，也要在团结中作斗争，其中最重要的善于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做到“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二）而今一扫新纪元：平等相待和民主协商的方法

平等相待、民主协商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战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3]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1950年11月创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写到：“颜酡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词中，毛泽东以颜酡喻柳亚子，用齐宣王喻蒋介石，指蒋介石不肯礼贤下士，以上凌下，甚至要民主人士接受他反革命的那一套。毛主席话锋一转，“而今一扫纪新元”，和国民党蒋介石不同，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是平等相待的。这个“矛盾”在新中国已不存在。事实是最好的诠释，建国初期对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仅亲自致信邀请、问候，还经常谈心、交心，关心备至。这些举动如春风化雨，让民主党派人士倍感中国共产党的用心之诚。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根据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自身资历、条件、意愿作了精心安排，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有容之大！我们党历来重视与党外人士民主协商。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李鼎铭先生所说的“有职有权”，到新时代以来对政党协商、政治协商做出安排，

新型政党制度日趋成熟，无不体现着“而今一扫纪新元”的平等协商之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而今一扫纪新元”用新时代的话语可以说是“而今协商新时代”，民主协商已经有了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

（三）风物长宜放眼量：教育引导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14]着眼于团结的教育引导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法。1949年2月，柳亚子受邀从香港出发到北京，对新政权满怀期望。但随后经历了一些不愉快事，他越想越难以接受，感觉受到了怠慢！给毛主席写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表达了要回老家、去子陵滩上隐居的归隐情绪。针对柳亚子的情绪，毛泽东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是批评引导。4月22日周恩来出面宴请柳亚子夫妇，对其错误言行进行坦诚批评。4月29日，毛主席亲自写《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劝导：“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该诗首先回顾了和柳亚子先生交往情谊，接着批评他“牢骚太盛”，劝导他多为国家利益着想。二是照顾利益。5月1日亲自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5月5日与柳亚子共进午餐。9月30日，柳亚子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政府为柳亚子在皇城旁边找了一处宽大四合院，配备警卫、专车。毛主席的两方面工作既照顾其经济诉求，也照顾其“被尊重”的社会诉求。柳亚子接受了规劝，又赋诗《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倘遗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同样必须强化教育引导，根据统战对象的思想实际、生活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引导；同时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

（四）尊前谈笑人依旧：联谊交友的方法

以文会友是中国文人的交际传统。毛泽东乐于诗交,文坛鸿儒、军政领导、社会贤达、青年学子,都是他交往的对象。但他的诗交,决不仅仅局限于诗艺切磋,更多是联络感情、交流思想、深化友谊,教化、感化的作用非常明显,统战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1. 诗词唱和。毛泽东给很多党外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写过诗,也和他们进行过诗词唱和。如前所述的柳亚子、周世钊、丁玲、郭沫若等。这些人也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诗词及个人魅力高度认可,坚定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1955年6月20日,他应邀陪同毛泽东重游岳麓山后,写了七言律诗《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记录自己所思所想。10月4日,毛泽东创作《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回复:“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尊前谈笑人依旧”记录了他们多年的深厚友谊,也是毛主席对统战对象的“交友之道”,这一相处方式从毛泽东、周世钊1920年成为好同学开始,一直到1976年两位故人去世。

2. 切磋改诗。毛泽东在和郭沫若、臧克家等人改诗时,总是将个人的观点、期许及真诚情感结合其中。例如,1958年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感到焦虑、担忧,便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毛泽东回信鼓励,支持他担任该职务并与他讨论《七律·送瘟神》,而后再复信:“你努力奋斗吧……‘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薛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生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15]

3. 借诗示意。毛泽东不仅善于赞美党外民主人士的诗作,而且善于借用这些诗来表达自己尊重和想团结他们的想法。例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去毛泽东住处做客。在会客室里,他看到墙上一幅字画:一只标着“茅台”的酒壶和几只酒杯,而画旁边一首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黄炎培看到这首自己所作的诗十分惊讶,同时也十

分感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交什么朋友、为什么交朋友、怎样交朋友等作了清晰阐述。从标准上看,“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朋友多不多、合作不合作、够不够铁”;从方法上看,“想交到诤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从原则上看,“同党外人士交朋友当然会有私谊,但私谊要服从公谊”。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承弘扬党的统战工作优良传统。

三、诠释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从“谁主沉浮”到“还看今朝”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也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6]他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思想,主要体现在《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中。这两首词创作时间虽相隔11年,却一问一答,遥相呼应。透视从1925年“谁主沉浮”的设问,到1936年“还看今朝”的坚定回应,既能找到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也可以探析中国共产党应当在中国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思想。

《沁园春·长沙》创作于1925年。当时,随着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湖南、湖北农民运动也火热进行,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大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革命高潮到来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企图篡夺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而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沁园春·长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当毛泽东看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景,体会到一切生物在秋天里自由自在,想到军阀割据、人民不能当家作主,情不自禁地发出诘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凝结着毛泽东对国家与人民的深深忧虑,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随后,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委婉回答,抒发以天下为己任,投身革命的壮志豪情。同时,

毛泽东也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沁园春·雪》创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率抗日先遣队东渡黄河之际。当时，党中央已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行军中看到漫天飞雪，触景生情，写下该词。词上阕描写雪后美景，下阕回顾历史，通过评价历史人物，表达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建功立业的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全词的点睛之笔，抒发了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揭示了中国的命运只能由无产阶级来主宰，再次强调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也是对《沁园春·长沙》“谁主沉浮”的正面回答。

学习毛泽东两首“沁园春”，必须转化为“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根本保证。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新征程上，发挥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掌握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要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领导，引导各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人士自觉接受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形成“众星拱月”之势，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总之，毛泽东诗词是其统一战线思想的艺术承载。以诗词为载体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创新性的统战形式，是彰显人格魅力的统战形式，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统战形式。在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中，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统战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高超的统战艺术，努力“讲求工作艺术，改进工作方法”。

参考文献：

- [1][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6,1257.
- [2] 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G].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2.
- [3]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5] 人民日报评论部.画出最大的同心圆[N].人民日报，2015-05-25（5）.
-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1999：23.
- [7][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9,742.
- [8] 汪建新.大同理想：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解析[J].党史文苑.2021（05）：37-40.
-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1.
- [11] 陈宏.郭沫若在韶山湖南党史[J].2000（05）：40-41.
-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3.
-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 [15] 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05.

【责任编辑：温开照】

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法宝

方 涵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00)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时代要求,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凝聚人心和力量,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伟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统一战线; 中国式现代化; 强大法宝;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32-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纵观历史, 统一战线对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凝聚、导向、整合作用, 解决的是共识、人心和力量问题, 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强大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需要统一战线彰显其独特的优势, 在全社会凝聚起强大的现代化推动力量, 发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法宝作用。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统一战线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三个时期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 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因此, 基于适应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必然对统一战线提出新的要求。

(一)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统一战线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根本原则, 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统一战线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广泛凝聚统一战线成员思想共识, 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得到有力彰显, 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准确的贯彻落实, 才能真正发挥好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磅礴力量。

(二)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统一战线坚定坚持整体协调和多元包容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整体协调和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 既要物质富足, 又要精神富有, 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既要部分人先行富裕, 又要推进共同富裕; 既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又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调发展; 既要中国发展, 又要推动其他国家乃至全人类共同发展。要实现这

收稿日期: 2023-08-19

作者简介: 方涵 (1995-), 女, 广东汕头人,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 党史党建教研室助教, 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理论。

些价值理念，必然要求统一战线在实践中按照尊重、照顾同盟者利益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注重各方力量的协同发展，寻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

在统战工作的实践中还要注意正确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统一战线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结成的政治联盟，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是对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必须始终把握的工作主线和基本方针。因此，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具备协调能力、包容胸怀及合作精神，推动各方共同参与，实现各方共同发展，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统一战线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紧密相连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既要“连天线”，又要“接地气”，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发展需要和时代发展变化要求，也要适应国际环境和灵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变化。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正确处理斗争和团结的关系，注重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拓宽国际视野和提高应对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统一战线坚定坚持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话语体系的本质要求。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必然要求新时代统一战线与时俱进，加强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建设，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这个中心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意见建议；围绕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为党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围绕中国政党政治制度话语体系建设，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中国新型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以推动中国式民主制度的更加成熟定

型，以此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和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法宝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②。”这一重要论断把对统一战线地位的认识从“重要法宝”提升到“强大法宝”的新高度，深刻揭示了统一战线对于实现团结奋斗的重大意义、揭示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巨大作用，也彰显了统一路线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法宝作用。

（一）统一战线是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同心圆”的强大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的最大“同心圆”，必须积极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核心在坚守“圆心”，这个“圆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只有坚守“圆心”，坚持党在总揽全局及协调各方的领导，才能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同心圆”的强大法宝作用，才能在固守“圆心”的前提下，画出共同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关键在延长“半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不断扩大团结范围，不断增进各方共识，真正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同时，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也在于能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统一战线在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中，既把握一致性，坚持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又尊重包容

多样性,做到求同存异,在统筹兼顾中寻求交集的平衡点,找到广泛团结的最大公约数,在最大范围团结起各种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实现这个巨大规模的现代化,需要汇聚起最广泛的力量支撑。统一战线在构建“同心圆”发挥的强大法宝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二）统一战线是团结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石榴籽”的强大法宝

“石榴籽”象征着我们 56 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着团结与包容的原则。石榴内部的果籽紧紧环抱、团结在一起,互相依靠、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彼此构成中华民族整体;而每颗石榴籽在分离后又各自成粒,各自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榴籽”强调的是“籽”与“紧”,既要多“籽”又要“抱紧”。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凝聚功能,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全民族的现代化,需要 56 个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致力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在民族工作中,发挥统一战线在团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石榴籽”的强大法宝作用,发挥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优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理好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而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充分激发和调动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三）统一战线是扩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朋友圈”的强大法宝

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的变化有所不同,统战工作对象和范围也有所不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这些“力量”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力量,是统一战线的“朋友圈”。

在“朋友圈”中,党外知识分子历来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也逐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者,团结新的社会阶层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着眼点和着力点;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也是我们党团结的朋友。党的十八大以来,“亲”“清”二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政商关系,国家对待“朋友”的方式也深刻体现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們自己人”。这些来自广大民族、宗教界人士、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知华友华力量……一切支持我们事业发展的力量,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朋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来自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朋友圈”越“广”,中国式现代化所汇聚的力量就越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就越快。“交朋友”是统一战线的通俗意思表达,扩大“朋友圈”也是统一战线的职能所在。在扩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朋友圈”的过程中,更需要发挥好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与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建立深厚友谊,加强思想引导,支持发挥作用,紧紧将“朋友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广交深交朋友。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百年统战工作史充分证明,中国的各项事业离不开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继续运用好这一强大法宝,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困难与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大本质要求,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行动指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在此要求下,统一战线要完成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也必然会迎来很多新困难和新挑战。

（一）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面临如何全面加强党的领导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和正确政治方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调，将党的领导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原则，并明确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然而，统一战线工作涉及多个政党、组织和利益方，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协调各方利益、确保各方共同参与；如何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理想信念的主轴，从而增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如何逐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如何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立为共同追求等，这些都是复杂且严峻的新问题。

（二）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面临如何更好协调各方资源力量的挑战

统一战线的对象来自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方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可能导致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意见分歧和冲突。既要保持团结一致，又要尊重各方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因此，平衡、协调各方力量、最终实现共同发展是工作核心，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关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各方的意见诉求，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促使各方力量融合形成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是一个需要智慧与力量来解决的难题。

（三）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面临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国内的事务，还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比如香港局势动荡变化、“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国际形势的变幻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等都可能对统一战线工作形成挑战。面对种种挑战，统一战线工作既要能灵活应对外部挑战和风险，还要在应对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和吸收国际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外部支持和机遇。如何在变局中育新机、开新局，保持统一战线的稳定和团结，是一个需要高度警觉和灵活应对的挑战。

（四）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面临创新工作机制的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着眼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五个本质要求，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布局 and 路径，也指明了创新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方向。如何在新的工作布局中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加快探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战路径，如何有针对性、系统性、创新性地改进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统战工作机制，更加突出协商合作、强调资源整合、关注创新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这些都是创新统一战线工作机制面临的活力和动力问题。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更要清醒认识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更多且更复杂。正确认识和应对这些新的困难挑战，要求统战工作必须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不断适应和处理新的情况，才能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要求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同时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强大法宝作

用,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以统战力量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所在,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大文章,首先要切实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尤其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上,不断增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其次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系统筹划和布局,坚持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寓党的领导于民主协商之中,真正做到协调贯通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共同推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进一步强化党在“同心圆”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众星捧月”的良好局面。只有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才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才能确保这艘“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二) 坚持和强调大团结大联合主题

团结是统一战线的本质特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统一战线的根本职责,大团结大联合是其本质要求^④。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这是立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作出的科学概括和战略部署,对于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强调大团结大联合主题,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增进民主党派的政治认同;要求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线,坚持和完

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求坚持宗教中国化,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作用;要求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三) 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导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立足于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做好统一战线团结人、争取人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思路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进入新时代以来,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迈出坚实步伐,这既是统一战线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举措,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机制,也是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的主要途径。

大统战工作格局中,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要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重视运用统战意识和统战思维分析问题,善于运用统战资源和统战方法解决问题。同时,必须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促进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与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有机衔接,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宗教中国化工作,充分调动党政、群团、社会组织等各方各界的资源力量,创新和发展侨务工作,扎实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提高工作效能,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四) 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是统一战线工作凝聚人心的精神根基、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其中,爱国主义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展壮大为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深刻理解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紧扣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不断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局面。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血脉传承，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应对困难挑战中作风态度的具体体现。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原则。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中谋求斗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顽强斗争全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伟大民族精神凝练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品格和魂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斗争精神，用中华民族精神最大限度凝聚起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前行。

五、结语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强大动力。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且必将继续证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法宝，是我们党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

伟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注释：

- 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30/content_5703635.htm.
-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党建, 2022(11):4-28.
- ③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人民日报, 2022-7-31.
- ④ 吴显标.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统战新篇章”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S1):40-43.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人民日报, 2022-7-3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党建, 2022(11):4-28.
- [3] 任世红. 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功能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04):70-77.
- [4] 潘清. 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推动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S1):44-46.
- [5] 吴显标.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统战新篇章”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S1):40-43.

【责任编辑：余伟】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参政党民主监督与国家治理的耦合关系研究

张淑瑛

(1.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南宁 530007;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盟刑事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3)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包容度高且内涵丰富的概念, 内在地包含了政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参政党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我国具体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它在运行过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参政党民主监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原则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在价值理念上具有同向性, 在运行方式具有多元互动性,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形成动态耦合的正相关作用。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参政党民主监督; 国家治理; 耦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38-05

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彼此作用相互影响^[1]。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进展到更深刻的层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实效性、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是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动能的必然要求。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 而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激活参政党民主监督效能既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激发制度活力的重要进路, 也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有效因子。因此, 国家治理与参政党民主监督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形成动态耦合的正向相关关系。

一、原则目标的一致性: 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展参政党民主监督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 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 据此明确了国家治理应当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前提。当今, 我们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新起点上, 面对“两个大局”, 国家治理具有了更高层次的意义, 即被赋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战略要求。换言之, 国家治理不仅是为了有效应对新时代社会治理领域的新风险和新问题, 更具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道的重大意义。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治理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不动摇, 是新时代治理创新的主导逻辑和必由之路,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遵

收稿日期: 2023-08-10

基金项目: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参政党民主监督创新研究”(18BZZ05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淑瑛(1983.1-), 女, 广西南宁人,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教研部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盟刑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多党合作制度、统一战线理论、法学。

循的原则与根本。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参政党的政治底色和立场，也内涵着参政党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定义与政治论断，使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有机统一，进一步明确了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参政党，发挥参政党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和功能。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包含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多元一体结构，这种诞生成长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土壤的独特制度，因其适应中国社会形态结构的需求和转化，进而能够为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价值沁润，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新动能。参政党的民主监督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重要的纠错机制与社会反馈机制。参政党民主监督作为执政党外部监督的重要内容，通过批评和意见的方式确保执政党科学决策、廉洁自律，协助政府部门稳定有效开展机构和体制改革，从而推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顺利开展。归根到底，参政党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监督而不是其他什么监督，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行使的是人民民主的监督权利。

（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共同政治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构建起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建的引领与行政的淡出，是党和政府有机嵌入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路径，它有效地激活与治理相关的制度存量、吸纳包括参政党在内的社会力量进入到新的社会协商治理制度增量中，在这样“嵌入式”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扮演者“元治理”的领导角色，决定治理的根本方向。而在强化党对国家治理的政治引导地位的同时，参政党则在其中扮演着“纠错人”的角色，以期在协商治理中保证“元治理”主体的不因长期执政而发生懈怠腐败。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在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作用，推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各国家地区政党关系的性质、内容和运行方式

之所以会存在差异，是因其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基本国情和价值形态。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构建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完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那样，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即在于西方走的是“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中国走的是“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3]。我国政党政治关系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型，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又反作用于我国政党政治格局的演变。这种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具有运行高效、目标稳定、力量集中的独特优势，但同时也容易在运转过程中陷入权力集中、腐败滋生、脱离群众等弊端。参政党的民主监督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下的政治监督，它的监督架构不是建立在政党间的权力制衡基础之上，也不是权力与利益的争夺，而是在双方目标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协商监督的方式帮助执政党克服权力集中弊端，避免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因面临种种风险和挑战而出现重大失误；通过优化国家治理的格局，将参政党作为治理主体引入国家治理活动中，以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持续夯实执政党的执政根基，确保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二、价值理念的同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参政党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参政党民主监督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4]。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协商民主的最早实践便是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法宝作用被中国共产党人承续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进入新时代，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各民主党派以协商为监督形式，以政党合作搭建沟通平台，以人民为中心行使监督职权，将参政党民主监督与协商民主，进而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机地链接起来。

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型政党关系，是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经历了漫长探索和革命斗争的考验与洗礼，正视到“专政独裁”的统治最终必将走向灭亡，摒弃了对“中间路线”的政治幻想后的自主自愿选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国家治理共同的价值归旨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理论层面上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虚伪，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具体描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模型，但他们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国家公共性的政治立场、社会自治的社会本位主张都为社会主义民主植入了丰富的协商民主基因。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赋予了参政党在开展政党协商中，既要摒弃“无关主义”又要避免“尾巴主义”，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善于在把握多数和少数、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基础上统筹兼顾；要长于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从历史逻辑来看，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从诞生之时就内涵着我国现代协商民主的政治理论，蕴含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为邦本”的价值体现。从实践逻辑来看，参政党民主监督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密不可分：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参政党参与监督的前提，只有健全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参政党能够充分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参政党民主监督权的充分行使，是民主与法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充分体现，这是恰恰是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唯物史观明确指出了历史演进的归宿，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也是历史的价值主体。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5]。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是为人服务的历史，而历史的归宿只能是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解决了价值理念中的第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发展“为了谁”。价值理念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判明价值指向，也就是主体需求指向，比如自由、平等、生产、发展、尊严等，它具有多样性和社会历史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人直面新任务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以人

民的需求为政策导向，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作出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科学判断，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理论^[6]。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浸润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价值观，人民立场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立场。

如果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中国有了坚实的基本制度基础，那么，伴随着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探索和推进，则意味着执政党和参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得以践行。进入新时代，公众的话语表达、利益诉求、交往活动日益活跃，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的需要日益突出。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协商治理更是直接将人民为先的治理理念贯彻始终。协商治理建立在对人民主体性的充分肯定上，力图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理性沟通、合作共治的良善社会，其创新的总体要求，就是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降低不和谐因素。在治理中，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相互激励，型塑自律与他律两相配合的良性氛围和制度，生发共同体的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治理的良性循环。因此，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不仅仅是治理技术的现代化，它更多内蕴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和伦理规范。

三、运行方式的互动性：多元互动、促进共生

（一）参政党民主监督是确保国家治理决策科学的重要前提

参政党开展政治协商、实行民主监督是由党和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治理主体，不仅要把本党的路线与主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还需要运用政党间的监督关系，把自己的执政主张同参政党开展民主协商，集思广益；参政党则通过履行实行民主监督职能，确保执政党主导的治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在于治理决策正确、符合实际，决策的执行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这就非常需要积极疏通和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使执政党能经常地及时

地听到各种意见、建议和批评,从而使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更好地代表和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中国的参政党有着巨大的人才优势,在决策系统“谋”与“断”的分工上,起“谋”的作用。在协商监督中,参政党通过发挥人才优势、经验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优势,对各级各种治理决策进行比较、鉴别、论证,提供决策咨询,以保证治理主体的决策科学、高效、民主。

（二）参政党民主监督促使国家治理主体从由一元走向多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治理遵循的都是自上而下,由政权主导下的“一元全能型”管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具有动员力强、执行高效的优势特点。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体制下,中国的社会力量发育一直不充分,导致在公民、市场和国家之间缺乏一个矛盾缓冲地带。且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果执政党缺乏有效监督,权力极易变质腐败而沦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形成利益固化的樊篱,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障碍。另一方面,在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一元管理模式容易导致管理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一元的国家管理模式所依托的强势政府,也容易导致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被动地服从、接受管理和安排,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主权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元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已然不能驾驭日趋庞杂的社会体系,不能满足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求,不符合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多元的国家治理结构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必然选择^[6]。

主体趋于多元首先意味着,在国家治理中,要对国家行政权力划定必要的边界,使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各司其职、平衡发展,各主体间既有交集,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民主监督的存在,使参政党能够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对过于集中的执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使执政者和管理者能够及时听取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及时发现和改正错误,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群策群力抗衡各种风险。主体趋于多元同时意味着,国家应当充分尊重与保障各个社会单元的主体作用,国家权力通过制度化方式支持社会治理力量的成长并为其合法政治参与提供力量支持,国家与社会通过共建

共治共享的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多元社会共同体,达到善治之目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涵着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和核心价值,即公民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以达到国家治理“善治”的目标^[7]。参政党民主监督基于民主党派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巨大优势,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基层实施、中层协调、顶层设计”的政治优势和上联下达、左右沟通的纽带作用,通过全方面、多角度反映社情民意和广泛参与的民主协商,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意见和建议,达到“求同存异”的思想统一和“亦此亦彼”的利益融合。

（三）参政党民主监督促使国家治理手段由德主法（刑）辅走向全面实施依法治国

道德与法律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价值层面和社会功能层面,两者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作为国家治理手段,德治和法治却代表两种治理进路和政治理念。诚然,德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无需置疑的,由德治所派生出来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偏“德”废“法”的治理方式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的治理要求。尤其在当代,传统“德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土壤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下,法治的价值更显强势突出,法治当然地成为了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成为引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动力,也成为主要的社会衡量尺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之治的方式必然应从“‘德’主‘法(刑)’辅”转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走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

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内容与途径,决定了其作用的发挥对于实施法治国家方略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科学立法。“良法”是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在立法协商中开展民主监督,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意见,能够使真情实况得到客观全面地反映,从而使所立之法更客观、更完善、更可行。另一方面,宪法及有关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也是政党协商的重要内容。参政党也可以通过各种监督途径对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提出批评建议,并通过法定程序参与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与补

充,直接为依法治国服务。**其次是严格执法。**《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参政党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协商、调研考察,参与党和国家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执行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可见,各民主党派在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中敢于讲真话、进诤言,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能够帮助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查找不足、解决问题,确保执法合法性合理性。**再次是公正司法。**一方面,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等机关中任职,可以直接参与司法活动,促进司法公平正义之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民主党派成员以特约人员的身份,对司法活动进行督查指导,促进监察权、审判权、司法监督权公开透明、公正规范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最后是全民守法。**参政党履行民主监督,可以通过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及时反馈群众呼声,促进司法机关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通过帮助解决法治建设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积极弘扬法治正能量,营造全面守法的良好氛围。

(四)参政党民主监督促使国家治理廉洁清明

廉洁清明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集中表现了道德的政治化特征,也是现代政治伦理中政员伦理的基本要求。中国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廉”在中国古代是官德的核心部分,是评价一官之廉能与一国之廉政的重要参考准则。养“廉”与知“耻”逐步内化为士大夫的个体品格。诸如欧阳修有“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的主张。此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廉洁清明”也被认为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明廉政同样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对于善治的基本要求。廉政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主义”“分权制衡”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西方政治学理论组成。例如被世界公认为廉政国家的丹麦,也是在对丹麦王室的封建专制斗争中,通过长期不懈的行政改革、法律改革和谴责公职人员不当行为才得以实现的。同样作为廉政典范国家的瑞典,其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尼尔森也认为:“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即使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火。”^[8]由此可见,廉政清明的政府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于善政的共同目标,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从“大同世界”到“世外桃源”,它们都表达了人

们对善政的苦心期待。

在当代中国,廉洁清明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廉洁政治提出主体多元化、过程复合化、方法法治化、手段多样化的要求。从当前国际反腐败斗争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与腐败通常呈反比例,权力集中是贪腐犯罪的根源,而当权力在监督下被有效分解后,必然会缩小权力任意行使的空间,增加贪腐犯罪实施的难度^[9]。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推进,仅依靠共产党党内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单方面的监督力量是不够的,反腐倡廉必须要高度重视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政治效益。因为民主监督是合作性监督,对反腐败的积极作用更多体现在宏观方面。其目的是通过监督帮助执政党科学执政,能“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因此,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从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有效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等方面建立健全现代国家廉政体系,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

参考文献:

- [1] 韩兆安,吴海珍,赵景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6).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9-10-31(01).
- [3] 储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J].人民论坛,2013(12).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7(01).
- [5]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主义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 [6] 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N].人民日报,2018-12-01(1).
- [7] 李建华.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15.
- [8] 王建波主编.国外廉政建设述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13.
- [9] 张淑瑛.基于情境预防理论的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机理与路径选择[J].理论导刊,2020(05).

【责任编辑:余伟】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人才 支撑体系的构建 ——以广清接合片区为例

彭秀林¹, 祁先超²

(1.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清远 511510; 2. 清远市委统战部, 广东 清远 511510)

摘要: 人才支撑问题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 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抓手。从经济支撑、科技支撑、教育支撑、政策支撑四个维度, 对广清接合片区进行了人才支撑现状调查, 对清远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的人才制约瓶颈进行了分析, 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创建国家城乡发展试验区人才支撑给予政策建议。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城乡融合发展; 人才支撑体系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43-05

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 广东经济总量连续 34 年居全国第一, 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广东的基本省情, 也一直是困扰广东未来发展的突出问题。广东县域面积占全省超过七成, 但经济总量仅占一成多。2022 年珠三角 9 个市经济总量占全省比例超过八成, 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12 个市加起来占比不到两成^[1]。2019 年 12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十八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 广清接合片区是广东唯一入选的区域。2021 年 4 月, 广东省颁发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实施方案》。5 月清远市出台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清远(片区)实施方案》。人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建设, 必须依靠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

一、人才支撑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一) 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需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人口大量迁徙到城市, 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人才支撑问题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 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抓手。人才、资金、技术、土地是乡村振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人才是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的主体, 是最主要的因素。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2021 年 5 月国家颁布了《乡村振兴促进法》专章强调了人才支撑的建设问题, 广清接合片区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建设试验区是中国乡村振兴的试验区, 探索广清接合片区的人才支撑问题, 必将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的建设, 为破

收稿日期: 2023-07-15

基金项目: 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2 年度规划课题(QYSK2022015)

作者简介: 彭秀林(1973-), 女, 湖北天门人, 现任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祁先超(1985-), 男, 湖北汉川人, 现任清远市委统战部非公经济科科长、清远市工商联党组成员, 硕士, 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解粤港澳大湾区城乡二元结构提供新的思路。

（二）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城乡融合的需要

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城乡融合的关键是城乡人的融合。广东广清接合片区作为国家级城乡融合改革发展试验区，是推进广州都市圈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探索跨区域城乡融合改革经验的先行地^[2]，先试先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因而，系统而深入地对粤港澳大湾区广清接合片区城乡融合建设中的人才支撑问题进行研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广清接合片区实现人才兴区的需要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广清接合片区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差距，表面是经济发展的差距，实质是人才的差距造成的。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新阶段目标要求^[3]。广清接合片区要加快新时代人才建设，培育高质量发展核心力量，开展科技创新人才、基层队伍和产业工人政策理论研究，必然要系统梳理多年来出台的引、育、留、用人才的相关政策，继而结合广清接合片区建设的新任务探讨人才支撑问题，为因势利导地出台新的人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清远创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人才支撑现状调查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包括广州市增城区、花都区、从化区，清远市清城区、清新区、佛冈县、英德市连樟样板区^[2]。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的关系，清远片区的发展要滞后于广州片区的发展。本调查重点聚焦于清远片区，从经济支撑、科技支撑、教育支撑、政策支撑四个方面对创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人才支撑现状进行调查。

（一）经济支撑现状

清远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支撑情况。2022年清远市地区生产总值为2032.02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30.61亿元，同比

增长7.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67.59亿元，同比下降0.9%；第三产业增加值为933.83亿元，同比增长0.4%^[4]。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势头强劲。清远已初步形成了电力、电子、电器、陶瓷、建材、纺织服装、生物医学、食品加工、旅游等支柱产业，重点发展以集成电路、大数据与云服务、互联网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清远市交通体系逐步完善，要素流动成本持续降低，毗邻珠三角的区域优势更加突出。产业资源的强势导入推动了清远市在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并创造了后发赶超的新动力。

（二）科技支撑现状

十三五期间，清远市参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项，承担实施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6项，在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突破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引进广东省“扬帆计划”团队9个，完成科技成果鉴定36项，科技成果登记189项。清远高新区成功创建国家高新区，并进入全国百强行列（位列95位）。广州白云（英德）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为首批省级高新区，英德市、清新区获批省级农业科技园。华南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落户清远，新增5家省新型研发机构，新增2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建成国家级孵化器3家。制定出台了《清远市激励科技创新十条政策》《清远市建设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先行市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科技金融结合创新有序推进，科技型企业投融资环境明显改善。

（三）教育培训支撑现状

清远市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依托广东省职教城的职业院校大力开展教育培训。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建立英德红茶研究中心、南粤家政服务中心、电商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乡村振兴需要的技术人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筹建预制菜研究中心对接“清远鸡、英德红茶、连州菜心、清远丝苗米、西牛麻竹笋五个百亿农业”研发预制菜，制定预制菜标准。注重乡村基层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清远市委组织部依托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创办“村两委”干部培训班，重点培养党的优秀乡村干部，全面提升基层“三农”干部队伍的素质，为清远乡村振兴工作输送人才。

(四) 政策支撑现状

清远市一直十分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实施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补助政策, 设定一至六类高层次人才安家补助和月津贴。建立联系高层次人才工作制度, 定期走访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依托人才驿站、产业园区等基地平台, 组织高层次人才对接交流, 先后举办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市场与技术对接清远行”、全国新材料论坛高峰论坛、广东博士俱乐部百名博士清远行等主题交流活动。建设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 同步制定了《高层次人才入学解决办法》和配偶就业安排规定。开通运行“清远人才微盟”“清远市人才驿站”微信公众号, 向高层次人才推送最新人才政策信息和重点人才工作动态。

三、清远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的人才制约瓶颈分析

(一) 人才结构对经济发展不利

一是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目前清远市专业技术人员中,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仅占 2.83%, 本科学历人员占 29.25%, 高层次、高学历、高技能人才不足, 能引领产业发展转型的领军人才更是严重短缺。二是学科分布结构不合理。教师、医护人员、机关工作人员较多, 农工商等生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紧缺。三是区域分布不平衡。清城区、清新区南部等工业或服务业发达、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人才数量较多, 英德、佛冈等经济状况一般且距离市区较远的区域人才数量较少。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 区域分布不平衡, 而层次结构和学科分布结构不合理直接弱化了人才对产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二) 科技支撑制约人才引进

近年来清远市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科技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但与国内省内先进城市相比, 科技发展基础仍旧薄弱, 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有限。科研经费投入少, 科研投入强度仅为 0.8%, 低于全省 2.88% 的平均水平; 高端科技人才稀缺, 国家级和省级重大创新平台少、重大科技项目少; 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 产学研合作成效有

待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规模偏小、发展速度偏慢。科技发展的的问题, 与人才支撑问题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引才力度不够大, 政策激励机制不够完善限制了科技发展, 而科技水平不高, 平台少又影响了人才的引进与留用。

(三) 教育培训支撑不足

广东省职教城坐落清远市, 但每年毕业生能留在清远本地就业的比例不到 20%, 绝大部分学生都到深圳、广州、珠海等珠三角一带去谋求发展, 清远市并没有享受到职业教育的红利。与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相比, 清远市的高校数量少, 科研院所也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尚需进一步加强, 必须冲破区位优势, 主动“入珠融湾”, 破除藩篱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此外, 清远要利用城乡融合示范区建设的契机, 借助国家政策和地方资源优势, 引进更多高质量的高等院校、有发展前景的项目, 以高校集聚人才, 以人才促进项目。

(四) 人才政策吸引力不够

目前, 清远市已出台相关人才政策, 如《清远市引进培养高精尖缺人才的若干规定》《清远市进一步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的实施意见》。但由于清远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外围, 地理位置、经济发展速度与湾区内城市相比, 在区位上缺乏优势, 在“人才争夺战”中如不能有更强的政策性支撑, 不仅引才难, 而且现有人才呈现流失态势, 引才留才政策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才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尊重人才氛围还不够浓厚。香港、深圳、广州对清远人才的虹吸效应明显, 要彻底改变清远引才难、留才难、用才难的局面, 必须出台更有吸引力的政策。

四、粤港澳大湾区创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人才支撑的政策建议

(一) 发展产业优势, 夯实经济支撑

一是深化广清一体化, 聚力打造千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广清两市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为依托, 以产业合作园区为载体, 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 加快打造一批千百亿级产业集群, 如新材料及精细化工千亿级产业集群, 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等百亿级产业集群,推动广清产业联动发展^[5]。二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以全域旅游为抓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紧扣生态资源就是生产力的主题,立足五区一县一市的生态价值,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巨量的旅游市场,以全域旅游打通三产融合的发展关系,构建以旅游为主导的跨区域合作平台,促进旅游产业共推、品牌共建、环境共治、交通互联、设施共享,形成与湾区都市功能互补的城乡融合新局面。三是立足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发展壮大丝苗米、岭南蔬果、畜禽、水产、南药、茶叶、花卉、油茶、竹等特色产业集群^[6]。做大做强“粤字号”农业知名品牌,发展预制菜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大湾区“菜篮子”清远配送中心建设,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仓储保鲜、初加工。

(二) 强化科技赋能,加强科技支撑

一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要强化政策创新,破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地汇聚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7],依托“一廊十核多节点”的空间格局,利用区域产业集聚平台、大科学装置平台和企业开放创新平台,推进创新资源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频繁流动、深度共享,同时也积极吸引全球创新要素资源,充分发挥广东的产业集群与创新优势,持续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二是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构建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通道,发挥广深港澳科技走廊技术成果优势,推动科技成果在广清接合片区转移转化。要发挥粤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等为依托设立技术转移机构,开展科技转移转化服务活动^[2]。探索在广州科学城建设高层次人才交流合作驿站,支持清远市在广州的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等聚集区设立产业共建前端孵化器,建立广清“研发—设计—孵化—加速—产业化”全链条科技创新与转化平台,围绕广清两地的主导产业培育孵化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的中小微科技企业,积极培育“独角兽”企业^[5]。

(三) 发展职业教育,完善教育培训

一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职

业院校的建设,创建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区和国际职业教育发展中心。鼓励大湾区职业院校开展协同育人,突出粤港澳三地职教融合发展理念,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向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支持校企共同组建合作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充分发挥各集群产业优势,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持续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能力。鼓励职业院校设置涉农相关专业,加大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8]。二是发挥职业院校继续教育功能。支持职业院校面向在职员工、退役军人、城乡待业人员、高素质农民等社会群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面向“三农”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和技

(四)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鼓励人才下乡返乡

一是重点引进高精尖缺人才。紧密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产业需求,根据产业布局 and 产业发展需要确立引才目录,精准引才。应想法设法引进科技前沿的技术带头人、科研领军人物,资助产业高端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技术培训或去国内外访学。建立“一流人才一流报酬”的引导激励机制,构建重实效、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工资体系。要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工作环境,建立健全人才的求学就业、研发平台、子女就读、社会保障等服务体系;在人才的职务晋升、学术活动等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和支持,体现人才的能力价值、知识分量、工作成绩^[9]。二是鼓励优秀人才下乡、返乡。粤港澳大湾区要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人才体制机制,破除城市人才下乡障碍,提升优秀人才流入意愿和实际效用。允许符合条件的返乡或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落实科研人员入乡兼职兼薪、离岗创业、技术入股政策。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得报酬^[5]。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

建立健全农业人才发展的各项机制体制。

结束语

城乡融合是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路径,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抓手。人才是城乡融合的关键。人才支撑体系中经济支撑、科技支撑、教育支撑、政策支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有机体。要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制定出适合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的人才支撑体系,有力地推动国家城乡融合示范区的建设,为中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提供粤港澳大湾区经验,粤港澳大湾区方案。

参考文献:

- [1] 李庚泽,蔡淇旭,蔡春林.广东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及对策[J].广东经济,2023(6):30-34.
-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2021-04-15)[2023-08-05]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h/content/post_3270861.html
- [3] 韩乃寒,陈跃,武墨青.公安院校实战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探究[J].创新与创业教,2023(6):58-62.
- [4] 关于发布清远市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的公告[EB/OL].清远市统计局(2023-01-29)[2023-08-05]http://www.gdqy.gov.cn/qytjj/gkmlpt/content/1/1664/mpost_1664935.html#7985.
- [5] 黄舒旻.广清一体化再添新目标[N].南方日报,2022-10-25(GC02).
- [6]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N].南方日报,2023-02-27(A02).
- [7] 黄叙浩,郑佳欣,龙金光.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推动国际一流湾区建设[N].南方日报,2019-03-05(A02).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5).
- [9] 冷元元.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河南省人才支撑问题研究[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9(1):121-125.

【责任编辑:余伟】

新时代港澳青年国民教育比较研究

陈卓武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港澳回归后, 中央政府和港澳特区政府对国民教育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 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 但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港澳两地历史背景相似、回归时间相近、政治地位相同, 但两地青年的思想政治动态和意识形态认同却有较大反差。在新时代“国安教育”开展的背景下, 从历史和现实出发, 在比较制约港澳地区国民教育发展复杂因素的基础上, 从制度引领、社会协同、文化浸润、体系完善等方面着手推进政府治理与监管、增进爱国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联动、筑牢共同体意识和重塑教育主导权, 能够有效加强港澳地区青年国民教育, 增强港澳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关键词:港澳青年; 一国两制; 国民教育;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48-06

回归以来, 澳门始终对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信任, 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秩序, 澳门社会在身份和国家认同上展现出强大的“向心力”,^[1]这与香港形成鲜明对比。港澳两地的历史背景相似, 回归时间相近, 政治地位相同, 但在社会政治现状上却产生较大差异, 两地青年的思想政治动态和意识形态认同也有较大反差, 这一状况引人深思。

对于港澳地区的认同差异和归属感差异, 学界主流认知归结为国民教育问题,^[2]但是如何从宏观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整体性论述, 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即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观察港澳两地国民教育的历史演进和政策变迁, 总结分析港澳两地国民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基本规律, 阐述阻碍因素, 为推进港澳两地青年国民教育深入发展提供对策参考。

一、港澳青年国民教育实施状况分析

(一) 港澳青年国民教育历史演进概况

从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至今, 香港的国民教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公民教育中“身份意识”、“国家认同”等概念提出阶段、从“公民教育”向“国民教育”过渡阶段、国民教育风波阶段、国民教育“政治缺失”后遗症显现阶段、国民教育新时代阶段。2020 年 6 月 30 日颁布的《港区国安法》, 明确了中央政府的职责, 进一步对香港国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在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 均就落实《国歌条例》《国旗及国徽条例》, 做好国民教育等制定了具体举措。

与香港有所不同的是, 在回归之前, 澳门就出现了“主权还未回归, 人心却已回归”的现象。回归后, 澳门特区政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收稿日期: 2023-06-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路径研究”(21YJA880006); 2021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香港青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业意愿及引导路径研究”(2021WT037); 2021 年度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党史文化传播力研究”(GDWL21YB12); 2021 年度广东工业大学统战理论研究课题“推动港澳青年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路径和方式研究”

作者简介:陈卓武(1968-), 男, 海南临高, 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青年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行政区基本法》为指引，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历年施政报告均提出了与时代、与形势相呼应的政策和具体措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公民与道德》课程体系为基干的“爱国爱澳”教育内容，构筑起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在澳门市民和青年中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爱国爱澳成为澳门特区政府工作的底色、主流和特色。^[3]

（二）港澳青年国民教育政策取向

总体来讲，港澳两地特区政府在制定国民教育政策时都注重顶层设计，以各类学校作为主要教育渠道，并辅以社会活动作为多元载体。但就具体政策内容和施政取向而言，两地政策存在显著差异，香港地区的国民教育政策内容历经一系列变化，连贯性不足。澳门地区的国民教育政策则具有连贯性，始终力求增强澳门青年的政治信任度、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取得良好成效。^[4]

香港的国民教育由其殖民地时期的公民教育发展而来。^[5]在香港回归之前的过渡阶段，港英政府出台的公民教育政策对主权回归、国民身份等核心问题刻意回避和模糊，造成这一时期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水平低下，对回归后香港地区国民教育的推行产生影响。回归后，香港居民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义务关系发生质变。随着内地和香港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多，产生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与过渡时期遗留的国家认同问题一并构成了香港回归后所面临的认同构建课题。2012年香港教育局接受《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提案，引发“国教风波”。“修例风波”后，随着港区国安法的颁布实施，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小学全面推广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从“国家观念”“历史文化”等数个方面，以“专题研习”“内地交流”等多元载体，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国民教育^[6]。这一措施表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厉行国民教育改革、强化香港青年观念认同的决心。

澳门地区的国民教育政策相对稳定，对于青年群体的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感培育成效显著。自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就高度重视国民教育问题，于2000年推出关于国歌、国企、国徽和区旗、区徽的相关教材，推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7]2006年至2015年，澳门特区政府先后颁布

《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等制度，构建起一整套培养澳门青年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国家教育体系。澳门地区的国民教育以历史文化教育为特色，在中小学课程教学中大量融入近代以来国家取得卓越成就的内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有效增强了澳门青年的国家和文化认同感。^[8]除设置相关课程外，澳门地区也强调通过升旗仪式、国歌齐唱等仪式性活动增强国家观念和情感。^[9]在师资培育和教材建设方面，自2004年起便启动“骨干教师培训计划”，组织中小学教师赴内地参加教学培训，并积极与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适用澳门地方情况的教材。^[10]此外，得益于相关开展的教学合作和旅学活动，澳门青年有大量机会在内地进修研学或实地参访，大大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港澳青年国民教育效果的制约因素比较

（一）历史遗留因素：社会意识差异

从宏观视角看，殖民政府的统治对两地回归后国民教育的推行产生深刻影响，港澳两地社会中的殖民文化差异亦导致两地在国民教育施政方针上的差异。

港英政府在其殖民统治时期内，通过刻意意识形态引导和社会文化建构，将香港社会中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矛盾异化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并通过强调“世界公民”和“本土保护”的概念，塑造了新的香港本地意识。^[11]在教育措施方面，港英政府扶植英文教学，干预中文教学，以“重英轻中”为根本教育政策。^[12]即使进行迫不得已的教育改革，仍然带有明显“去中国化”色彩，间接导致了回归以后香港人长期处于政治疏离状况。^[13]回归过度阶段，港英政府通过“还政于民”等策略，下放对学校的管制权，培养了一批反中乱港的教育界代理人，为香港后续教育埋下隐患。^[14]在长期的殖民教育影响下，香港居民对于祖国内地和中华民族的情感联系较为薄弱，产生了一系列身份认同和社会治理问题。

虽然澳门受殖民统治的时间更长，但由于近代

葡萄牙本土经济孱弱、政治动荡，澳葡政府对于澳门地区的管控和治理薄弱。在澳葡政府统治时期，澳门管治机制呈现二元化特点，澳门当地华人群体主要以“社团自治”的模式存在，与葡裔群体交流融合程度低。^[15]这一历史背景下，澳门地区受殖民主义影响较小，在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方面与祖国内地有更为强大和紧密的联系。此外，在教育政策上，澳葡政府当局一直采取“葡语官办、放任私校”的做法，允许多元社会力量办学。^[16]澳门本土青年往往就读于华人办立的学校，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大量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了较高的爱国意识和反殖民主义意识。自回归前的过渡时期起，澳门当地华人社团更自发地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管治连通。这也是澳门地区“去殖民化”较为成功，与内地联系紧密，国家和历史认同度高的重要因素。

（二）社会发展倾向：文化认同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战略考虑，决定暂不收回港澳两地，但两地随之进入了同内地相隔绝的状态，人员往来锐减，三地之间逐渐产生距离感，港澳两地的身份认同也逐渐出现新的变化。

新中国的文化认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港澳社会内的资本主义杂糅儒家文化存在差异。在 1967 年的反英抗议活动被镇压后，香港精英群体的政治认同日渐右倾，与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合流形成“右派”势力，占据香港社会主流。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香港本土文化产业日渐繁荣，在政策和教育的引导下，逐渐形成香港本土的特殊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回归”间接加速了“香港人”归属认同和香港本土意识构建，并最终塑成了影响香港至今的本土认同和本土意识。^[17]与香港有所不同的

类别	香港	澳门
殖民政府总体政策	刻意的意识形态引导和社会文化建构	管控和治理薄弱
殖民政府教育政策	“去中国化”“去政治化”	“葡语官办、放任私校”
对居民的影响	不能深刻认识殖民历史	较高的爱国意识和反殖民主义意识
阐述的后果	产生系列身份认同和社会治理问题	去殖民化成功，国家和历史认同度高

表 1 港澳地区社会意识差异比较

类别	香港	澳门
社会文化基础	儒家文化	
殖民时期社会特点	“右倾化”的本土保守认同	华人社区与内地联系紧密
回归前期社会意识变迁	“香港人”归属认同产生和香港本土意识构建	中国大陆和澳门本土爱国力量形成联合
产生的后果	形成本土认同和本土意识	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

表 2 港澳地区文化认同差异比较

是，在澳葡政府统治时期，澳门华人群体的心态始终游离于殖民统治之外，缺乏归属感。^[18] 在较长的时间内，澳葡政府甚至依赖华人社团与澳门民间和中国官方进行沟通，澳门当地华人群体借此与内地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澳门“一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和澳门本土爱国力量在联合对抗葡澳政府的事件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澳门实际控制权被爱国力量掌握，华人社团获取了更高的合法性，进一步推动

“爱国爱澳”成为澳门地区共同的价值观基础。^[19] 因此，在身份认同上，澳门人始终对中华民族和祖国内地有很强的归属感。

（三）特区政府职责：教育体系差异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港澳两地在办学模式、学校管理、教师管理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成为影响港澳两地国民教育成效不一的重要因素。

回归后，中央政府并没有对港澳的办学模式进行改变。根据香港教育局统计数据显示，当前香港 90% 以上的学校都由社团和教会主办，而由政府开办管理的学校不足 8%。^[20] 由于对教育主权和治权的层层下放以及多元办学理念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对学校教育缺乏检查评估、督促落实的有效手段，也缺乏明确的考核指标，导致教学实践中出现较大偏差。而在澳门，特区政府建立多元评核机制来引导和管理学校教育，并加强教育质量保障。早在 2001 年，澳门就已经开始订立“学校综合评核”机制，旨在协助完成各校的教学和发展校务。2006 年，《非高等学校制度纲要法》规定：“教育行政当局要对学校进行系统的综合评鉴或专项评鉴，以协助学校教育持续改革与发展。”此后澳门各校持续进行综合评鉴与专项评价，有序研发指标的评鉴示例和学校自评的工具，建立“学校自评”指针系统。

在支持学校持续提升其教育素质之余，澳门特区政府又有针对性地协助学校实施发展性计划，进行教育资源的统筹调控，促进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21]。

类别	香港	澳门
回归前教育特点	私立学校为主	
教育体制	教育权层层下放，基本不由政府所掌握	有完善的考评机制，政府对教育资源统筹调控
课程教材管理	下放给学校和市场自主实施，缺乏必要管控	政府对教学活动强化管理，积极对教材改革和管理
教师培养	香港教育局未真正承担起教师管理职责	联合内地力量进行管理 and 教师培训

表 3 港澳地区教育体系差异比较

除教育权的层层下放外，香港特区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也缺失必要的管控，香港教科书呈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状态，缺乏监管和审核机制，易被乱港分子夹带错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对学校教育产生严重不良影响。香港的国民教育既未独立成科，亦非必修课程，主要由学校自主实施，不能做到教学目标、内容和课时等的有机统一。而澳门特区政府对学校教学活动的管理较为严格。2014 年澳门颁布了《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对澳门本地各个阶段的教育的课程框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与教学时间等的要求，同时努力对教材进行改革和管理，紧紧抓住本地教材编写的主导权，通过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共同为澳门编写专门的历史教材，并实现了该教材的全覆盖。

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国民教育的开展，教师起着关键性作用。香港教师基本注册于“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该协会承担着教师的培训责任，但该会近年的言论和行径往往与教育专业不符，反而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有违教育宗旨。澳门的师资力量长期依托内地教育资源进行教师培训。至 2009 年，除语文外，澳门中小学数学、地理、科学、自然等学科甚至幼儿园的骨干教师，基本都曾在内地参加轮训。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统计，2018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在职人数为 7131 人，在 2008–2018

年,仅华南师范大学就为澳门培养培训基础教育师资近 4800 人。

三、加强港澳青年国民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 制度引领:推进政府治理与监管

制度体系建设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是推进国家认同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

一是从国家层面优化顶层设计。中央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巩固基本法在港澳的法定地位,从而逐步将“去中国”势力从校园内清除。港澳特区政府应逐步完善并细化国民教育开展的相关政策,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建立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教育共同体行动计划”。^[23]通过引导三地青年的多维互动,帮助湾区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各地的文化社情与法律制度,增进相互认同与理解。

二是从特区政府层面明确教育导向。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是特区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维护基本法权威,推动“一国两制”落实的必然之举。澳门特区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的国民教育政策导向,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最终效果^[24]。香港特区政府应将“爱国爱港”原则贯彻到香港教育体系中,要以基本法为基本遵循,及时调整国民教育相关内容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优化国民教育的教学与传播方式,构建和完善国民教育体系。

三是从社会层面完善教育监管和反馈。澳门特区政府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国民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加强监督、重视过程反馈是一方面,另外也需要构建多主体的协同,诸如利用政府其他部门、学校、社会组织 and 家庭等协同监管,多元联合,建立起长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促进以国安教育为主体的青年国民教育体系化。

(二) 社会协同:增进爱国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联动

港澳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较为完善,居民对其认同度高,在教育、政治、文化等领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港澳地区的国家认同教育应当发挥社会组织与团体的正向作用,增进社会协同与联动。

一是从政府层面引导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与创造力。敦促社会组织和团体自觉遵守基本法的规定,

加强政府的资金、设备等物质性投入,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或社团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活动。依托社会组织专业优势,扩大国民教育在民间的传播声量,为青年了解国家提供多样化的渠道选择。重视对青年社团的引导与培育,强化青年社团在青年人国民教育和爱港爱澳教育的重要载体作用。

二是从社团层面积极助力“爱国者治港治澳”。应该进一步推动各类爱国组织与社团的联动作用,通过增进其政治参与,在充分体察民情的基础上,将社团构建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之一,积极培养“爱国爱港爱澳”接班人,推进爱国社团的有效传承发展。

(三) 文化浸润:筑牢共同体意识

弘扬中国主流文化,成为“去殖民化”,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抓手。

一是以国史教育增进情感保障。在港澳国史教育中,应加强对中国近代史以及现代史的教育,加大这部分内容在国史教育中的比重,增进青年对国家良性的集体记忆,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提高对国家政权系统的支持,增强对国家的认同。

二是以岭南文化搭建连结桥梁。岭南文化是粤港澳三地的重要纽带,可以被用作唤起三地共同记忆的重要载体。身处于新时代,脱胎于岭南文化中的各类粤语流行歌曲、影视作品、舞龙舞狮等深受三地青年喜爱。要进一步推动开展此类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文艺联动活动,发挥其文化连结作用,唤起三地群体共同记忆。

三是以当今国情教育为支撑增进国家认同。近些年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新冠疫情的抗击上更是取得瞩目成就,但部分港澳青年对于国家成就的“体认感”缺失。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丰富国民教育中的经济、科技、体育、社会等非政治元素,将港澳青年真正地融入到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增进对当今国情的认识与了解,促进对国家的认同感。

(四) 体系完善:重塑教育主导权

要牢牢把握教育的主导权,不断落实和健全国民教育体系,促使港澳国民教育运作过程行稳致远。

一是加强特区政府的教育监管。特区政府应当充分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全面完成现有法规的厘定,

强化对国民教育的监管,不断加强对教育教材编写修订、课堂教学、课程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审查监督和统筹工作,同时重视对教材内容的监管查处,确保各项工作符合“一国两制”要求。

二是构建爱国爱港爱澳教师队伍。特区政府应不断推进完善教师从业的政策与规定,要对全体教师进行系统完整的宪法和基本法、国家安全法的普及教育,要进一步完善大中小学和幼稚园教师赴内地交流考察机制,建立爱国爱港爱澳、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三是创新国民教育方式。充分发挥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专业人士作用,有效吸收视频、艺术设计以及流行漫画等方面备受青年人喜欢的设计人群,以青年人的视角设计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优化国民教育素材设计。鼓励教师在课程讲解中融入家国教育、爱国荣国等话题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祖国。增强实践教育在港澳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比重,更大程度推进港澳学生赴内地考察和交流访学,使港澳青少年真实感受国家发展,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加深对“一国两制”的正确理解。

参考文献:

- [1] 王晓笛.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与管治机制变迁——以国家基础性权力为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4(01):64-71.
- [2] 详见:袁持平.澳门的“一国两制”与“人心回归”[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21):6-12;陆春萍,李臣之.共同体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国民教育政策探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04):126-131;屈宏,梁闪闪.香港教育去殖民化问题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5(03):62-72;等.
- [3] 常乐.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J].青年发展论坛,2019,29(06):14-22.
- [4] 洪伟.回归以来澳门青年国家认同研究:进展、问题与前瞻[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3):57-64.
- [5] 彭蔼.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8.
- [6] 高德胜,李玲.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改革路径[J].中国德育,2020, No.272(08):39-43.
- [7] 安宁,曾敏.中学地理教材对内地与港澳身份认同的影响[J].当代港澳研究,2019(02):41-65.
- [8] 邹平学.澳门“一国两制”成功经验与深层规律——基于港澳比较的研究视角[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21):13-24.
- [9] 赵联飞.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青年发展回顾[J].青年发展论坛,2019,29(06):3-8.
- [10] 胡荣荣.回归以来澳门中小学的国情教育:发展与经验[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27(02):63-76+158.
- [11] 黎熙元,姚书恒.60年来港人身份之惑[J].文化纵横,2010(06):116-121.
- [12] 屈宏,梁闪闪.香港教育去殖民化问题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5(03):62-72.
- [13] 徐淑芹,夏璵.香港教育管理的变迁:1842—2020[J].港澳研究,2021(03):83-93.
- [14] 屈宏,梁闪闪.香港教育去殖民化问题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5(03):62-72.
- [15] 王晓笛.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与管治机制变迁——以国家基础性权力为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4(01):64-71.
- [16] 张桂菊.港澳“多言多语”教育政策对比研究[J].教育评论,2011(06):99-101.
- [17] 强世功.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变迁与价值认同变迁[J].法律文化研究,2016(00):279-286.
- [18] 赵凤莲.澳门青年政治参与新动向及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17(01):45-49+94.
- [19] 吴璧君.澳门为何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J].特区经济,2019(12):9-10.
- [2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EB/OL].<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2021-07.
- [21] 冯增俊,江健,郭华邦等.澳门回归十周年教育发展战略与未来走向[J].教育研究,2010,31(01):69-74.
- [22] 华南师范大学.在澳门,华师培养了超七成中小学教师[EB/OL].<https://news.scnu.edu.cn/29527>.2019-12.
- [23]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0836.htm, 2019.
- [24]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出“关怀青少年成长资助计划”[J].中国德育,2009,4(09):93.

【责任编辑：陈童敏】

台湾统派的内涵及其团体的统一主张探析

林 伟, 胡 时

(1.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州 510400; 2. 广东岭南干部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0)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台湾统派团体的存在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也是当前岛内反“独”促统、维系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本文拟在梳理台湾统派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其整体思想主张及其不同流派的理念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对台湾统派团体开展工作的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台湾统派;爱国统一力量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4-0054-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坚定反‘独’促统。伟大祖国永远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1]可见,台湾统派团体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支柱力量,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然而,当前台湾统派整体处于台湾政治生态的边缘,这导致有关台湾统派的研究为数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以台湾统派团体本身为研究对象研究台湾统派的概念、存在的意义、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如吴陈舒的《台湾统派的概念演变及其对祖国统一的启示》、任冬梅《浅析台湾统派的现状及未来走向》^[2]等文章。这些研究大多将台湾统派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对待,缺少对具体台湾统派团体的思想主张进行解剖。实际上,台湾统派政治力量松散、内部主张不一。因而这些研究只能从宏观上对台湾统派的概念予以把握,较难为整合台湾统派工

作提供有效的政策依据。二是以台湾统派为切入点研究台湾热点问题。这类研究在台湾统派研究中占比较多,如郭艳的《从台湾“统派”现状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陈斯俊的《从二十大报告看新时代的两岸、国际形势与统派使命》^[3]等文章。它们主要以台湾统派为视角、紧跟时政热点来考察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这对本研究厘清台湾统派的当代价值有一定启发。但由于其聚焦点不在台湾统派,而是通过台湾统派团体作一现象描述以引出其真正研究对象,因而缺乏对台湾统派的具体分析。三是在围绕台湾选举制度这一论题对台湾统派团体予以研究,如李睿《台湾地方选举中的派系研究》^[4]一文。这类研究对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素材,但数量极少且对统派的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聚焦台湾统派的内涵及其团体的统一主张,尤其是分析不同统派团体具体理念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为发展壮大台湾统派团体的难点

收稿日期:2023-08-20

基金项目:武汉市统战部 2023 年度武汉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台湾统派团体的统一主张及其工作策略研究》(WHTZ202303)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林伟(1979-),女,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部教授、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专家,研究领域为:港澳台海外统战理论;胡时(1996-),男,广东岭南干部学院文化与统战教研部助教,研究领域为:台湾研究、红色地方史研究。

及工作思路。

一、台湾统派的内涵辨析

“统派”这一概念在台湾社会讨论语境中出现较早,但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一般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中国大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丧失中国“合法代表性”,“统派”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在台湾政治环境的讨论中^[3]。随着台湾“统独”议题的发酵,统派的概念形成,其范畴也在不断发展。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统派团体在台湾社会进行公开活动,始于台湾蒋经国“执政”末期。随着台湾解严,两岸关系解冻,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台湾代表人物逐渐公开宣传统一主张。被誉为“台湾统派一面旗帜”的王晓波,在1991年创办了《海峡评论》杂志。该杂志被视为台湾统派团体最早的宣传阵地。在《海峡评论》创刊后的第一期,他就在《寂寞之后——统派在台湾能做什么?》一文中探讨了台湾统派的现状和应该承担的使命。该文认为:“真正的统派是一个对‘长远’的统一大业尽一点微薄但有正面贡献的力量。统派起码有两个工作可以做,一个是基本立场的澄清,一个是对于台湾一元化的资讯系统(特别是有关大陆的部分)的突破”^[4]。当时的台湾统派团体对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认为国民党顽固坚持与大陆的“不完全交往”,是为了维持其政权不坠的“一己之私”。因此,以吕正惠为代表的台湾统派人士认为真正的统派团体不应包含国民党这一“假统一”团体,“真统派”必须反对国民党^[5]。然而,当时的台湾统派并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内部存在推动统一的真正力量。

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内部坚持“一个中国”的“正统力量”非常强大,且对根基未稳的李登辉构成了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李登辉方才制定《国家统一纲领》(以下简称“《国统纲领》”)来安抚党内人心。“《国统纲领》”虽有明确宣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进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的积极因素存在,但是也为统一设置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台湾经验登陆大

陆”等不切实际的统一前提。李登辉颇为得意的认为这份“纲领”能让中共“难进难退”^[6]。由此可见,李登辉主导制定的《国统纲领》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谈“统一”。随着李登辉“台独”行径的显露,引起了国民党内存在的坚持与大陆统一的力量的不满,更导致以国民党“少壮派”赵少康为首的党内人士出走另组新党。由此可见,李登辉执行的“台独”路线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也表明国民党党内是存在统一力量,且力量不弱。与此同时,“台独”分子及其支持者一直将国民党看作是台湾统派的成员。例如,民进党一直将国民党内的代表人士以及离开国民党另组政党的人士(包括马英九、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等)都看作是统派阵营的力量;同时将有影响力的蓝营媒体(如《中国时报》、《联合报》)归为“统媒”。近年来,各类统派团体在台湾的选举中也大多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由此可见,目前国民党仍然属于台湾岛内统派团体能够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本身也属于台湾统派的范畴。在当前岛内“蓝绿两色”基本政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其它台湾统派团体也需要联合国民党共同对抗民进党当局。

从政治立场看,目前台湾统派的包含三类政治光谱的政治团体。第一类是“红统”,以李敖、郭冠英、林正杰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立场多为否定“台湾当局”目前的“中华民国”国号,支持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7]。目前,台湾岛内代表的政党 and 团体有“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华爱国同心会”、“台湾人民共产党”等。

第二类为“联合派”,以连战先生为代表。他们主张台湾的未来必须跟大陆做一个连接,而且不排除未来接受一个“联邦或邦联的中国”。^[8]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施明德、张亚中、郝伯村、吕秀莲等台湾政治人物或学者。他们大多认为,一方面,两岸终归不能回避统一问题;另一方面,在不认同大陆统一模式下可提出新的统一模式来与大陆展开政治协商与对话。“联合派”大多愿意且已经提出了具体的两岸统一主张。比如,原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就联系郝伯村等人共同发表“大一中架构”也称之为处理“两岸问题五原则”方案,国民党内“深蓝”

代表张亚中所提的“两岸统合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三类“蓝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蓝营”为主流，又称为“华统、右统”。他们在两蒋时期的立场是“反共”、反“台独”，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9]。代表人物多为国民党资深将领、部分国民党党员及其支持者，例如郝柏村、周锡玮、冯淬帆、贺伯台等。目前“蓝统”是台湾统派中的主流。然而，随着“蓝统”人数出现大幅萎缩以及两岸实力对比急剧变化，“蓝统”在统一问题上发声不多。在对大陆的态度上，“蓝统”也大多不再坚持“反共立场”。但也有不少人转变为“隐性台独”^[10]。

需要关注的是，台湾统派团体基于自身的需求在不同场合会体现不同统派光谱的立场。以新党为例，依其党纲，新党应被视为“蓝统”成员；但是按其 2019 年党庆公布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新党已然成为“红统”的一员。而新党知名青年代表侯汉廷在 2017 年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不管怎么统，只要中国人团结、对台湾人好、对两岸同胞好，就好”^[11]。这说明，他认为统一方案只是手段，只要能达到实现对两岸同胞都好的统一目标，可以采取不同的统一方案。这又体现了联合派的观点。

综上所述，台湾统派的个人、政党和团体均主张两岸应该统一并致力于推动两岸统一；因此，通常认为，台湾统派指的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的个人、政党或团体^[12]。以此论之，台湾统派团体包含了最广泛的团体，包括：以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台湾人民共产党、中国红色统一党等政党或社会团体为代表的“红统”，以新党部分成员和国民党党内部分“深蓝”成员为代表的“联合派”，以及以国民党、新党、亲民党为代表的“蓝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意识到，台湾不同统派群体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因而我们要在充分了解统派团体不同主张的基础上坚定支持每一个坚守民族大义的统一派群体，引领他们支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并朝着这一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的两岸统一最佳方式而努力。

二、台湾统派的统一主张及其工作策略辨析

从统一主张看，统一联盟党、中华统一促进党、劳动党统一思想主张较为接近，倾向于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按照“一国两制”模式实现国家统一。统一联盟党认为，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尊重两岸政经制度，促进国家统一”。中华统一促进党则希望“促成两岸在一国两制架构下的和平统一”。劳动党则主张“两岸和解、终结内战状态、消弭海峡战争危机，逐步走向统一”。近年来，新党也向“红统”转变，在坚持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率先响应大陆方面有关倡议，提出了新党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方案。由此可见，上述统派政党的统一主张，都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其具体统一主张与大陆所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较为接近。

相比之下，作为“蓝统”的主要代表，国民党的统一主张更强调所谓的“中华民国”正统性地位。例如，国民党的领导人虽明确反对分裂，但同时也为统一预设了大陆实行所谓的“政治民主化”等多项前提，并对“一国两制”采取拒不接受的态度。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亲民党，他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同时，其政策纲领中也出现了维护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确保“中华民国”国际生存空间的字样。除此以外，统派政党的主要分歧还体现在“一个中国”的具体认同上，统一联盟党、新党在“一个中国”的认同上呈现出“模糊”状态。中华统一促进党则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亲民党则坚持“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并且通过所谓的“一中各表”来坚持“中华民国主体性”。

从工作策略看，上述统派政党则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国民党倾向“规范化”推进国家统一。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间”较长，主导“台湾地方当局”制定了多项规范两岸往来的“制度性”文件，这些规范文件长期以来指导了国民党的统一工作策略并由此形成了国民党开展统一工作的路径依赖。比如《国家统一纲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规章制度”始终是国民党主张与大陆

进行交流,推进统一的规范。国民党主席率团来大陆交流,均强调是按照“台湾当局”制定的“法律法规”来与大陆进行交流,以此捍卫国民党一贯坚持的所谓“中华民国”立场。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亲民党。在反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行径上,国民党一般也以“法律”规定进行批判和对抗。比如,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时常引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中“一国两区”的规定来批驳蔡英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的“台独”观点。

新党统一的工作策略特点表现在其灵活务实上。作为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政党,在其统一工作策略上,一方面沿袭了国民党的工作方法,在扩大两岸多层次交流,服务台商、帮助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以及与大陆官方保持良好沟通上发挥独特作用;另一方面,相对于国民党统一策略的“保守”,新党善于根据两岸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自己的统一主张。其成立之初坚持所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时任党主席郁慕明则被“调侃”为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但是随着两岸交流,尤其在其目睹了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进步后,新党领导人逐步抛弃自身偏见,认同大陆所提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当前,该党不仅拥有了完整的国家统一论述,而且也尽力维系自身作为岛内“统派先锋”的定位。

统一联盟党的工作策略则突出表现在“学术性”上。统一联盟党的成员都是文化知识分子,其主要负责人均为经办报刊出身且大多有博士学位和担任大学教职的经历。其中,原党主席纪欣也曾担任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并在台北出版了《“一国两制”在台湾》专著以系统介绍大陆“一国两制”方案酝酿出台和实践的过程。统一联盟党的党章也罕见地出现了“研究”字样,即:“研究和发展民族整合,实现国家统一的知识和理论”。

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工作策略表现在其联系组织的“基层性、草根性”上。该党总裁张安乐并不否认党员有相当部分具有黑社会背景。这种“帮派”背景虽然给其活动的合法性带来一定的争议,但却能够使其深入台湾基层民众中开展工作,并在游行示威中较其它统派政党或团体更有战斗力。

劳动党的统一工作策略具体体现在对国民党以外的统派小团体的联系整合上。在诸如团结台湾统

派团体合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促成台湾统派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敬告执政党等行动中,劳动党都从中斡旋,并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团结作用。

三、台湾统派发展面临的问题探析

当前台湾统派团体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台湾统派团体因力量分散而难以整合。作为最主要的统派政党,国民党因长期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倒退以及在选举期间对统派其它团体“始乱终弃”,而在统派团体阵营中缺乏公信力,难以发挥领头羊作用。与此同时,台湾各种统派团体虽然绝对人数少,但是团体数量较多,这导致台湾统派团体总体上理念庞杂,难以自发地进行有效整合。据本研究粗略统计,在党章中公开表达支持统一立场的政党组织就有23个。在行动中支持统一立场的统派社会团体则难以精确统计。

二是受“台湾当局”打压严重。自2016年上台以来,民进党为两岸重重设限,打压岛内统派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在民进党当局把控下,台立法机构通过修改“国安五法”,制定所谓的“反渗透法”对台湾统派团体进行打压。在具体操作上,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例如针对新党“干将”王炳忠、侯汉廷、林明正等知名统派人士,台当局利用其掌握的“司法权力”,以“共谍案”不断起诉他们。导致这一官司纠缠王炳忠等人前后长达五年时间,使得他们无法正常往来两岸,开展工作。

三是缺乏人才储备与资金支持。在人才储备上,统派团体整体十分薄弱。目前台湾统派团体仍处于“创党一代”的奋斗阶段。然而,“创党一代”的年龄已经普遍偏大,体力和精力已难以应付台湾社会日益尖锐的政治斗争环境。尽管近年来各统派政党和社团组织都为吸引年轻人着力不少,但收效不容乐观。即使青年工作最出色的新党,也只是培育了在台湾政坛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党三杰”,无法与民进党培植的青年势力相提并论。在资金支持上,由于民进党当局设立“不当党产委员会”对国民党进行“清算”,国民党的运作经费一度捉襟见肘。筹款已经成为国民党主席的首要任务。其它台湾统

派团体则由于长期影响不足,领取不了台湾当局的“政党补助金”,因而需要靠收取高额党费来维持其基本运营^[13]。

四是与“独派”团体相比,统派团体整体能力不足。首先,台湾统派团体使用的宣传工具相对单一,多为传统的报刊。在新媒体如日中天,传统报刊杂志普遍式微的情况下,统派团体的发声空间变小,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14]。其次,台湾统派团体缺乏强有力的国家统一论述。例如,作为统派中坚力量的国民党因其长期的“不统不独不武”论述被社会各界人士戏称为岛内“小绿”。这反映了,与民进党“台独”强势论述比,国民党有关“统一”的论述十分无力。而其它统派团体虽然有各自的统一论述,但是由于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参选能力而只能在投票时选择国民党候选人,以致于他们所提出的统一主张的影响力被削弱。

四、推进台湾统派团体工作的思路建议

针对台湾统派团体发展面临的整体力量分散、“台湾当局”打压、缺乏人才储备、资金支持和能力不足的现状,本研究就推进台湾统派团体工作给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坚持做好台湾统派团体的整合工作。首先,与国民党深化沟通交流,通过持续地对话协商,使其能早日脱离不切实际的统一主张,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在探索国家统一道路上形成更为有力的统一论述。其次,支持劳动党继续为推进台湾统派团体整合而努力。最后在肯定台湾统派团体推进祖国统一做的贡献的基础上,也要步步为营,发挥大陆在台湾统派团体整合中的主导权,比如摸清台湾统派团体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秉持先易后难的工作方法,把台湾统派政党中政治主张、价值取向接近的人优先实现跨党派的联合。

第二,持续与民进党当局对台湾统派打压的恶劣行径作斗争。首先,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发声,揭露“台独”分裂势力打压台湾统派团体的别有用心,营造“反‘独’无罪,促统有功”的舆论氛围。^[15]二是考虑特别立法,缩限民进党当局的“法治”操作空间。比如,制定专门法律加大对“台

独”势力的惩戒力度,并将“台湾当局”打压台湾岛内统派团体作为判定“台独”的重要罪证依据。三是积极打造海内外“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积极为台湾统派团体发声,帮助其扩大国际影响,最大程度消解民进党的话语空间。

第三,不断帮助台湾统派团体中青年骨干队伍的成长壮大。一方面,我们要在与台湾统派政治团体联系的过程中发掘可资培养的青年骨干,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使其在组织中快速成长。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意识地培育拥护统一的台湾青年群体。在进一步扩大台湾青年学子来大陆学习、交流和就业的过程中,配套完善对台湾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体制机制,将一个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教育融入台湾青年在大陆的生活情景中,使其从生活和思想等层面不断认可大陆的发展成就,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做联结。

第四,持之以恒帮助台湾统派团体提升工作能力。首先,我们要持续呼吁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台湾统派团体承担更多的民族责任,鼓励他们更为积极的投身统一事业。其次,我们要综合运用各种交流互动平台向他们讲好如脱贫攻坚、科技攻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多维度多方面的“中国故事”,在这一互动交流中,启发台湾统派团体更好运用自身特色与岛内“分裂”势力做斗争。第三,我们要发挥主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比如开展针对性学习培训等方式帮助台湾统派团体提升他们的宣传能力、论述能力。

当前,两岸关系虽受到“台独”逆流冲击,但是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仍然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大势。我们要在对台湾统派团体有效整合、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对台湾统派团体的打压以及有效帮助台湾统派团体成长壮大等方面做好工作,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让台湾问题早日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注释:

- ① 参见:吴陈舒.台湾统派的概念演变及其对祖国统一的启示[J],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17(1);任冬梅.浅析台湾统派的现状及未来走向[J].台湾研究.2018(1).

- ② 参见: 郭艳. 从台湾“统派”现状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15); 陈斯俊. 从二十大报告看新时代的两岸、国际形势与统派使命. 统一论坛 2023(1).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党的二十大辅导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2.
- [2] 李睿. 台湾地方选举中的派系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2: 81-104.
- [3] 王晓波. 统派观点 [M]. 台北: 海峡学术出版社, 1997: 1.
- [4][5] 吕正惠. 寂寞之后——统派在台湾能做什么? [J]. 海峡评论. 1991(1).
- [6] 李强. “国统纲领”透视 [J], 台湾研究集刊, 1991(4):32.
- [7][8][9] 任冬梅. 浅析台湾统派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J]. 台湾研究. 2018(1):40-41.
- [10] 台湾“统派”路在何方? [EB/OL]. 新华网, 2010-03-09,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0-03/19/content_13200841.html.
- [11] 吴薇. 台年轻统派讲“中国人认同” 多元形式宣传统一立场 [N]. 环球时报. 2017-1-18.
- [12] 邵俭福, 官捷. 对“九合一”选举后台湾统派发展战略的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6):61.
- [13][14] 明庭权. 台湾岛内统派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解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3):81.
- [15] 刘晓楠, 苏昌强. 当前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J].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2):68.

【责任编辑: 温开照】

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创新发展、经验及启示

梁 雯，夏 泉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统筹国内外侨务工作，持续推动侨务工作改革创新；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在健全法治、引智引资、侨社发展、为侨服务、文化宣传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着力完善与发展侨务工作政策体系，力求侨务工作更加完善、更加精准、更加便捷，开创了侨务工作发展新局面。我国侨务工作取得的重要成就，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凝聚认同，坚持服务大局密不可分。在新征程上，党的侨务工作应紧抓时代机遇，实现各项工作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侨务工作；海外统战工作；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4-006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统筹国内外侨务工作，持续推动侨务工作改革创新，形成了以侨团组织体系、华文教育体系、文化传播体系、侨务外宣体系、引智引资体系、为侨服务体系、法规规划体系为支撑的国家侨务事业和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搭建起侨务战线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1]。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2]，着力涵养侨务资源，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2023 年 5 月 8 日，习近平在京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海外华侨华人致以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中央对广大海外侨胞的殷殷关怀。

侨务工作是学界研究热点，学术成果丰硕，学界聚焦党的侨务工作的理论逻辑、历史进程、实践进展探析新时代侨务工作发展路径^[3]，相关研究成

果多为对侨务政策演变历程、发展思路的系统分析，而在以侨务工作“四梁八柱”作为划分依据、论述侨务工作各部分的改革创新及凸显新时代党对其完善与发展方面的成果则相对较少。本文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阐述党的侨务工作的改革创新，并总结凝练对新时代党开展侨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及启示。

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侨务工作，着重强调侨务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提出了创新我国侨务工作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重要作用的要求。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

收稿日期：2023-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2022 年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VMZ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雯（1998-），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专业硕士生；夏泉（1966-），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

善政策、强化服务,依法保护华商投资兴业权益,鼓励和支持广大华商为中国发展献智出力”,并希望广大华商把握机遇、发挥优势,积极联结海内外交流合作^[4]。2014年6月,习近平在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5],强调海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鼓励广大海外侨胞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2017年2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我国侨务工作开展要“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6];同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最大限度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进中外交流合作、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2020年10月,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发表讲话,指出“要继续鼓励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重要作用,在经济特区发展中作出新贡献”^[8],鼓励广大侨胞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014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特别是华裔新生代的联系交流,围绕海外侨胞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促进海外和谐侨社建设”^[9],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改革创新侨务工作。2018年1月,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全国侨务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强调“突出为侨服务、团结凝聚侨心,创新体制机制”^[10],进一步凝聚海外侨胞力量。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新增“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党的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为新时代开展侨务工作与海外统战工作提供指引与遵循。2023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在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发表讲话,向广大海外侨胞发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11]的号召。2023年8月,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

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代表党中央致词,强调加强党对侨联工作的领导,加强侨联组织党的建设并深化其改革、提升其自身建设水平,建设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可信赖的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12]。

二、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的改革创新举措

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需结合世情、国情、党情与侨情,不断完善整体布局 and 强化基础建设,确保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入新时代,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着力完善与发展侨务工作政策体系,力求侨务工作更加完善、更加精准、更加便捷,开创侨务工作发展新局面。

(一)构建侨务工作法治体系。世纪之交,中央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等涉侨法律,奠定制定侨务政策的法律基础,构成比较完整的侨务法律体系。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提升侨务工作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侨务工作法治体系的完善健全,确保面向广大侨胞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合法有序。

其一,进一步完善涉侨法律法规体系。201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同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完善华侨投资法律制度。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党注重夯实侨务工作法治基石,为新时代国家开展侨务工作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法律法规依据。

其二,健全涉侨政策举措。2013年6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公安部、外交部印发《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规定》,规范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程序。2014年6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教育部印发《关于华侨学生在国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有关问题的通知》,解决海外华侨回国后子女入学问题。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标准，优化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程序；同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 年）》，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对我国侨务工作做出明确规划。一系列涉侨政策为海外侨胞身份认定、在国内接受教育、出入境、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

其三，注重加强涉侨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自 2011 年以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的侨务政策法规宣讲团多次奔赴海外开展政策法规宣讲活动，如 2016 年侨务政策法规宣讲团在日本大阪等地宣传我国涉侨政策法规^[13]；同时，以中国新闻社、中国网等为媒介，通过网媒、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完善普法工作，及时、积极向侨胞宣传科普各项涉侨政策法规。

（二）构筑引资引智环境。侨务资源是我国经济腾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战略资源^[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凝聚侨心侨力侨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新时代国家实施更加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推动引进侨资侨智侨技三者协调推进与融合发展，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尊重个性、鼓励创新、宽容舒适的就业创业环境。一是充分发挥侨资优势。各地方与有关部门积极推动侨商产业聚集区“侨梦苑”建设，为华侨华人打造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2014 年 11 月，全国首个“侨梦苑”在天津揭牌。据国务院 2023 年 4 月提交的《国务院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目前我国已在 15 个省（市）设立 17 家“侨梦苑”，充分发挥侨胞丰富的人脉关系、智力资源，助力国家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大力引进海外人才。自 2015 年起，有关部门分别举办两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和中国侨商投资大会，鼓励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创业。同时，国家加大“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力度，规范、精简外国人来华工作与居留审批程序，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有特色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格局，充分吸纳海外高质量人才。

三是积极引导华侨华人参与国家发展大局。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先后发起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中央鼓励海外华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务院支持建立沿线国家侨商社团合作委员会与华侨华人跨境电商合作联盟，搭建“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信息发布平台^[15]；2019 年 2 月，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更好发挥华侨华人的纽带作用，为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平台。

（三）促进侨社和谐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提升侨团组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加强对侨团组织建设的宏观指导，为促进海外侨团组织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将 2014 年确定为“和谐侨社建设年”，以推动侨团组织发展为抓手，以服务广大海外侨胞为重点，务实推进海外和谐侨社建设：一是发挥“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平台作用，通过促进交流合作团结华侨华人，引导海外侨团加强基础建设；二是加大“海外惠侨工程”实施力度，建设“华助中心”，倡导“团结、互助、服务、奉献”精神，共同推动和谐侨社建设；三是实施海外人员培训（研习）计划，增强侨领做好侨社工作、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深入发展为侨服务工作^[16]。

（四）完善为侨服务体系。党始终致力于开展海内外为侨服务工作，以实际行动增强其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十八大以来，党积极推进侨界民生服务便捷化、精准化发展，在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等方面给予归侨侨眷一定的照顾。

一是推进建设国内为侨公共服务体系。中央将涉侨行政事务纳入地方行政服务，设立地方政府涉侨办事窗口、社区侨务工作示范点等为侨服务平台，建设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侨之家”、“侨胞之家”建设，为广大侨胞营造良好生活环境；设立网上办事大厅，为其在华发展提供便利、优质、高效服务。

二是支援海外抗疫。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蔓延，海外一些反华势力喧嚣尘上。为维护海外侨胞合法权益，我国采取捐赠医疗物资、派遣医疗团队、与各国政府进行交涉等多种方式，为海外侨胞提供援助与支持。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展现大国责任担当，提升了海外侨胞来华发展信心。

三是不断深化海外为侨服务工作。中央搭建平台满足境外公民跨境办理公证事务的需求，如 2021

年5月广州公证处和广东省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服务中心合作研发“广州公证远程微信办理平台”,帮助侨胞解决疫情期间身处海外的侨胞办理公证业务等现实困难。

(五) 创新文化宣传手段载体。新时代,我国积极开展侨务文化宣传工作,锐意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文化。

其一,深入推进侨务外宣工作。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有关部门充分依托现有工作渠道和人脉优势,多途径多渠道开展侨务公共外交,以各级海外交流协会、高端侨界活动等为平台,深入发掘有深厚人脉关系的公共外交资源;同时举办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等活动,引导华文媒体发挥增信释疑作用。

其二,大力拓展海外华文教育工作。中央坚持将开展华文教育列入侨务工作的重点,着力规范华文教育教材编写工作与创新华文教育工作形式:推进海外华文教育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如2018年12月专家组终审鉴定通过国务院侨办重点项目“周末制中文学校教学大纲(小学阶段)”项目具体成果^[17];进一步推动华文教育网络化进程,精心打造网络课程,如华侨大学通过“云课堂”、“云培训”、“云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系列线上华文教育活动。

其三,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进入新时代,我国各地方和有关部门积极聚合海内外侨务文化宣传资源,采取华侨华人住在国广场演出、海外华人社团活动、文化节和巡游等方式,通过举办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增强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三、把握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规律

进入新时代,党准确把握侨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注重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海内外友好交流合作搭桥铺路,鼓励广大侨胞紧抓国家发展机遇,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总结侨务工作的丰富经验,要深刻把握好五个重要规律:

(一)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国侨务工作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侨务工作开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中推进各项工作。进入

新时代,党对侨务工作作出系列顶层部署,并多次重申党对侨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18]。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明确规定由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侨务工作,不仅有效保证党对侨务工作全局的有效掌控,还强化了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2020年底中共中央颁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化了侨务工作顶层设计,为新时代我国侨务工作的开展和侨务政策的完善提供根本遵循。

(二)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思维方法^[19]。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20],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央在开展侨务工作时毫不动摇地坚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基本原则,实时捕捉世情国情党情侨情发展变化,确保侨务工作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央完善健全涉侨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创新普法宣传工作方式;聚焦海外侨胞合理诉求,采用高新技术打造网络平台,推动为侨服务工作精准化、便捷化发展;突破疫情、地区等因素的制约,发展网络华文媒体,开展线上华文教育活动,通过网络平台强化海内外文化交流。

(三)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凝心聚力,原因在于其做到兼顾照顾利益、政治认同、品德感化、能力取胜、尊重信任、思想引导、和谐环境、人本价值八大要素^[2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始终本着“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时刻关注海内外侨胞的生存发展,以切实行动关心团结广大侨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为侨胞及归侨侨眷排忧解难,突破地域限制着力凝侨心、聚侨力、汇侨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突出人本价值,始终坚持以人文精神关怀广大侨胞及归侨侨眷,充分汇集民心、凝聚认同。

(四) 必须坚持凝聚认同。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2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侨务工作着力增强广大侨胞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党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科学决策,通过推进华文教育工作、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政策主张等方式提升新生代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情感认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进一步增强华侨华人对祖国发展的认同,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五) 必须坚持服务大局。党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海内外资源,将侨务工作与国家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鼓励海外侨胞以短期回国讲学、技术交流、学术合作等方式报效祖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侨融通中外的优势;支持归侨侨眷紧抓机遇,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鼓励广大海外侨胞成为海内外交流的民间“形象代言人”和“重要宣传者”,助力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党从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出发对我国侨务工作做出整体规划,凝聚侨心侨力,不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和支持,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争取最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四、新征程开展侨务工作的启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强调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奋进新征程,我国侨务工作应坚持与发展党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提升各项工作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 实现党的统筹协调能力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3],我国侨务工作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新征程,我国开展侨务工作要着力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统一领导机制、牵头协调机制与各负其责机制^[24],进一步提升党的统筹协调能力,整合调动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优质资源,确保整个侨务工作系统上传下达、协调配合,强化其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侨心侨力凝聚到党的周围,引导广大侨胞与党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二) 实现为侨服务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充分体现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我国侨务工作“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实现侨务工作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侨务工作队伍及时捕捉侨情变化,根据华侨华人不同群体的特点精准施策,提升为侨服务工作实效。为维护保障海外侨胞的基本利益,进一步提升基层为侨服务工作质量,侨务工作队伍应提升海外侨情变化分析研判能力,构筑多元多维度的互动叙事途径^[25],维护海外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利益;中央统战部应统筹协调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提高各地方有关部门为侨服务便捷化、精准化、数字化水平,形成机制化、长效性、全覆盖的基层为侨服务工作网络^[26]。

(三) 实现团结联合能力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工作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作用,促进海内外文化融合、加强文化交流,更好地凝聚侨心侨力。其中华文教育、华文传媒和华侨团体是凝聚认同的有效渠道^[27]:采取多样化的华文教育办学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认同;强化海外华文媒体引导,紧密国内媒体与华文传媒的合作,客观全面地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文化;进一步规范华侨华人社团,通过华侨社团组织打造品牌活动,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坚持“传承”与“传播”同向同行。

(四) 实现协调社会关系能力的现代化^[28]。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为国家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26]。我国侨务工作应提升协调社会关系能力,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一方面,深化海外人才引进机制体制,充分开发广大华侨华人创造活力,调动侨胞参与国家发展大局的积极性,充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基本原则,强化侨务法治建设,确保侨务工作合法有序,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29]。

参考文献:

- [1] 冉文娟. 着眼“大侨务”、发挥“大作为”——访十九大代表、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EB/OL]. (2017-

- 09-30) [2023-06-14].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7/09-30/8344419.shtml>.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0.
- [3] 赵健.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侨务政策的回顾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8年(4).
- [4] 梁小琴, 张文.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俞正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N]. 人民日报, 2013-09-26(1).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63.
- [6] 孙立极.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李克强作出批示 [N]. 人民日报, 2017-02-18(1).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28.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76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825.
- [10] 王尧. 杨洁篪在全国侨务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强调 奋力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8-01-24(4).
- [11] 李昌禹. 习近平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王沪宁蔡奇参加会见 [N]. 人民日报, 2023-05-09(1).
- [12] 李希.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侨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在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N]. 人民日报, 2023-09-01(2).
- [13] 中国新闻网. 国务院侨办侨务政策法规宣讲团赴大阪宣讲交流 [EB/OL]. (2016-10-19) [2023-06-14].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6/10-19/8037166.shtml>.
- [14] 陈云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4): 52.
- [15]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 [EB/OL]. (2023-04-24) [2023-05-16]. <https://www.pkulaw.com/chl/1b1d3f753d1ccbd5bdfb.html>.
- [16] 中国新闻网. “走进国侨办”新闻发布会问答选登 [EB/OL]. (2014-03-20) [2023-06-14]. https://www.chinanews.com.cn/zgqj/2014/03-20/5975949_2.shtml.
- [17] 胡建刚, 洪桂治, 张斌, 孙菁, 赵雅青. 世界华文教育年度发展报告(2019) [J]. 世界华文教学, 2020(1): 6.
- [18]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2-05-21(1).
- [19] 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N]. 人民日报, 2023-02-23(5).
- [2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0.
- [21] 张献生. 凝心聚力: 统一战线的根本功能和价值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统一战线的经验和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3(4): 11-16.
- [22]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人民日报, 2022-07-31(1).
- [2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24] 钱再见, 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4): 7.
- [25] 柳彦.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趋势、挑战与应对 [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3): 30.
- [26] 刘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有关侨务工作条款学理分析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49.
- [27] 张禹东, 庄国土, 陈文寿, 游国龙.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8) [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28.
- [28] 陈奕平. 海外侨胞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逻辑和新时代启 [J]. 世界民族, 2023(2): 14-23.
- [29] 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N]. 人民日报, 2023-02-27(5).

【责任编辑: 余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成果研究

何婉文

(中山大学统战部, 广东 广州 510100)

摘要: 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地各级政协产生的 43 个实践创新案例, 借助类型学的分析方法, 将这些成果分为协商平台创新、协商组织创新、协商制度创新三种类型。这些创新实践推动政协协商从“封闭”向“开放”转变, 推动提案办理从“虚功”向“务实”转变, 推动评价考核从“定性”向“定量”转变。新时代,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健全制度保障、推动理论创新。

关键词: 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 实践; 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66-05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乃至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推动下,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更加健全, 运作更加高效。针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广东各地政协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实践创新, 不断推动政协协商民主深入发展。梳理总结广东各地各级人民政治协商实践的创新探索, 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广东经验”, 对于深化人民政治协商理论研究、推进政协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广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基本路径

广东各地政协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 不断探索协商民主的有效平台, 优化协商民主的组织, 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制度, 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实践模

式。本文对实践创新成果的分析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级人民政协产生的 43 个创新案例。按照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主要内容, 本文将这些创新案例按创新的路径分为协商平台创新、协商组织创新、协商制度创新三种类别, 其中不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是综合性的。

(一) 协商平台创新

1、构建“数字政协”平台

2020 年初, 由广东省政协打造的全新“数字政协”平台正式全面上线。“数字政协”平台是一个集约化协商民主平台, 该平台整合了原有的政协履职方式, 建立了履职、协商、互动、资讯、智库五大核心板块, 开启了广东省政协委员“掌上履职”新时代, 为委员履职提供一站式服务, 促进委员高效履职。此外, “数字政协”平台作为“数字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次构建省、市、区(县)三级政协组织与政府协同的新模式, 是全国范围内的创

收稿日期: 2023-08-23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中山大学研究基地 2022 年研究课题一般课题成果, 获 2022 年广东省政协“人民政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主题研讨征文评选二等奖

作者简介: 何婉文(1983.9-), 女, 中山大学党委统战部、统战理论宣传教育岗主管(讲师), 研究方向: 政协理论研究。

新。为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财政资金,形成全省政协系统信息化建设一幅图一张网,2020年8月,广东省政协印发《广东“数字政协”平台应用推广工作方案》。随后,在汕头等2市3县政协开展试点,12月中旬各试点单位的“数字政协”平台全部上线,目前已累计推广至50个市、县政协,惠及基层政协委员1万余人。

2、构建“政企协商”平台

广东经济总量已连续3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依然存在,急需拓宽政府与企业的协商对话渠道。2017年7月,广东省政协与省政府联合搭建了高规格、高层次政企协商平台“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是新时代助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广东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5年来围绕“进一步优化我省营商环境,促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等主题共举办9场座谈会,邀请140多名粤商代表与省长深入协商交流,提交9份调研报告,梳理总结39方面138条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建言聚智、凝聚共识,并推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全面建立企业家与市政府主要领导面对面协商机制,相继涌现出“广州经济发展‘上半年怎么看、下半年怎么干’协商座谈会”“佛商·市长面对面”“茂商·市长面对面”等政企协商平台,组成了广东省政企协商、共谋发展的强大方阵。

3、构建“委员议政”平台

委员强则政协强,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为减少“年委员”的现象,广东各地政协积极探索建立“委员议政”平台,在课题组收集的创新成果中,这方面平台的数量是最多的。2018年,广州市政协创办了“有事好商量”平台,邀请相关界别委员全程参与,与政府相关部门、党派团体、专家学者组成联合课题组,共同开展调研、考察、研讨、协商。截至2021年12月,协商平台围绕34个议题协商,开展专题调研240余次,召开专题协商会150余次,先后有560多名政协委员参与,共提出540多条对策措施。此外,各地政协还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委员议政”平台,如深圳市政协的“委员议事厅”、佛山市南海区政协的“委员聚焦”融媒体议政平台、

佛山市顺德区政协的“论道顺德”建言资政平台,这类的创新协商平台充分调动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二) 协商组织创新

1、政协组织内部的优化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建立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的指示,广东省政协积极探索优化与调整相关职能的专委会,于2016年增设联络工作委员会,统筹委员履职服务管理和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工作。联络工委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委员精细化服务管理,在建章立制、队伍建设、协调联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推动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落地落实。2018年,为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省政协增设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把分散在不同专委会涉及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职能和力量整合在一起,为推动“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组织保障。此外,为更好发挥界别作用,切实解决委员界别身份认识模糊、界别活动较少、界别特色不突出等问题,2019年清远市政协设置30个界别小组。界别小组每年制定活动计划,开展“以收集界别群众意见建议为重点,主题突出、形式多样、凝聚共识”的活动,并根据活动主题邀请对应行业、专业代表参加,扩大了界别活动参与面和影响力。

2、政协组织向基层的延伸

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要求:“要支持各级政协设立面向基层的履职平台,探索建立镇(街道)、村(社区)协商议事平台”。如何突破制约基层协商的“瓶颈”,更好地发挥协商民主在基层的作用,是新时代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课题,广东各地政协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创新。

一是建设专门的工作机构。2017年4月,河源市政协以连平县为试点,成立了乡镇政协联络工作委员会。目前,全市乡镇(街道)都按照“有专门工作机构、有固定办公场所、有专职工作人员、有专项工作经费、有翔实工作内容、有规范工作制度”的“六有”建设标准成立乡镇(街道)政协联络工作委员会,将政协工作拓展延伸至向乡镇。二是建设政协委员履职的平台和阵地。2017年,深圳市龙

华区政协探索打造并初步形成了“1+11+N”的政协工作平台（即一个区政协委员联络服务中心+11个“委员之家”+N个委员联络站），实现了界别、街道、层级全覆盖，并且在较为成熟的社区和委员单位建立了“委员联络站”，“家”“站”积极组织政协委员开展视察调研、协商座谈、建言献策，累计组织或参与基层协商议事活动119场次，参与委员2000余人次。三是建设委员工作室。2014年，广州成立国内首个政协委员个人工作室——“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工作室”，该工作室凭借“改革广州地铁建管模式，建立城市‘大交通’体系”的提案，首次亮相“两会”。工作室涵盖专职人员3名，是政协委员个人出资建立，定位为协助委员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更好的吸纳民众意见、归纳整理民众意见，将其反应传达至相关部门。之后，广东各地开始着力探索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广州市番禺区政协和肇庆市四会市政协从2016年开始陆续设立镇（街）委员工作室、行业协会委员工作室和委员个人工作室，推动政协工作继续下沉。

（三）协商制度创新

1、总体制度创新

总体制度的出台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到“硬约束”的华丽转身。在这方面工作较为突出的是广州市政协。2009年9月，广州率先在全国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这一规程明确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的原则，要求切实做到“对重大问题的协商在市委决策之前、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前、市政府实施之前”；细化了“市委在市政协同市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协商”等十项内容，规定了“制定协商计划”等五项程序。2010年5月，在广州试行的基础上，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布实施，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政绩考核。目前，除了广州，还有深圳、阳江、梅州、茂名、肇庆、汕头、揭阳、韶关等多个城市出台了市一级规程。

2、委员管理制度创新

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是政协工作的活力、潜力所在。广东各地政协积极构建协商履职、组织管理、队伍建设体系，为委员唱好“主角”提供优质条件和制度保障。广东省政协制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出台委员联系群众实施办法，推动委员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常委更好发挥“关键少数”作用。2008年广州市政协首次探索建立委员履职档案，制订并且实施《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关于建立委员履职档案的办法》，走上了以建立委员履职档案为抓手，继而开展委员履职管理和服务的探索之路。广州市政协制订《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委员履职量化综合评价办法》，细化了与之配套的《广州市政协委员履职量化分值测算表》赋分标准，编制了《政协委员履职手册》，形成比较成熟的履职管理体系，落实和丰富了完善委员管理服务制度的工作要求。四会市政协制订了《政协四会市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履职管理办法》《四会市镇（街道）委员工作室工作规则》等35项履职制度，为规范履职提供制度保障。

3、提案办理制度创新

从2008年开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率先垂范，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自此，党政主要领导督办政协重点提案成为了广东省政协提案工作的首创经验和特色品牌。目前，我省已建立起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多层次、宽领域的提案督办体系，督办省政协重点提案、省政协主席会议重点提案、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专题提案和省党政部门“一把手”牵头的提案，形成了强大的督办合力。提案办理答复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广东省政协探索建立重点提案持续督办机制，选择一些B类响应的提案，即正在解决或已纳入计划的提案，并对其处理情况进行定期督办和“回头看”研究，以促进办理工作落到实处。近年来，广东省政协也在积极探索建立省、市、县（市、区）三级联合督办机制，形成了各级政协委员、各级部门联动起来共同为解决区域性问题出谋划策的一番好景象，是我省政协委员履职历史上的创新实践。广东各地政协亦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不断探索加强和改进提案工作的途径和方法，如汕头市政协创新“提案+”工作机制，推动

提案督办与民主监督、民主评议、专题协商等多种履职形式有机结合，多层次、全方位推动提案办理提质增效。

4、立法协商制度创新

立法协商长期是政协协商最薄弱的领域，开展立法协商是立法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深圳市政协从2016年开始开展立法协商工作，在这方面走在前列。6年来，市政协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等事关深圳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地方性法规开展了协商。协商过程中，市政协召开各类座谈会120余次，征求数万人意见，向深圳市委提交立法协商建议报告22份，提出建议269条，采纳率达到80%以上。2021年，市政协致力于立法协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创新性地开展制定《政协深圳市委员会立法协商工作规则》和编制深圳地方标准《深圳市政协立法协商工作规范》两项工作，其中《规则》是全国及地方政协开展立法协商工作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之一，“地方标准”2021年12月13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在全国属首创。

二、广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总体成效

上述成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地各级政协在平台、组织、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的创新风貌。各地政协的一系列实践创新，为解决政协协商不透明、不重视政协协商等问题探索了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协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成效是显著的。

（一）政协协商从“封闭”向“开放”转变

政协协商民主的运作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政协协商曾经与人民群众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是极少数社会精英的事。但通过不断创新，广东各地的政协推动政协协商走向开放。如“数字政协”平台在“粤政协”专区开设“提案线索征集”栏目，拓展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发表意见的新途径。两年来，已有超过12万名网友登录“粤省事”微信小程序，提交1700多条提案线索，供委员撰写提案参考，推动党委政府持续关注民生。广州市政协的

“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与广州日报、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合作，更加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三年来，利益相关群众代表近3000人次参加协商，人民群众通过受邀全程参与调研视察、讨论协商，先后解决了“老楼房的电梯梦”“加强高空抛物治理”等30多项民生问题，政协协商本身也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开放性。

（二）提案办理从“虚功”向“务实”转变

过去，主要是由提案人对办理单位的复文进行评价，容易走过场。广东各地政协根据实际不断探索创新，相继建立健全了“高层督办工作机制”“提案持续督办机制”“省、市、县（市、区）三级联合督办机制”“清单式提案工作机制”等机制，并先后出台文件对提案办理协商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有力促进了提案办理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我省协商民主实践提供坚强制度保障。例如，深圳市政协的创新“清单”清楚地表明了提案的撰写水平和办理质量，这对提案方和办理方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促使双方把事情做实。据记录，2017年到2021年，每个提案落实的项目数量从1.6个增加到9.61个，提案办理办理有效性不断提升。

（三）评价考核从“定性”向“定量”转变

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履职主体，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履行自己的职能，表达人民的意见和诉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探索，本质上是保障和促进政协委员的履职活动，因此，完善评价考核标准，推进政协履职能力现代化，是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重要方面。过去，由于缺乏数据依据，对政协委员工作的评价主要是定性判断。2016年全国政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对委员履职保障、履职管理作出了明确指引后，广东各地政协积极开展委员履职管理的探索之路。其中建立的委员履职量化管理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委员责任担当意识不强、履职作业质量不高、责任担当机制薄弱等种种问题。比如在已制订《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委员履职量化综合评价办法》的广州市，自2017年以来，广州市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建言资政，每年合格率均在96%以上，优秀率在55%以上，履职量化成效显著，其委员履职成绩作为新一届委员连任的主要依据之一，

量化考核对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关于进一步推进广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建议

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践创新正确发展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这既是对人民政治协商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新要求，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广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过往的实践创新成果证明，只有坚持党对实践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符合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要求，确保人民政协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以期实现更大作为。要进一步推进实践创新，就要积极发挥广东政协各级党组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对于实践创新事项，党组会议要先于主席会议研究，确保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确保实践创新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健全制度保障，是实践创新不断推进的关键所在

汪洋同志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强调：

“要进一步健全协商制度，注意总结新鲜经验和做法，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进一步推进实践创新，一方面要将创新实践管理制度化。一是要有评估机制，鼓励创新实践的成果真创新，树立正确的创新导向。二是要有激励机制，单纯依靠自发创新是不可持续的。三是要有引导机制，创新实践的目标要着眼于解决真问题。另一方面要将创新成果制度化。实践中，许多创新因为领导更替而终止，或者缺乏实质内容而终结，因此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创新的先进实践经验，不仅应当在当地形成制度固定下来，还应上升到更高级别的制度给予保障。

（三）推动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提质增效的有力抓手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既需优化具体操作，更需发展人民政协理论。上述分析的实践创新成果，更多为具体操作，尽管它们成效显著，但仍然缺乏理论的指导。一方面，实践创新需要得到系统总结提炼，进而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实践创新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支持，没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就难以取得大的实质性突破。推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提质增效，必须抓住理论创新这个前提，在创新中谋发展，在实践创新内容和方式上转变思路，把准工作着力点和价值取向，增强政协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责任编辑：陈童敏】

彰显人民政协制度优势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余 伟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 要: 人民政协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是新时代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人民政协制度在治理效能转化上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 为此, 要提高凝聚共识工作水平, 筑牢国家治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创建凝聚共识新载体, 构筑线上线下同心圆。

关键词: 人民政协; 制度优势; 国家治理; 统一战线;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71-0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 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 更好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如何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是新时代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人民政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优势作用

(一) 人民政协民主协商优势, 有利于协调国家治理各主体的利益关系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主责主业, 无论是事关国计民生,

还是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通过人民政协民主协商, 能够达成广泛共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社会阶层不断分化, 人民的利益诉求更加多样, 思想更加复杂, 社会治理也必将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比如, 住房、教育、医疗、生态环境、房屋拆迁问题等, 有些方面靠刚性的行政执法, 效果未必能让群众感到满意。人民政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组织体系最为完善的协商机构, 它具有政治性、人民性、广泛性, 其履职的目的就是要凝聚广泛社会共识, 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人民政协可以广泛吸纳社会治理的各方力量参与民主协商,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在协商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各方利益相关代表在民主协商的氛围中提倡有理有节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广开言路, 在协商中兼顾各方利益, 形成全社会最广泛的共识, 从而有效减少国家治理中的各种风险和阻力。

(二)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优势, 有利于增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创造和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收稿日期: 2023-08-10

基金项目: 2021 年广东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基地科研项目“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研究”(gdsyzx-06)

作者简介: 余伟(1980-), 男, 民进会员,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讲师,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民进广东省委会参政理论研究会委员, 主要从事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

要求,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政协的一项主要职能,它是“软性”监督,地位超脱,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等有很大的区别,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进行民主监督,可以及时纠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和问题,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有利于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做好执政党的好帮手、好同事、好参谋。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在为国家治理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环境的同时,对国家实施的重大项目、重大事项进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各界别委员的专业优势,撰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出各种真知灼见,为完善国家治理的各项政策提供重要依据,从而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例如,广东省政协连续三年聚焦“推进我省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这一中心工作,开展大规模、多层次、全覆盖的协商式民主监督。从沿海到山区,从田间地头到特色园区……三级政协联动开展民主监督,切实拓展了民主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为广东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科学决策注入了磅礴的政协力量。

（三）人民政协人才资源优势，有助于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才智支撑

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目前在全国范围涵盖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9个政党、8个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3000多个政协组织、60多万各级政协委员。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在推进国家治理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国家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众多领域和层面,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与智力资源强有力的支撑。人民政协素有“人才库”、“智囊团”之称,聚集着大批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委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人民政协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其庞大的人才与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体现,这是其他的组织无法

与之比拟的,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优质高效的智力支持,把人民政协人才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例如,政协组织全力支持和组织动员科技界、医卫界等界别委员参与到疫情防控和科研攻坚中,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疫情防控和国家治理等议题献计献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优势，有利于巩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一项重要职能,这是由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定位决定的。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1]。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疫情全球蔓延的趋势依然严峻,国内社会结构深刻改变,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只有广泛凝聚共识,人民群众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巨大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人民政协既是商量国是的主要平台,又是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通过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可以更好向各界别群众广泛宣传与贯彻落实,形成共识。同时,人民群众利益诉求问题、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这一渠道直达党政高层,最终形成有利于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各项政策措施,凝聚社会广泛的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国家治理合力,形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人民政协制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把握不准

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是人民政协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也是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作用的基石。人民政协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发挥着协商建国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

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主责主业，通过协商制度的有效运行，把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选项，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从而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当前还存在有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协委员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认识不足，对政协履职的意义、重要性认识不够。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务虚成分较多，政协工作只是走走形式和程序。有些人把政协委员仅仅当成是一种政治荣誉或光环，缺乏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动力和能力，甚至在履职工作中不敢于、不愿于聚焦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界别群众关切的重要问题。部分政协委员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情况，有的认为“民主监督没有强制力，不如不监督”。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把握不准，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程度。

（二）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更加凸显，凝聚共识的难度增大

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在发挥凝聚共识功能作用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对中国不断进行渗透，贸易战科技战越演越烈，在中国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领域不断挑起事端，同时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更增加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着深刻改变，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社会思潮更加复杂多变，人民政协在凝聚思想共识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加上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中西文化交融交错，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决心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作为年轻的一代更容易受到西方思潮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使得人民政协凝聚思

想共识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影响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共识基础。

（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新的挑战

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全球网民数量急剧上升，中国已成为了第一网民大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2]。互联网也成为了网络民意的集散地，由网络舆情发展导致现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由于网络监管不力，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安全等问题频频发生，对网络社会治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新媒体平台的崛起不仅打破了主流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也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权。人民政协为适应互联网发展需求，创新了数字政协、掌上履职APP、网络远程协商、网络议政等工作形式。但对于如何有效收集网络社情民意、科学研判网络舆情，丰富网络参政议政手段，发挥政协在舆论引导和民主监督的积极优势，发挥好新的社会阶层网络人士在凝聚网络社会共识、弘扬网络正能量作用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相关工作机制设计，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人民政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三、切实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进路思考

（一）提高凝聚共识工作水平，筑牢国家治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高凝聚共识工作水平，才能更好服务国家治理。要始终把凝聚共识贯穿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工作中，建言资政是履职成果，凝聚共识是更重要的履职成果。在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履职工作中，要有效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善于分析总结和提炼，凝聚民情民智，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在会议协商、专题协商、双周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网络远程协商

履职工作中,鼓励认真讨论而不各说各话、各抒己见而不偏激偏执,在交流中完善建议,在共商中集思广益,推动实现反映意见和建议和释疑解惑良性互动、民主氛围和协商效果有机统一^[3]。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习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比如民族差异、宗教信仰差异、利益诉求差异、思想价值观念差异等等,无论是何种差异,都必须建立在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这个一致性的基础上,团结积极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转化消极力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化解矛盾,增进最大共识,为国家治理筑牢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队伍能力建设，提升参与国家治理能力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的主体力量,是做好政协工作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也指出政协委员要“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习,提高人民政协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水平,增强履职工作的实效性。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文件精神,通过开展理论培训,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增强履职工作的理论水平,做到“议政议到关键处、参政参到点子上”。二是要提高政协委员的协商议政能力。国家治理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对政协组织、政协委员的协商议政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开展协商议政,要注重协商议题的前瞻性、论据的科学性、建议的可操作性,为党委政府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科学的依据。要立足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履职工作要紧扣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以及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提升政协参与国家治

理的效能。三是要定期开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学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就是提升我国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学习,进一步提高人民政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水平,不断参与国家治理的社会实践,提升委员的综合能力水平。

（三）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治理水平影响国家治理水平,基层治理能力关系国家治理能力。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成熟完善的制度设计和组织架构体系,政协委员来自于基层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对基层社会的难点、痛点问题较为了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融合发展,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向基层有效延伸工作手臂的重要方式,依托政协组织、委员工作站等平台,通过创新基层协商形式,不断丰富基层的恳谈会协商、政协工作站协商、庭院协商、街道协商、楼宇协商、“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基层群众的重要关切,发挥好政协协商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政协委员联系广泛、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优势,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和落实下去,把基层群众好的意见建议收集起来,营造平等协商、理性协商的民主氛围,在协商中做到化解矛盾、促进广泛团结、实践人民民主,助推地方党委政府切实解决好基层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 and 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充分利用好政协工作站、街道、社区、媒体、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各种资源和优势,主动争取基层党政部门的支持,因地制宜的搭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和推动、各方参与”的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工作格局。如,2022年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围绕5个议题“‘双减’齐聚力,家校社共育”“促进本地文化旅游发展”“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维育的建议”“关于促进广州市非公有制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议”“提升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水平”开展协商,具体协商情况和协商成果,通过《有事好商量》节目向社会展示,并通过新闻媒体刊发专题报道,进一步彰显人民政

协商民主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

（四）创建凝聚共识新载体，构筑线上线下同心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了新时代，也进入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中国网民数量达10亿以上，是世界上网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广大网民群众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活动，发表见解，反映利益诉求，早已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4]人民政协要顺应时代潮流，运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融入到政协工作中，创建凝聚共识新载体，为广大网民更加便捷的实现政治参与、建言献策提供制度化的渠道，推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和网络社会治理的融合发展，构筑网上网下同心圆。一是要筑牢政协工作网络主阵地。建立健全各级政协组织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平台，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化解矛盾、收集民意的工作，增强网络平台的互动功能，拓宽网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增进广大群众对人民政协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赢取社会广泛认同形成社会共同认识。二是要建立一支人民政协信息化人才队伍，增强网络协商议政的能力，定期收集网络民意，分析网络舆情，深入研究

网络社会和网络民主的发展，更好的为网络治理、国家治理议政建言、献计献策。三是要吸纳一定比例的网络代表人士、网络大V到政协委员队伍中，与网络人士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渠道，增强网络人士的思想认同，通过他们主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界别网民。支持网络代表人士在技术创新和建议献策方面发挥优势作用，特别是发挥他们在正面引导舆论方面的优势，鼓励他们在网上传播健康向上的文化作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社会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 [1]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各界共识 [EB/OL]. <http://www.cppcc.gov.cn/zxww/2019/03/04/ARTI1551660438003750.shtml>.
- [2] 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
- [3] 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 切实加强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 [EB/OL]. <http://www.cppcc.gov.cn/zxww/2021/03/02/ARTI1614647122435116.shtml>.
- [4] 习近平：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 [EB/OL]. http://www.cac.gov.cn/2021-04/19/c_1620411719588870.htm.

【责任编辑：张山】

实质－路径－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多维探析

宋 玉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属性自然要求覆盖社会治理领域，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挖掘出“民主”的巨大能量，赋能社会治理过程，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的重要表现，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民主治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实质，不仅重视选举过程，更强调“在选举之外的治理，将治理中的民主作为实质民主的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价值－行动”三个维度为社会治理强基、铸魂、蓄能，而每个维度背后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统一领导，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治理；制度；价值；行动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4-0076-06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篇章之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领域作出的重要安排和部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1][4]}属性自然要求覆盖社会治理领域，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挖掘出“民主”的巨大能量，赋能社会治理过程，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2]的重要表现，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民主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实质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基层社区时提出的，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群众的密切相关性，是一种广泛、真实、有效的，能够切实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社会治理主要集

中在基层，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共商、谋取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治理活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治理注入了庞大的“民主能量”，构建出“民主治理”。要解析民主治理的内涵，首先要探究民主的本源性问题。

（一）民主的本源性问题

自熊彼特将民主界定为“选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3]之后，就开启了现代民主理论的先河，由此“选举”作为民主的核心概念被西方世界奉为主臬，而“如何在技术上对选举程序不断精进”也成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研究的重点议题。“选举民主”逐渐演化为西方民主的核心表达，但是，仅对于程序性民主的追求已然跟不上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实质性的参与才是民主的核心诉求。从词源意义上探究，“democracy”（民主）来自古希腊语“demokratia”，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力”^{[4][5]}。“人民”真实意愿的表达与执行，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性质与质量的重要标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收稿日期：2023-08-20

项目基金：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1CX014），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2021-2022 年度招标课题（ZB202101）

作者简介：宋玉（1984-），女，安徽青阳人，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中指出，民主制实质上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5]可见，民主的本源性^[6]问题不仅涉及选举，更强调选举之后的公共政策的选择，是集中在“组织政权”与“政策选择”这两个层面上，即“所谓民主无非是政治共同体中保证公权力与民众集体意志适应性的理念和制度”^{[4]01}。

（二）民主治理的内涵

不同于西式民主仅停留在投票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诠释了“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的权力”这一核心内涵，始终将“人民”置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性地位，切实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大民主链条串联起来，打通了“民众集体意志的表达和凝练”与“民众集体意志的有效执行”两个层面，是一种本质上完全超越西式选举民主，能够真实反映、准确表达与有效执行人民意愿与诉求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新形态，是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04}，最具中国政治实践的原创性表达。

新时代新征程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健全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就内在蕴含着“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民主协商”等理念，表达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等参与性民主的诉求，透露出实质民主的特征。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民主要坚持全面性和过程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具备人民主导、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7]

熊彼特等现代民主理论学者将选举民主中的民众参与限于投票这一政治过程，是一种“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结束后休眠”的短时民主状态，最终只能导致“少数精英的积极参与和多数民众的政治冷漠”^[8]。而判断民主实效如何的最根本依据，是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诉求能否进入公共政策流程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尤其是社会治理所覆盖的大量基层群众的集体意志是否有畅通的表达渠道、能否全面地给予执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

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9]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治理在“民主”上达成的契合，就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提供了基点，构建出民主治理。民主治理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通过吸收公民或其组成人员参与公共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效益。民主治理不仅重视选举过程，更强调“在选举之外的治理，将治理中的民主作为实质民主的核心”^{[10]76}，通过多样化的协商路径为民众集体意志的表达凝练与有效执行提供渠道，链接起选举与治理，将民众参与的范围从选举扩大到选举之外的政策制定、协商、管理和监督等一系列政策环节之中，切实追求民主的实质性参与。

二、多维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路径

完整的制度程序与完整的参与实践以及内在蕴含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就从制度、行动、价值这三个维度构建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逻辑架构。首先，制度是具有显著长期性、根本性、保障性的功能载体，为价值目标的实现与具体行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逻辑的基本载体，强调民意的实现应当贯穿于“五大民主”链条的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凸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其次，行动是在价值指引下对制度规范的具体实践。完整的实践路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逻辑的行为表现，强调以协商民主为主要路径，通过协商、讨论等方式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再次，价值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直接指向事物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与意义，规定了制度体系的建设方向与具体实践的前进方向。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逻辑的核心要素，明确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以“人民至上”为特定的价值基准，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强调人民集体意志的表达与执行。

梳理清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架构后,依据“基础-核心-外化”的逻辑,调整三大要素的排序:将制度体系作为基本保障位列第一、价值取向作为核心要素位列第二、最后是行动路径。并由此延伸思路,思考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从这三个维度嵌入社会治理体系,赋能社会治理行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体系与完整的实践路径,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通过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等“五大民主链条”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环节各领域,不断扩大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集区域,塑造全新的互动机制,畅通组织脉络,激活资源流动,提升治理能力,推动形成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的三者统一,以此来实现对社会治理的赋能。

(一) 制度层面:以“1+3 结构”为制度载体,为社会治理强基

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是构建个体或组织间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途径,组织行为必须符合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的预期与约束,即符合“合法性”要求。合法性就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逻辑基点,即社会治理必须符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的约束与预期。从“制度-价值-行动”三大维度之间的关系来看,制度体系是基础性的支撑与载体,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层面为社会治理强基。

首先,从逻辑构成视角来看,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系统是“1+3”结构,其中“1”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最重要的制度载体,是“人民民主”在“组织政权”这一政治过程中民意的表达与凝练,是民众实质性参与政治活动的最有力的制度根基。“3”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11];从结构功能视角来看,“1”是根本,“3”是延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意志、实现人民意愿、切实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根本性结构,规定了“1”与“3”之间的结构逻辑与功能秩序。“1+3 结构”为有效回应不同阶层、群体、地域人民的利益诉求,从多个层面多个渠道提供全方位的制度支撑。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1+3 结构”的完整制度安排,为社会治理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民主参与渠道,强化了社会治理的制度根基。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最根本制度保障。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确保国家的根本权力真正掌握在最广大人民手中,是切切实实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安排。而社会治理主要集中在基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五级人大代表总数的比例近 95%,基层人民的集体意志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进入公共决策并具体落实到政策安排中;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西方多党政治“挟邪取权、彼此倾轧”的弊病,实现了政党之间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民主科学化,为社会治理提供稳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信任与参与、公民精神与协作是党和政府应该重视的一种重要资源,能够反哺民主运转的效能。^[12]新型政党制度注重关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具体利益,反映和体现人民民主的真谛,最大程度地凝聚起社会共识,积累起社会治理所需的丰厚社会资本;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民族自治地区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立民族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就是要充分结合本地实情、因地制宜地发扬民主、汇集民智、凝聚民力,就是要在民族地区社会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9]79}中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有利于培育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积极公民意识^{[9]79}、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与责任,从而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与效益、达成上下互动的“善治”;第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在基层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有效赋能社会治理。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与基层民主重叠空间最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层人民群众自我管理村社事务、积极践行基层民主、培育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与责任意识提供了制度载体。基层群众通过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有力地表达出自身的价值便好与意愿诉求,促进了公民性、彰显了公民权^[13],能够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10]76},

提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效能、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二）价值层面：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为社会治理铸魂

价值涉及事物发展的核心要素，直接表达出一个事物的目标选择与意义追求。价值维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逻辑的内核，表达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真实意愿。从“制度－价值－行动”三大维度之间的关系来看，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前提性条件，直接决定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向，具有根本性的指引作用，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在价值层面为社会治理铸魂。

首先，民主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民，作为“人民的权力”，需要真实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有效融汇和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真正遵循“以人为本作为目的”的价值依归。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这就要求“共同体的公权力与民众集体意志要相适应”，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意志的表达要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基准，坚持人民立场，将人民作为检验民主实效的唯一评价主体，事事时时以人民为中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4]。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要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为治理导向，铸牢了社会治理的“灵魂”。第一，在理念上，坚持人民的整体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人民群众在质和量上均表现为有机整体而非个体的简单集合，这就要求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人民的整体性，将个人福祉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与利益诉求，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第二，在价值上，凸显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强调需要依靠人民、体现人民的主体力量、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

将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人民群众吸纳到民主制度体系中，在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中充分发挥出人民的主体力量，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等多样化的民主参与渠道，引导民众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一方面充分表达出自身的意愿与诉求，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有效地凝聚民心汇集民智；第三，在导向上，追求治理的实效性。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属性，要求系统地、协同地、全面地处理民主与民生的关系，切实将民主治理的效能落实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始终以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为绩效导向，关注民生问题，追求治理的实效性。这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依归，也是社会治理保持公共性的必然要求。

（三）行动层面：以“协商民主”为实践路径，为社会治理蓄能

行动是人们在某一价值指引下，依据制度的激励或约束等指向性规范而采取某种行为的结果。行动维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逻辑的外化表现，是衡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效的判断依据。从“制度－价值－行动”三大维度的关系来看，行动是制度与价值外化于行的具体表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在行动层面为社会治理蓄能。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完整的参与实践不仅包含票决民主，更注重协商民主。不仅关注“投票选举”环节，更关注“选举”之后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的“协商”环节，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的表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尊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协商贯穿于民主全过程。协商民主重点在于协商，就是要做到：协商主体要广泛多层、协商渠道要规范透明、协商结果要公平公开，如此，真正做到“有事好商量、商量有结果、结果能践行”，才能最广泛地凝聚起社会共识。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协商民主”为实践路径，为社会治理畅通多元协商渠道，聚集起“最大数”的民智民力，蓄积起社会治理的巨大能量。第一，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表达真实意愿提供了多样化的协商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开放包容的政治体制、健全完善的制

度规范以及协调有序的组织程序来推动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地域人民的政治参与,尽可能地畅通人民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提供多种形式多个维度的沟通与协商路径;第二,为社会治理的决策优化聚集了最大范围的民智民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是要让协商贯穿于民主参与的各环节和全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就强调和鼓励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要在党的全面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协调、协议,找到最大公约数,广泛汇集民智、有效凝聚共识,维护各方利益,充分激发出“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系列程序与机制中,将基层群众的集体意志贯穿到多数决策中,消除个体中的非理性行为,通过渐进方式实现集体理性,追求全面共识而非简单粗糙的多数裁决,以减少决策失误的成本与风险;第三,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建设培育了最亟需的行动人才。行动的具体效能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集合,但其中行动主体的能力与意愿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属性,要求“协商民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的上层制度,更应该要落实和运用到社会治理的各环节各领域,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理念和方法成为人民群众的处事方式,各种协商形式在基层遍地开花,有效地在实践中培育了普通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与民主素养,这就为社会治理的行动主体提供了培育机会和锻炼空间。

三、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保障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抑制“资本政治”“民主捕获”的重要利器,是引领社会治理高效前行的根本遵循。

(一) 抑制“民主捕获”的发生

“民主或许是良政善治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其充分条件。”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奥尔森曾明确指出西方民主存在悖论:西方国家存在大量利己性

分利集团,必然以追逐自身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甚至可能通过选举操控政府的法律和程序,以贯彻实施排他性政策而获取集团利益,断不会为增长社会公共利益而作出自我努力与牺牲,因而本义作为“人民的权力”的民主,就沦为分利集团的政治工具,民主被“捕获”了。究其根本,是因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体系下,国家不能抑制分利集团的这种逐利行为,无法提供一个必要的约束性竞争机制,缺乏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而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点就是需要一个超脱的政治力量出现,有效约束和克服分利集团的破坏性竞争,优化民主制度的设计,引导民主回归“人民的权力”的本义。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没有任何自身利益的追求,大大超越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内涵,是坚定站在人民立场、以人民至上为核心价值依归的超脱政治力量,完全有能力、有立场遏制“民主捕获”,在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就能有效保障民主回归人民的核心本义。

(二) 提升民主治理的效能

党领导一切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时,同样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制度-价值-行动”三大维度嵌入社会治理过程,为其赋能,而每一维度背后都离不开党的全面统一领导。

首先,在制度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立场鲜明、战略长远。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前提是要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政治道路上,最大化地激发出民主制度的优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以坚实全面的组织体系为载体,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力量,能够有效贯通社会治理领域关于民主规则运用的制度壁垒,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全方位、全领域、全流程地吸纳和整合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的民主资源。

其次,在价值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民通过

党的领导凝聚为有机整体”^[15]，发挥出“人民整体性”的强大动能，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能够精准标定社会治理各主体的作用方位，进一步梳理相互关系，通过整合全过程人民民主“五大民主”链条的合力效应，引领民主治理过程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绩效导向，追求“民主与民生耦合”的协同效能。

第三，在行动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强大的政治势能，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的关键是有效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的“民主”能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出人民群众的深厚伟力与创造活力。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价值引领、目标控制的中枢作用，高屋建瓴般地厘清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治理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分项目标和任务，引导社会治理始终以善治为目标，提升民主治理的高效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2(05):4-13.
- [2] 樊鹏.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J]. 政治学研究, 2021, (04):3-10.
- [3]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4] 程竹汝, 陈亮.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内在逻辑[J]. 青海社会科学, 2022.01.00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281.
- [6] 程竹汝.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之基[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5(06):27-35.
- [7] 强舸, 蔡志强. 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理念、创造性实践与新时代发展路径[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05):4-11.
- [8] 左才. 公众参与：中西理论与实践比较[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1).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 9(22).
- [10] 熊易寒, 林佳怡. 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J]. 思想理论战线, 2022, 1(02):76-81.
- [11] 陈冬冬, 齐卫平. 政党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演展逻辑[J]. 湖北社会科学, 2022(03).
- [12] 王益. 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治理——以泽国镇 2010 年民主恳谈会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4):146-150.
- [13] 张云翔. 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文献综述及其启示[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8(5).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主[N]. 人民日报, 2021-12-05(5-7).
- [15] 林尚立. 论人民民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29.

【责任编辑：余伟】

导：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新形态

潘宏纹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 要: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里最为多样态的一个学术问题, 理论先驱马克思、恩格斯与后继者列宁、斯大林及其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各有不同, 实行的政策措施也存差异。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导”的新哲学观, 是在与新的社会实践结合中形成的理论创新, 是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形成的实践创新, 使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出新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 导;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对待宗教的态度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82-06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里最为多样态的一个学术问题, 理论先驱马克思、恩格斯与后继者列宁、斯大林及其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各有不同, 实行的政策措施也存差异。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宗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里带有根本性、决定性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 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理性。十八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 围绕怎样认识当代宗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宗教问题进行理论探索, 创新性地提出了“导”的新哲学观, 使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出新的理论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里对待宗教的三种态度

从理论演进看,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发展的规律、宗教的消亡等基本问题上具有相对稳固的理论结构。但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由于社会背景、国情特点、文化

传统等因素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持有不同的态度, 分型为三种。

(一) 阶级斗争背景下的批判态度

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宗教问题上所持的态度。1843 年,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名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即写到“就德国来说,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1847 年, 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进一步指出: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顺从驯服, 带有狡猾和假仁义的烙印, 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2]1894 年, 恩格斯也在其晚年著作《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对基督教的创立、典籍、先知圣人、宗派等教理教义问题从史据、文献等角度进行考证, 批驳了基督教学说内的一些矛盾与谬误, 肯定了杜宾根和布鲁诺·鲍威尔在基督教相关问题上的辨伪成果。可以说, 对宗教的批判乃至以消灭宗教为目标的社会批判贯穿二人学术生涯之始终, 这种鲜明的批判态度既有历史的渊源, 也有现实的需要。

从西方思想史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 西方

收稿日期: 2023-08-30

作者简介: 潘宏纹 (1982-), 女, 黑龙江,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宗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 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 基层宗教治理。

社会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强调理性、崇尚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逐步取代了神本主义，宗教的权威受到世俗的挑战，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欧洲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宗教的改革与批判成为当时不可逆的社会思潮，这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奠定了社会基础。“众所周知，现代社会起源于对宗教的改革和批判。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批判传统的天主教，以‘基督徒的自由’为名，使人的世俗生活从神圣的规章制度中摆脱出来；现代启蒙运动更是以自然神论（Deism）和泛神论（Pan the ism）来对抗非理性的启示宗教；马克思主义则要消灭所有宗教。”^[3]

从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关系分裂变革，形成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贫富差距和生产资料占有极度不平等原因引发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接连不断，觉醒的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斗争的舞台。短短几十年间，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先后爆发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进行社会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两个必然”的革命斗争论，明确了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社会制度创造者的历史使命。但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长期而浓厚的宗教传统在西方社会仍根深蒂固，是束缚底层民众尤其是工人群体革命性的精神枷锁。为了彻底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剥削压迫，马克思、恩格斯拿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把宗教定为“人类解放总问题”之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宗教本身的批判，揭示了宗教的虚幻性。“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4]“宗教按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5]二是对宗教作用的批判，指出了宗教的麻痹消极作用。“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

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和宗教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利用宗教控制人民精神理性，提出了“宗教是剥削制度的掩护物”“宗教是资产阶级的保护壁垒”^[7]等系列批判论断，这也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立论之基。

（二）无产阶级政权背景下的辩证态度

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对宗教所持的态度。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俄国工人政党执政后，面临来自封建沙皇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势力的双重压力，为了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瓦解封建势力和教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破坏，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坚持了既批判又尊重的辩证态度。一方面，列宁作为纯粹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基本判断，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发展为“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8]，继承了前者对宗教的批判。另一方面为了团结东正教信众，防止工人政党与人民的对立，又在社会民主党的党章党纲中对宗教及教徒予以尊重，宣布对于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公民宗教选择，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其中，列宁在《党纲草案》中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中强调了公民享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信仰哪种宗教的权利，在《告贫苦农民》中指出各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反对宗教迫害和宗教歧视。特别是，列宁对宗教的辩证态度也延伸到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给宗教与政权之间划明了界限。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阐明了国家和工人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截然不同的态度。“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工人政党来说绝不是私人的事情。”^[9]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文献》中也声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清晰的表达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科学

立场,与东正教和教会势力在思想追求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此,列宁专门回答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社会各界和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宗教信仰的几个疑问,解答了为什么工人执政党不能信仰宗教以及如何看待宗教神职人员加入工人政党等政策问题,强调了工人政党指导思想的先进性、纯洁性。期间,列宁提醒党内同志,在宗教问题上,无产阶级执政党要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以先进的理论去影响转化东正教神职人员和信教者,而不是本末倒置,使无产阶级执政党沦为东正教的信徒。但列宁时代的末期,苏维埃政权的这种辩证态度出现了偏差。

斯大林时期,政府对宗教的镇压打击更为严重,发动了“无神的五年计划”,采取极为激进的消灭东正教的宗教政策,逮捕神职人员、禁止宗教集会,开展铺天盖地的反宗教宣传,大量关闭教堂,导致政教关系一度恶化。这种势同水火的政教关系直至卫国战争后才得到缓和。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开始重视宗教政策调整,俄国的政教关系得到一定缓和。

(三) 从本土实际出发的团结合作态度

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理论、吸收借鉴俄国苏维埃政权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得失后形成的宗教态度。建党初期,党的领导人已关注到旧中国的宗教问题。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0]其中的神权,指的就是封建社会的宗教问题。《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等几篇乡村考察报告均统计了当地的僧尼、传教士等宗教职业人员,与作坊主、手工业主、私塾先生等并列,作为乡村社会阶级成分的一种类型来考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宗教信仰自由”列入党纲,积极团结争取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民主进步人士建立民主联合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吸收不同阶层、民族、宗教信仰的爱国民主人士加入革命队伍中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力量由弱到强的根本性转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最初的政权设计中,也充分照顾到1亿多的信教群众权益,在新政协会议的界别中列入了“宗教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伟业。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共有7位宗教界民主人士正式代表参与新中国成立,是45个单位代表之一。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党内把宗教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错误看法,打消了一些干部同志试图急躁冒进快速消灭宗教的天真想法。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文献指出,宗教是我国的长期国情,应该采取科学审慎稳妥的态度认识处理社会主义宗教问题,通过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造,信教群众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探索也逐步开启,宗教特征“五性”论全面提出。遗憾的是文革十年,与其他民主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党的宗教政策执行出现了较大偏差,对待宗教的态度相对激进,团结合作遭到破坏。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重新明确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指出“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11]要求全党同志要注意体察我国多宗教、多信众的社会民情,团结联合信教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七大,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发展起来后宗教领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要有世界眼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重要命题。在政教关系上,确立党处理同宗教界人士关系的原则,即“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在管理方式上,以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强化依法管理,以1982年下发的19号文件为起点,文件中明确了

“为了保证宗教活动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人士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12]的基本精神，在尊重团结的前提下，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从国家总体安全观和治国理政全局高度研判宗教工作形势，分析宗教工作问题，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两个“化”（中国化、法治化）、三支“队伍建设”、四位一体“治理格局”、五对“宗教关系”和九个“必须”等新理念新举措，特别是把“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特殊的群众工作”贯穿党的宗教工作始终，为党同宗教界的团结合作事业提供保证。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里对待宗教的三种态度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态度的必然性

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尤其是要参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的历史坐标，“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3]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把宗教的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突破口，通过打破贫苦大众身上的神学桎梏来帮助无产阶级摆脱不平等关系下的世俗桎梏，以宗教的解放实现政治的解放、社会的解放，最终是人类的解放。“对宗教的批判就是使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14]进一步说明，批判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手段，从当时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需要来看，结合宗教所起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彻底地批判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为启蒙民智，推动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扫除了思想障碍。

（二）列宁对宗教采取的辩证态度的灵活性原则性

如何理解列宁的宗教态度，要坚持四个维度，

一是从宗教本身来说，列宁仍然坚持了对宗教的全面否定批判，将整个东正教势力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二是从一般公民的个体权利来说，俄国社会主义施政纲领明确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信仰权利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三是从党（俄共）的建设来说，宗教绝不是党员的私事，党员需要在一般国法的基础上遵循党章党纪，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四是在政教关系上，列宁确立了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从态度的延续上来看，列宁对宗教的态度较马克思、恩格斯更为丰富更立体，既有灵活性的策略也有刚性的原则。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执政党与宗教的问题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几项重要原则，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继自由资本主义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初期宗教问题的理论空白，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自治度，为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参鉴。

（三）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团结合作态度的科学性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团结合作态度，可以从三个维度看。一是历史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对宗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宗教问题也不遮掩宗教矛盾，洞察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在革命、改革、建设各历史时期把处理好宗教问题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部分。具体到工作实践中表现为制定宗教政策，落实宗教工作方针，尊重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尽管期间有过阶段性的挫折或倒退，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最终得到一而贯之。二是现实的逻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待宗教的态度总体上是温和理性的，并没有把宗教置于对立面作为敌人进行镇压或迫害。从根本上来说，这与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于人民特别是底层工农群众的政党属性有关。中国共产党与广大贫下中农情感相通、境遇相似、命运相连，清楚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此外，旧中国面临的三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敌我矛盾，而宗教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所以,采取的斗争原则和策略也不同。特别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宗教问题彻底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党和宗教团结合作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三是实践的逻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实践表明,采取团结合作的态度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两面旗帜下,执政党与宗教界发展出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联盟,为社会主义处理宗教问题找到了行之有效的相处之道。

三、“导”的新哲学观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既不能过度“收”也不能简单“放”,关键是要在“导”上下功夫,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这是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迈向更高历史阶段时中国共产党从容把握历史主动,坚持理论自信在宗教问题上形成的中国化成果,开拓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深度和广度,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焕发新的理论生命力。

(一)“导”是在与新的社会实践结合中形成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根源在于其实践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它是一个随着时代、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更新的开放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强调,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照搬,而是掌握其原则、立场和方法,做到活学活用,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宗教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双统一的中国化,“导”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当前现实宗教问题在理论构建上形成的新哲学观。它在继激进的批判、策略性的利用和团结合作后就怎样认识处理当今的宗教问题进行了理论的再丰富再发展。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极大成功,百

年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更趋全面,对宗教规律的把握也更加深入,从而在理论创新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思想理念。“导”的新哲学观的提出,其理论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确立了一种新态度,是认识论意义下的哲学新思维,这种思维是在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迫切的革命需要后,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宗教工作实践正反经验基础上对宗教问题的新认识新升华,进一步优化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对待宗教的立场,与时俱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代表着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确立,体现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理论创新能力。

(二)“导”是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形成的实践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就有讲辩证、致中和的智慧,先贤古人对待各种问题注重研究事物内部发展运行的机理,剖析矛盾的对立、依存、渗透和转化规律,从整体辩证角度看待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从而以历史思维、系统思维破解处理现实中遇到各类难题,达到天、地、人的和谐平衡。儒家强调“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在事物的两极中寻求恰到好处的中正。佛教倡导“八不中道”,主张离断常见,不执两端。道教崇尚“守中致和”,强调“阴阳者,要在中和”。“大禹治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文化典故则形象地从自然、政治两个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改造自然、治理国家所推崇的讲辩证、致中和的价值理念。“导”的新哲学观,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宗教问题、宗教现象的深刻洞察,对宗教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在讲辩证、致中和和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怎样做好宗教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政教关系计之深远的战略考量。

参考文献:

- [1] 郑天星编. 马克思 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1: 46.
- [2] 郑天星编. 马克思 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1: 174.

- [3] 冯波. 马克思与斯宾诺莎 宗教批判与现代伦理的建构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10.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54.
- [5] 郑天星编. 马克思 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1: 106.
- [6] 罗国杰, 许启贤.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卷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288.
- [7] 武剑西译.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2-5.
- [8] 郑天星, 张雅平编译. 列宁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3: 72.
- [9]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著作精选和导读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338.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4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26.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06.
- [12] 王海全.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及贯彻落实的对策建议 [J]. 世界宗教文化, 2022.4: 23.
- [13]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17.
- [14] 郑天星编. 马克思 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1: 47.

【责任编辑：温开照】

新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研究

李婕颖

(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 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 其在遵循“亲”“清”原则的同时, 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文章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实际, 在深入阐述“亲”“清”原则及相关要求的基础上, 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情况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 并提出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亲”“清”政商关系; 构建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8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政商关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 民营企业的生存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推动, 因此,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引导民营企业自觉做践行“亲”“清”政商关系的典范, 是营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构建政商新生态的重要途径。

一、“亲”“清”政商关系的提出及其内涵

从古至今, 政商关系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中, 政商关系不可忽视。

(一)“亲”“清”互补——提供均等机会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用“亲”、“清”两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新时代的政商关系, 他指出, “对领导干部而言, 所谓‘亲’, 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 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所谓‘清’, 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 不能有贪心私心, 不能以权谋私, 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 所谓‘亲’, 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多沟通多交流, 讲真话, 说实情, 建诤言, 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 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 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在“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过程中, “亲”为良好政商关系构建的驱动力, 而“清”则是政商关系构建的规范, “亲”的前提与“清”的条件是互为体、缺一不可的。

收稿日期: 2023-08-23

作者简介: 李婕颖 (1987-), 女, 广东清远人, 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政商关系、比较政治的量化研究。

（二）亲——维持权力平衡的关系

和谐的政商关系能够保证“权力”的平衡。长期以来，政商关系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关系结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政与商之间处于不断博弈的状态，两者如何实现和谐也是困扰政治、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中国传统政商关系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私合营”时期，都是长期存在的。这种状态不仅造成了“政”与“商”之间的不对等，打击了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活力。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的关系要求，其目的是为达到政商之间的平衡，调和“政”“商”之间矛盾，使各自能够发挥优势——“政”发挥引导作用，为“商”提供必备的服务与支持；“商”能够尊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合法经营，两者相互独立、相互统一，发挥“政”与“商”的合力。从这个维度出发，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强调“各级政府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三）清——开展光明正大的交往

“亲”“清”原则要求政商在交往中能够保持名正言顺与光明正大。“清”并不是要求政府和党员干部在处理与民营企业关系的过程中消极被动，不敢为、不愿为与不作为，而是在从严治党的严格要求和现实背景下理顺政商关系，以一种正大透明的交往方式开展工作。这种“清”的政商关系应公私分明、“相敬如宾”，构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流渠道基础上，使企业能够直接与政府对话，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此来进一步降低权力寻租、政商交易风险，避免单个企业、企业家获得特别关照等。因此，新时代政商关系需要在有效监督条件下构建，需要以清明廉政作为基准。

（四）“亲”“清”原则发挥民营企业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亲”“清”原则要求民营企业约束规范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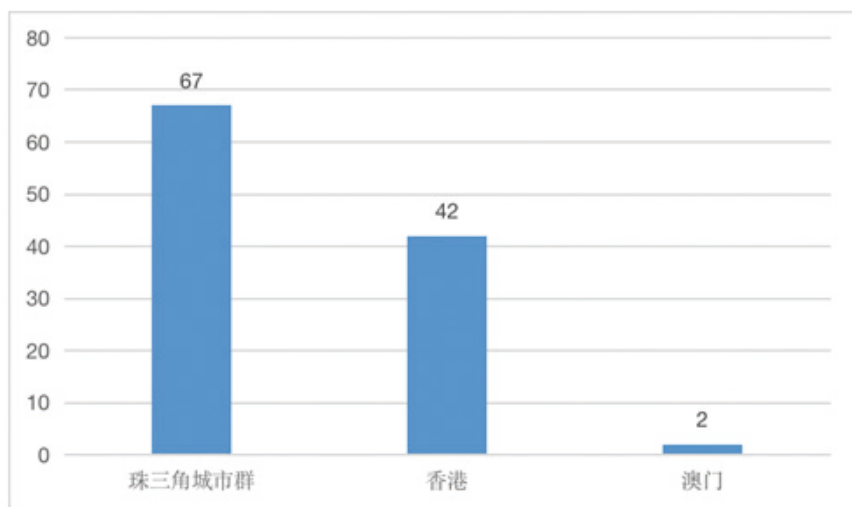
行为，在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企业要摒弃过去的不良习惯，不再依靠钱权交易、拉拢腐蚀等错误行为，而是将精力放在自身建设上，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以一种公开透明、清白坦荡的方式，主动寻求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协作，搭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做到真正信任党和政府，能够建立社会责任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中尽可能贡献力量。

“亲”“清”原则是由政府、企业、市场以及基础设施、制度规则等要素共同构建的场域，也是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准则。在这一场域之中，政府、民营企业均需要发挥自身优势，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此来形成特定的互动模式、作用机制，构建稳定和谐的良好关系。

二、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与“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情况

（一）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的成果。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随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顺利推进。近5年来，一系列政策制度的颁布与推进，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迅猛，粤港澳大湾区一批优秀民营企业随之相继涌现。2022年中国500强民营企业名单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0多家民营企业进入了前百名，包括广州的希音、珠海的格力电器、惠州的亿纬锂能、东莞的OPPO和vivo、佛山的美的集团、海天味业及香港的新鸿基地产、银河娱乐、创科实业、长和、长实集团、周大福以及中电控股，除此之外，深圳的华为、腾讯、中信、比亚迪等公司也榜上有名。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500强之中，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数量达到了111家，总市值达到了21.45万亿元，占据了企业总数量、市值的1/4（具体分布情况可见图1所示）。



数据来源：最新中国市值 500 强上市公司榜单

图 1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 500 强粤港澳大湾区分布情况（单位：家）

根据粤港澳统计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具体可见图 2 所示），从 2017 年到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总体呈现不断提升态势。除 2020 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造成经济总量略微波动外，近年来大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22 年经济总量更是达到了 13 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大湾区正朝着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既定目标加速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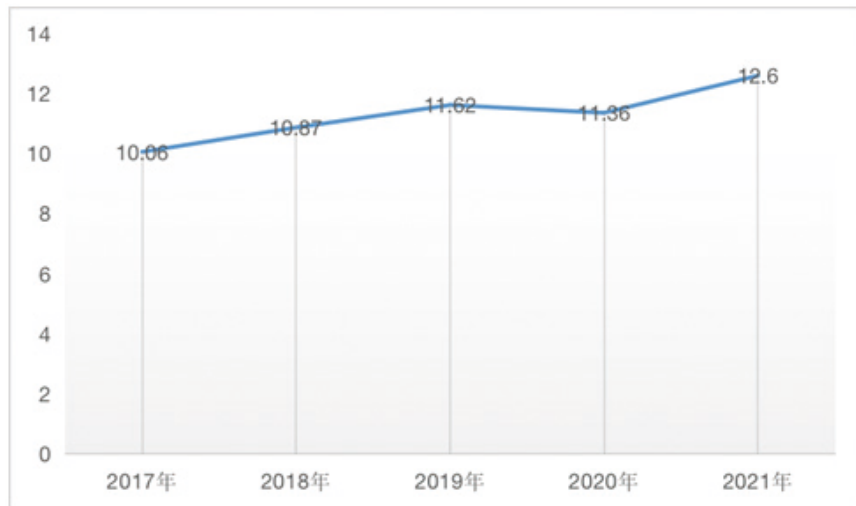


图 2 2017 年到 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单位：万亿元）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紧紧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标，已经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探索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由此也诞生了一批走在创新前沿、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了 5.7 万家以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活力与实力。

（二）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现状

在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制定和颁布政策，构建稳定的营商环境，与金融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相关利益群体相互协作，从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方面支持。

1. 注重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在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及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破除区域政策性束缚，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主动吸纳大湾区先进技术、人才、资金，

承接优势产业，为企业的生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还主动牵头，搭建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平台，促进市场信息、研发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迅速的集聚、共享。

除颁布政策制度，当地政府专门成立澳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以构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从科技政策与创新评价、城市规划与生态文明、产业发展与国资国企等多个方面入手，确定了企业发展、经济建设的统一战

线，积极构建了稳定和谐的政商关系。2021年10月广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龚国平在强调民营企业推动经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同时，指出：“民营企业是我们科技创新的创作者、组织者和引领者，我们一定会对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民营企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构建了稳定和谐的新型政商关系，也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公平公正的发展机遇。政府的积极作为不仅展现了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源调配的优势，还有效弥补了市场经济失灵的问题。

2. 注重政商交往的清爽纯粹

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政府贯彻“亲”的理念，为推进民营企业建设发展，构建稳定和谐亲近关系，另一方面把握“清”的原则与方向。

以肇庆市为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2019年组织召开了该市就营商环境优化构建路径研讨，通过“数字政府”的构建，提供“一门受理，一窗通办”等服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为民营企业稳定运营打开了提供保证。同时，肇庆市还注重政商交往的清爽与纯粹，从2016年8月开始，连续出台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交往清单，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配套出台政商交往行为守则，从操作层面明确政企交往原则尺度，细化政商日常交往行为，让干部和企业家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碰。同时，实施商务活动维权指引，更好地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建立了市县党政领导挂点联系企业制度，成立由市长牵头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将扩大民企投资、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设“企业服务平台”“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智慧督查平台”，开通“书记市长强企直通车”信息平台，搭建起政府与企业24小时沟通互动“桥梁”。

（三）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亲”“清”原则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政商关系的构建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也为政府、

民营企业在各项工作上的开展提供了支持。但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政商关系在构建上依然存在着显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缺乏主动服务的意识

在大湾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政商关系，带动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粤港澳居民“安居乐业”的进程中。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多市在改善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是与世界一流的标准之间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的构建上仍然处于滞后状态，呈现出了“清”而不“亲”的状态。另外，民营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缺乏高效的沟通互动渠道，不能了解企业在实际经营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前期的了解沟通，造成大湾区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制度缺乏针对性，在具体的执行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2. 区域协调推进难度较高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在营商环境、经济制度、关税体制、货币状况等多个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整齐划一”。另外，除深圳外，受制于三地制度、关税、货币等差异的影响，其它8市与港澳地区人力、资金、科技、信息要素的流动上重重受阻，对外开放程度有待提高。而当前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缺乏顶层规划，并未构建联盟框架，使得三地之间的“互联互通”流于表象，严重限制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商贸、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深度发展、高效合作。

3. 企业自律意识不高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宽进严管”的思路，为市场主体的进入上实施“宽进”策略，增强市场的活跃性，但是在“严管”上存在显著差距。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各个部门之间缺乏足够的协同性，在监管手段上较为单一。部分单位虽然构建了“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督制度，但并未有实质的运用，很多问题在整治之后依然反复出现，暴露了个别监管部门协同能

力较弱、监管不同步、全流程企业监管缺失等问题。另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着权责不一的问题，部分行业的监管职责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履行，但是其审批、执法的权限却局限在省级部门。除此之外，部分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缺乏自律意识、足够的信用约束能力，造成营商环境的再提升。而大湾区乡镇、二三线城市的政务办理大厅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充分服务，负责业务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性、服务性等多个方面有待提升，在跨部门的联办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上出现了明显的障碍，最终导致大湾区基层政务机构出现重审批轻监管，重事中轻事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对大湾区民营企业政商关系构建带来了不利影响。

4. 法治意识有待强化

在“亲”“清”方向的引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在政商关系的构建上需要以健康的法治环境作为保障，以此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提供依据。但目前粤港澳采取的是“一国两制、三法域、三法系”，法律在使用上存在着诸多的不同，难以通过统一的法律标准来实现政商关系的改善。从行政权限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门这两个区域的行政自决权较大，甚至拥有高度的立法权、司法权；而大湾区的其它地区的立法权较为有限，且多集中在城市治理方面，其法治环境建设多体现在严格执法、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这些文件以地方性、规范性的政策意见居多，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受到多个因素阻碍，尤其是容易受到“人治”因素的负面影响。

三、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政府和民营企业都应当提高对政商关系构建的重视程度，通过积极有效的对策路径，对当前的关系构建加以整合优化，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

（一）凝聚价值共识，明确“亲”“清”政商关系方向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理念，调动政府、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参与“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热情，必须充分发挥党建文化的引领作用，抓好廉政文化建设，将“亲”“清”作为主线，提高政府、民营企业的思想认识。在此过程中，开展常规性的纪法教育、警示教育，加强队伍的公正廉洁教育，制定约束规则制度，确保政府及工作人员廉洁从政，构建至上而下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同时，需要摒弃“官本位”的思想，营造“交互主体”的公平环境，坚持以“亲”“清”作为交往的原则，主动树立平等协商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做到政商关系的亲密而不失分寸、清廉而不疏远，真正把握好彼此关系的度。尤其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而言，应该继续发挥地区重商爱商的良好传统，以“清”作为前提，捕捉历史机遇，利用改革的东风，实现政商交往模式的创新发展，在价值观念上达成共识；以“亲”作为方向，发挥专业特长，借助发展的契机，实现政商交往模式的良性互动，在经济社会贡献力量。

（二）推进规范管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政商关系构建、交往活动开展的进程中，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应立足于身份角色转化、服务的精准定位，主动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了解，梳理出民营企业在生存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需求、普遍问题、个性诉求等，构建民营企业发展问题台账，对现有政策进行调整优化，真正实现“一企一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将真“亲”贯彻落实在服务中。政府部门应紧紧围绕企业办事诉求，有针对性地制定企业帮扶政策，提高自身的支持力度，从而解决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打通企业在发展中的瓶颈。在此过程中，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提高现有服务的专业化、高效化，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此来实现简政放权、真“清”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需要在明确自身权责的基础上，制定更具科学性、民主性的决策，

严防“暗箱操作”“权力寻租”，使得政府与民营企业都能在公开的规则制度下实现标准化的交往。

（三）完善“压力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评价体系

在构建良好政商关系的进程中，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对现有的压力机制加以完善，严格落实“亲”“清”的政商关系，构建相应的考评机制，创设“亲”“清”指数的评价指标。在此过程中，整理出“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在推进科学评价的同时，以民营企业为本，作量化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对大湾区民营企业政商关系的“亲”“清”指数加以评价。在此基础上，可将评价的结果、存在的问题与政府、民营企业进行沟通，由这些主体逐项研究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拿出整改方案。在评价的同时，还可将评价结果纳入年度考核评价中，对具有突出表现的民营企业、基层政府部门加以奖励。

同时，应充分调动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探寻政府创新支持、帮扶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可通过履职容错纠错清单制度的构建，准确划分为公、为私的界限，对干部在服务企业、改革创新之中列出“容错”的清单，以此来明确“必须做”“禁止做”的行为，为政商关系的构建提供更为精准的依据。

（四）强化“互联互通”，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共享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在三区上存在着制度、法治等方面的差异，阻碍着“互联互通”等工作开展。对此，需要充分统筹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平台”在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监督指导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构建“大政府”的治理服务平台，实现新型政商关系的调整优化。

对此，可以构建多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息月报制、专人负责制，以此来推进服务工作的联动，保证大湾区政府能够为民营企业解决更多的发展问题。另外，可以构建政务服务平台，加快“大数据服务企业平台”的建设，推动地区间、层级间、部门间、行业之间立体交换共享体系的构建，以此

来提高企业精准服务的整体水平。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在“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中应充分发挥深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的示范作用，以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为目标，对标世界一流，做到协同推进，积极争取政策方面的支持。

中国民营企业政商关系构建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特殊性，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与政府政商关系的基本原则，“亲”“清”原则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企业在发展规模、经营实力上不断提升，实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活跃，但是在政商关系的构建上依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对此，应该根据我国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的发展诉求，坚持以“亲”“清”价值理念作为引导，注重准入及监管机制的完善，并加强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有效推进大湾区民营企业的战略发展，实现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型。

参考文献：

- [1] 林昌华.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现机制探索——以福建省A市政企“互联互派互学”为例[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23.(02):119-125.
- [2] 潘崇敏.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体系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J]. 政策瞭望, 2023(04):48-51.
- [3] 尹卫东.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护航优化营商环境[J]. 新湘评论, 2023(08):36-37.
- [4] 罗进辉, 杨楠. 中国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概况、特征与问题——基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的分析[J]. 财会月刊, 2022(22):9-20.
- [5] 罗米娜. 筑建亲清政商关系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J]. 现代企业, 2022(07):130-131+174.
- [6] 宫秀芬.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研究[J]. 公共治理研究, 2022, 34(03):90-96.
- [7] 刘瀚文.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问题及对策研究[D]. 山东大学, 2022.
- [8] 江炎骏. 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影响企业绩效吗？——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1 (02):113-122.
- [9] 邓伟锋. 肇庆高新区政商关系研究 [D].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10] 王鹏. 新型政商关系的价值意蕴及路径考察——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分析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02):89-94.
- [11] 江炎骏, 许德友. 新型政商关系能够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基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的实证研究 [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01):66-77.
- [12] 李家瑞. 护航民营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02):57-59.
- [13] 杨觅密, 唐少莲. 论粤西地区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基于政治生态的视角 [J].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 2019, 29(02):1-4+19.
- [14] 贺诗, 银昕. 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渐入人心 [J]. 中国经济周刊, 2019(05):41-42.
- 【责任编辑：陈童敏】

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岳树梅, 王婉清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总书记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重大战略部署, 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前提条件, 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增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客观需要, 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在明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 探析以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增强的宏观策略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传播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095-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这为我国加强文化能力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和根本遵循,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则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坚定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文明所蕴有的历史脉络和丰富内涵, 并且中华文明不是一味固步自封、推陈守旧的古老文明, 而是富有创新活力、蓬勃生命力的文明, 更应当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滋养中国文明的内生吸引力, 并且探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多重路径。

一、以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增强的重大意义

(一)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之所以如此重视国家文化自信自强, 并将其放

在战略目标的高度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政策规定, 是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 一方面, 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自信, 增强本国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 它在扬弃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 使得文化不断创新, 更加适应新形势, 更好地体现本国文化的蓬勃生命力。而在国外,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本国对外的国际形象的提高, 并且使得本国文化在国际上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 向外发散本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是纠正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立足于文化软实力和国家硬实力

收稿日期: 2023-06-10

基金项目: 2023 年重庆市教委课题(规划项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治体系创新研究 23KGH014”、2022 年重庆市的法学会重点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岳树梅(1967-), 女,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 民建重庆市南岸区副主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王婉清(2000-), 女,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法。

的多元发展,实际上二者相辅相成,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为基础,又反作用于国家硬实力的提升。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程中,二者应当同样重视,不可偏废。

习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3]”。

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就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4]。所以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道路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使命也应运而生。

(二)世界期待中国声音,以中华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诋毁中国国家形象、歪曲中华文明的谣言屡见不鲜。这些论调扰乱人心,阻碍了中华文明对外的交流互鉴进程,妨碍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全球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无端指责,中国亟需扭转这种现状。这就愈发彰显出加强中华文明对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浪潮中,全球经济疲软,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在这一全球经济形势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强化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重要性的认识,由于世界更为期待中国智慧和方案,而这对于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要尽力站在这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口,抓住发展的机遇,积极地向外传递自身的文明观念和价值理念,提升中华文明的域外影响力。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亟需多维度展现大国形象和大国担当,这本身就对现阶段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提出了挑战,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已经势在必行。

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必要性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事关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以更为自信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更加开放包容,积极地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互动,寻求文化交流互鉴的多元路径,拓展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更好地推进中华文明“走出去”。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中华文明的能否进行有效传播和其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指标。因此,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是在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上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是要持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实现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普及和深远影响。新时代要求我们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二)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客观需要

“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异常激烈,是一场各国综合实力的博弈,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力量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亚非拉国家越来越重视自身国家力量的建设,注重更好地争取和保护国家利益,提出了对国际话语权的更多需求;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并不愿意减弱已获得话语权优势,在话语权争夺的博弈中不仅不会让步,反而是更加强势,谋取霸权的实现。旧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各方力量的综合作用和各种因素交加,使得这一过程愈加艰难,中国在这一环节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必须谋求自身利益的更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能够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掌握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主动权的客观需要。

(三)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需得坚持推动文明之间的交流融通,在文明的传播交流中,实现各国人民的相互尊重和互相包容,在文化上达成更多理解和共识,才能够减少因为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矛盾与摩擦,才能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精神文化纽带的联系。文明的发展繁荣兴盛,就是通过与其他文明连续地传播和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来实现的。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是要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全方位展示兼容并蓄、底蕴深刻的中华文化,以文化为载体,传道育人,弘扬中华文明所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标识的文化意蕴,倡导和展现多样化的文明,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古老而美好的理想不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吗?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也正是对中华文明世界观价值观的合理继承。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5]”。文化的交流发展是巩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是在文化层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所在。

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策略

(一)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自身吸引力

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内在力量和底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才能事半功倍。而坚实的文化自信的来源就在中华文明所包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激荡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丰满内核和发展谱系中。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和“本”加以继承和发扬^[6]。在我党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激荡向

上的革命文化,激活了中华文明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针,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方向。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化内核及其丰富,还需要我们极尽探索和研究,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力,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的优越性,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而只有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才能拥有更加强大的文明吸引力和文化魅力,激发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兴趣和期待,扩大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意图和愿望,凝聚更多的中华文明海外受众群体,以此反推中国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增强。

(二)发展文化产业,构建文化生产和输出大国的新格局

虽然中华文明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丰满内核,但是仅仅拥有这些瑰丽而宝贵的文化财产是不足以使得中华文明在国际上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文明影响力的。我国目前的文化生产和输出领域青黄不接,发展后劲不足。一言以蔽之,我国在文化生产和输出中的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传播方面存在缺陷,其中文化载体和文化内容的生产不足阻碍了我国文化输出能力的发展。文化输出最重要的载体还是影视、图书、音乐等文艺传媒这一类文化附加值高的产品,而不是通过工艺品、加工品等形式,通过前一类影视文艺载体的方式传播文化观念和内涵是各国人民更为喜闻乐见的方式,因此这种载体下的文化价值输出的效率自然就高得多。我国文化产品的文化内容供给偏单一化且数量不足,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产品的供给迅速增长,有效改善了我国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从量变到质变,各类网路文化产品的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质量也在不断升高。

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文化的产业发展亟待改革创新,中国文化产业亟待提升突破能力,突破点就落在文化创新和文化价值观的阐释能力上^[7],所以必须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积极有为,加快构筑我国文化生产大国和输出大国的新

格局。立足新时代,把握新要求,向世界传播更多的我国优秀的文化作品,为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来”,在海外“落地生根”开辟新路径^[8]。

(三)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塑造良好国家形象

文明的影响力与文明的传播能力是紧密相关的。处于目前的信息时代,不能再秉持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点传播文化,而是必须要重视传播领域这一文化输出高地,文化的传播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所以要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注重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渐渐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瞩目,我国需要向国际社会传达真实的中国形象和文明面貌,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自评”及国外公众“他评”的综合认定情况^[9]。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壮举,也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尽管如此,由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有失偏颇的舆论报道,我们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始终面临着被曲解、被恶意抹黑等严重危害中国国际形象问题,使得国外民众在被歪曲的报道中对于中国的了解十分片面并且抱有负面情绪。由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的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允地报道中国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是主动地“自塑”,而是被动性地“他塑”,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传播能力的支撑,我们亟需打破目前全球传播失衡的局面,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在被恶意中伤、诋毁的同时,我们的声音太“小”,以至于被其他声音所淹没,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以来力不从心的状况,解开“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之谜”,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希望传出真实的中国声音,将信息流通的“逆差”缩小甚至消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达真实的中国情况,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四、坚定文化自信,创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路径

(一) 坚定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立场是我们对待不同文化,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文化交流、文化对话时的立足点。中华文化立场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立足点,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彰显着文化自信,牢牢掌握历史和文化主动权,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10]。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我们缺乏文化自信自强的观念支撑,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播乏力与影响力不足的主观因素之一。行远自迩,我们必须坚定中华文化立场,站在正确的文化立场上,是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11]”。讲中国故事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在坚持文化自信与中国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之上,对外文化传播应转变话语模式,多种角度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2]。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多维度打造中华文明的表达体系。

我们要不断强化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和底气,将其转化为传播中华文明的强大信心,积累充裕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题材,笃行不怠,让各国人民在聆听隽永的中国故事中建立起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13]。坚持守正创新,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接受中国^[14]。

(二)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拓展文化交流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5]。长期以来,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更偏向政治化、宣传化、单向化,这样的宣传话语不利于拉近中国与外国民众的传播距离,难以实现中华文明的深度传播^[16]。话语体系蕴藏着思想体系,要加强话语内容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提供有力学理支撑。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同样不可分割。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很多概念都是西方“舶来品”,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既无法解释复杂的中国现象,更无法指导伟大的中国实践^[17],

如果只是照搬照抄别国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图腾,相当于沙上建塔,只会陷入邯郸学步、丰墙峭址的困境,唯有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源泉中汲取营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履践致远,才能赢得国际的认同、理解和尊重。

毋庸讳言,我国在目前国际舆论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构建中国大国国家形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舆论环境的争锋,很大程度上就是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之争,正是因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愈发显示出建立我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紧迫性。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创新话语表达方式、革新叙事体系,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传达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加强人们对中国观念、中国主张的兴趣、理解和认同,实现话语表达、叙事方式和传播效果的同步提升。

(三)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18]”。不同文明在相互交流、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实现共同进步,让世界文明在交流碰撞中闪烁更为耀眼的火花,让世界文明拼图板块集合出更为绚烂的图案。这是文明发展的必要途径。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丰富多彩的不同文明需要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多维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华文明就是在一贯对外文化交流中取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能量,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成为独一无二的连续文明。随着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步伐加快,各国文明的联系都更为紧密。中华文明要提高自己的传播力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就必须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让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出去”,让世界认识和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开辟一切可能的道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取精用宏,不断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

五、结语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长期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新的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明也需要更好地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作出中国贡献,引领人类文明正向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是一个宏观的战略命题,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传播进路提出了新的要求,任重道远,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行而不辍,我们要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国际上发出我们的声音,传达中国的文明观念,向全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
- [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 [3] 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1/31/c_1125516300.htm.
- [4] 王易,王凡.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重点任务及时代要求[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2.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71.
- [6] 刘笑伟.回顾与展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探析[J].军事文化研究,2022,(4):36.
- [7] 范玉刚.以弘扬文明共识理念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力[J].天津社会科学,2023,(2):6.
- [8] 李永强.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实践谈出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J].现代出版,2023,(1):16.
- [9] 简叶坤.“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逻辑及实践路径[J].传媒,2022,(7):59.
- [10] 曹学娜,王轶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J].奋

- 斗,2023,(4):29.
- [11]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news.cri.cn/20160219/9eea7c05-d3de-df82-d025-cb63afcd00a.html.
- [12] 黄楚新,陈玥彤.多维建构文化传播路径 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J].新闻论坛,2022,(6):9.
- [13] 陈可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三个维度[J].学术评论,2023,(1):9.
- [14] 周力.进一步加快对外文化交流的步伐[J].经济导刊,2023(1):50.
- [1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3.
- [16] 曹月娟,陈泓儒.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路径研究[J].新闻论坛,2023,(1):17.
- [17] 郭晓科,徐睿.中华文明赋能国际传播的逻辑进阶——二十大报告关于国际传播的重大理论创新.视听理论与实践,2023,(1):19.
- [18]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62.

【责任编辑：温开照】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探索

郭 媛, 卢楚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中国事业与全球事业, 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具有一致性。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加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增强全球政党治理效能提供中国智慧。但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加剧, 世界动荡不安,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完善等构成国际传播困境。新形势下必须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增强传播效率,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拓宽国际传播空间, 密切国际交往以增进国与国交流互信, 实现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以切实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 以人民为中心; 价值理念;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101-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随着实践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得到充分运用, 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 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不仅要求满足中国人民各方面需求, 而且要求关注世界人民整体利益, 协同各国共建更有利于人发展的美好世界。这一理念是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崭新理念, 将之进行广泛国际传播, 具有重大意义。此外, 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全世界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真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作为当代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 也必然要求将这一价值理念进行国际传播, 推动全球各国树立正确人民观。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中国政策方针对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前所未有的, 这为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极大机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正不断获得更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但是, 在传播实际过程中, 仍面临较大内外部挑战与困境, 阻碍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广泛传播, 影响了传播效果。新时代面对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困境, 更要不断适应时代变化,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增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

一、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国际传播的世界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是中国事业取得新进步

收稿日期: 2023-07-1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 (GD22XJY06)、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 (德育专项) 项目 (2021JKDY013)、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2022GXJK185)

作者简介: 郭媛 (1981-), 女, 汉族, 河南周口人,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心理发展; 卢楚婷 (1999-), 女, 汉族, 广东郁南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要武器,也为当前人类社会重新站在历史十字路口,面临人类向何处去做出了解答,为“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提供了努力方向。在这一发展理念引领下,全球发展必定能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世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将不断变为现实。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能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揭示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指明了世界事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在于使人能够真正成为人。而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是不断走向“真正共同体”,适应现阶段中国和世界发展状况的重要思想指引。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能够帮助各国形成价值共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人类共有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必须并且能够成为国际理念,增强各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世界人民都有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的需要,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各国寻求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忽略最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就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能够成为各国的价值共识,使各国发展注重人民的需要,为人成为真正的人提供条件。其次,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从世界整体利益出发,指引人类共同行动的价值观引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广阔空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国际普遍交往愈加频繁。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长,全球气候问题严重,地区局部战争频发。迫切要求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共同探寻应对全球危机,实现共存发展的方式。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能够推动各国将行动统一到为人民造福上来,从而集中各国智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既维护各国自身利益,又认识到本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同一性进而推动世界整体利益的实现。总的来说,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为全球应对当下和未来挑战,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指导,通过增进各国共识,积极探索

以人民为出发点的理论与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不断走向“真正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能够指引人类共同繁荣进步的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始终造福人民,是中国谋求自身发展的充满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中国方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疫情防控“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均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展现。将这一价值理念进行广泛国际传播是党深刻理解中国梦同各国人民梦想息息相通,将中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重要体现,彰显了党追求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在同一地球上实现幸福生活的博大胸怀。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球各国,能够为人类社会繁荣进步提供新方案,实现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首先,启示世界各国发展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步必然首先要求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因而,世界各国必须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谋求共同发展进步的道路。人民是全球发展的享有者。人民只有享受到发展进步带来的生活质量的真实改变,利益得到切实满足,才能真正激发全世界各国人民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因此,坚持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才能切实推动世界长期繁荣进步。其次,指明世界各国繁荣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世界人民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3]世界是由全球人民共同建设的,人民的主体性和创新性发挥程度决定着世界发展程度。面对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置身事外,必须发挥各国人民主体性和积极性,使之主动参与世界的建设发展,为繁荣全球发展提供动力源泉。总的来说,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为全球探寻共同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能够指导构建更和谐美丽的世界。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能够促进全球政党提高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行动不是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提出之后才有的,而是自党成立起,党便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作为谋求自身发展和带领国家事业进步的根本价值指引,“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4]也正是始终代表和追求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人民衷心拥护的党,成为历经百年发展依然风华正茂的党,并将得到长期稳定发展。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切实证明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正确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能够为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效能的提高贡献中国智慧。首先,政党治理应当把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放在首位。人民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成分,失去了人,则无所谓国家。执政党“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5]启示政党治理中,应当关照广大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能只关注少数人的利益。西方政党要实现更好的政党治理,增强治理效能并获得稳定发展,必须关照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其次,维护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人民享有切实的民主权利。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人民归根到底是世界的主体,必须尊重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并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落实到实处,在新时代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广泛且真实的实现。西方政党宣传“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在现实中实行的是形式民主,真实民主亟待落实,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为各国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世界人民美好生活将在各国政党的共同努力下将不断变为现实。

二、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现实困境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及其实践符合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望,是具有科学性、时代性特征的崭新思想,推动这一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能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但在实际国际传播中,仍存在亟待突破的现实难题,必须在充分把握传播困境基

础上,探求解决路径。

(一) 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严重影响国际传播广泛性

世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当今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进一步阻碍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进程。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同的人民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同,意识形态千差万别。在人民地位问题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主义,资本逻辑主导社会进程,关注的仅是少数群体利益,普通民众生存发展完全受制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坚持贯彻实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新时代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朝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持有极大差异性的人民观,从根本上造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其次,制度差异在新时代的表现尤为明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意识形态斗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多次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均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生动实践。而西方国家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忽视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影响,导致众多民众因疫情死亡,甚至为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面对中国疫情防控胜利,西方国家惧怕中国崛起和强大,诋毁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妨碍人民自由,损害“人权”,加大中国“威胁论”“崩溃论”错误论调传播,恶意诋毁中国国际形象,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国际传播造成更大障碍。总的来说,意识形态的差异阻碍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传播,将传播空间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也对全世界人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困境。

(二) 世界动荡不安破坏国际传播环境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

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7] 国际传播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需要的是稳定且持久的传播环境。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变局、大动荡的时期。尽管如今已进入后疫情时代,但近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演变,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和对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已然导致了人们的恐惧心理,造成对未来未知的不安全感。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性,地区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对和平安全的渴望更加强烈。生态危机、战争局势、激烈竞争不断影响着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人民对于生存发展的安全性需要尤为迫切,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先进思想的认识理解和接受有所忽略。表明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传播环境,不利于这一理念在大多数国家的形成和贯彻落实。因而,战争、危机等突发情况会损害国家传播链条的完整性,导致传播中断,最终影响传播有效性。总的来说,当前国际传播环境中的可变因素较多,世界的动荡不安严重破坏传播的氛围,要大力提升传播的效率和扩大传播范围,必须建设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

（三）国际传播力建设不完善制约传播效果

国际传播力建设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8] 突出了国际传播力的建设和完善方向,国际传播涉及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介体、传播客体等各方面,传播中把握各要素特征,充分考量各要素关系,才能实现思想内容的高质量传播。当前,国际传播力建设不完善的问题影响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进程。首先,国际传播体系不完善。传播主体、对象、客体、机制的整体构建需要不断优化,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进行国际传播提供完整的体系支撑。其次,传播主体能力不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传播主体扮演重要角色。传播主体能力不强体现在:对国际传播内容掌握理解不够,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具备的全球视野缺乏认识;对国际传播时机把握不够。传播好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未能及时抓住契机,难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传播主体话语表达方式未能适应传播对象国的实际,难以根据不同的民族话语风格和模式进行传播,直接导致传播效果低下。再次,国际传播手段单一。对中国理念的叙事方式、逻辑结构简单化,必然导致无法满足国际受众多元化的需求。最后,传播技术有待更新优化。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谁占领了网络阵地,谁就占据了宣传思想的优先地位。利用技术,加强思想的传导和灌输,是有待进一步拓展的领域。传播体系、传播主体、传播手段、传播技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效果。

三、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路径

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凝聚国际社会价值共识,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接受和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锲而不舍的耐心和努力。为突破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扩大这一价值理念传播影响范围,必须加快探索新的传播路径,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具备世界意义的理念造福全人类。

（一）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9]。表明了提高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和广泛性,离不开全方位全链条全过程的国际传播体系和国际传播力的提升。必须从传播主体、对象、话语和机制等方面实现传播体系的完善构建,对国际传播的话语表达、灌输过程、精准有效、辐射影响等方面进行充分考量,致力于打造目标明确、内容鲜明、传播精准的国际传播体系。首先,打造多元的传播主体,提高主体传播意识和阐释能力。明确不同主体同一目标,不同场域不同方法进行全方位传播。充分利用媒介宣传、专家学者宣讲、人文交流往来等推动国际传播。

大力培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阐释人才, 打造传播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生力军。其次, 明确价值观差异, 精准把握传播对象需求。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传播实效如何取决于受众者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因不同对象国具有意识形态差别, 要善于区分对象, 根据其特点, 以其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再次, 探索崭新的话语表达方式, 增强亲和力。国际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 要让外部受众准确地理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概念和内涵, 需要转换语言建构逻辑, 以当地喜闻乐见的话术来诠释重要概念和理论论断, 才能增强理论的亲和力。最后, 创新传播技术, 拓展网络传播渠道。互联网是人们生活重要部分, 占领网络话语主阵地, 有利于让各国人民与时俱进地了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增进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增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影响力。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宽国际传播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打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的创新理念,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10]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能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利于拓宽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空间。一方面,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实现广泛的国际传播, 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为依托。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家传播, 根本上的困境在于意识形态隔阂, 因而首先需要尽力地突破意识形态斗争困境, 切实为科学理念打造国际传播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强调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制度、文化差异的基础上, 寻求国际社会共存、发展的理念。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场域中进行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宣传, 有利于传播效果的切实增强。另一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关注的是世界人民整体利益, 以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任务的理念。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广泛树立, 最终使得以人民

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取国际认同的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实现。

（三）密切国际交往，增进国家间的了解与互信

中国对外宣传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是因为这一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理论原则, 更是因为它是适应人类社会发规律的思想理论。中国也不是要刻意传播这一观念, 而是实现世界的长远发展进步必须推动国际社会增进人民主体性的认识, 共同致力于实现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现实国际传播中, 中国承受着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压力, 部分西方国家既标榜自由又干涉他国内政, 既崇尚客观公正又违背事实制造谣言, 这一“双标”行为, 反映了背后利益主导的运行逻辑, 导致有些西方媒体不惜违背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和职业道德, 肆意发布臆造抹黑中国的报道, 损害中国国际形象。中国陷入“有话说不出”难题, 增强国际话语权亟待解决。因而, 在国家交往中, 必须探索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塑造好中国形象方面的崭新路径, 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打造新的条件, 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由中国智慧转化为全球共识。首先, 要加强国际交往, 增进各民族、各国相互了解, 推动全世界形成一个大联合。通过积极开展国家间的交流方面, 展示真实的中国, 帮助世界各国认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背后蕴含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理解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体现, 本质上增进人类福祉的思想与实践。其次, 推动国家间的精神往来, 加强思想共识。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同的成功经验, 是值得各国互相借鉴的思想内容。要加强国家间的互动交流, 互相学习对方先进的思想和方法, 实现共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作为各国之间的精神往来, 要争取在国际交往中加强对这一思想的交流, 形成价值共识。

（四）进一步推进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1]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是具有实践性特征的思想, 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理论。因而, 在现

实传播中,必须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传播,推动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统一。首先,传播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为引领的实践事实。中国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受众采用不同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疫情防控、抗洪防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人民立场,将其中生动形象的故事进行国际传播,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理解,也有利于回击对中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质疑。其次,继续积极推动为世界人民造福的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仅在国内的实践中得以体现,在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世界建立生命共同体,为全球人民生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的实践中也得以充分展现,其中包括中国积极承担的各项人道主义援助、为应对全球危机出谋划策的实践。中国继续推动为世界人民造福的实践,其实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国际社会真切体会到中国是具备全球眼光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关怀全世界人民的大党。从而增强世界人民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有更深刻的理论认同、思想认同以及情感认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 [2]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2021-7-7(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7.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0.
- [5] 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带头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N]. 人民日报,2019-12-28(1).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 [8]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M]. 人民日报,2021-6-2(1).
- [9]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M]. 人民日报,2021-6-2(1).
- [10] 颜军,王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5):36-45.
- [1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1).

【责任编辑:余伟】

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研究

黄 鹏, 梁辉荣, 袁 彪, 黄静瑜

(1, 4.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50; 2. 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 广东 广州 510100;
3. 中共茂名市委统战部,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瑰宝, 中华非遗既是中华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既是历史的, 更是现实的和未来的。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精神,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以文化交流为纽带,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强大力量, 做好统战工作,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年代, 如何打造非遗“流动的文脉, 传承的薪火”,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 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知识管理、创新创业、科技活化、文化保护、文化交流、产教融合等方面提出保护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促进世界文明传播互鉴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华文化; 华侨华人; 产教融合;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4-0107-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章节中强调“扎实推动文化振兴”。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赴广东考察调研时特别察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情况, 用言行表明国家支持非遗保护传承的坚定态度。2023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的贺信中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为非遗)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印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 强调“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博大精深的非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 非遗文化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姿

非遗在时代的长河中具有永恒的审美的魅力, 承载着历史的发展脉络, 承载着文化自信, 不仅是

收稿日期: 2023-08-16

基金项目: 中华职业教育社课题《岭南非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ZJS-FY-008)、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2021-33)、广州市社科规划十四五课题(2022GZGJ164)和广州工商学院横向课题《林栖三十六院非遗文创产品及销售电商平台研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鹏(1980-)男, 湖南资兴人, 广州工商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冷链产业学院书记、副院长,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高级职业指导师、副研究员, 中国知识产权学院客座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创新人才培养与产学研合作; 梁辉荣(1964-), 男, 广东河源人, 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袁彪(1970-), 女, 广东茂名市人, 中共茂名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 黄静瑜(1987-), 女, 广东普宁人, 广州工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 社会学硕士。

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更是人类文明的“活态”延续。中华非遗既是世界古老文化的瑰宝,也给世界文化增添绚丽多姿的中华色彩。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体现出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海内外中华儿女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非遗文化以其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姿。比如,传统技艺中的中国剪纸、刺绣、陶瓷制作等,以及表演艺术中的京剧、评弹、脸谱变化等,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和独特的审美魅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非遗项目在不同地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比如,苏绣代表了江南地区的绣艺传统,皮影戏则是北方地区的独特表演形式。这些差异多样化的非遗,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内涵。

（二）非遗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根脉

中华非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主要以人为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审美、经济价值。它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中华非遗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未来的。它承载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寄托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于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非遗文化及其保护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历史和现实必然性。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文化治理及其能力建设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文化治理起到中流砥

柱的作用,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过程中给予了国家治理更多中国特色的政策研究选择。

加强非遗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的必然要求。不断挖掘非遗溯源并加强保护与传承,有利于增进国际交流。应以“敬畏传统、尊重发展、保持本真、适度开发”为原则,在非遗的申报传承和保护利用方面“落地开花”。立足当代国际学术发展的前沿,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跨学科、多领域的视角,对非遗传承保护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予以充分发掘和全面探讨。

三、非遗目前传播情况和存在问题

（一）国内情况

自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以来,中国的非遗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保护传承形成新的气象和格局。各级政府对非遗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各类非遗数量逐渐增多,对人才需求不断加大。中国设有文化遗产专业方向的高校已超30所,为非遗培养了重要人才。但是学科建设多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艺术设计等专业基础上改造、和调整,开设的多是相关方向,缺乏专业整体的顶层设计,存在定位不够明确、人才培养方案不够系统、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不够专业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非遗发展的要求。

（二）国外情况

非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有力见证,承载着人类社会的多元文明。非遗保护问题已逐渐成为世界性课题。1937年美国西北大学最早设置“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已有近百所大学以专业教育方式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构成了专业化、层次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世界范围,设立文化遗产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1]。这些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保护机构、民众教育普及机构和众多遗产项目、民间组织,相关宣传、推广、文化、旅游等领域,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庞大系统。法国、韩国等国家还建立了文化遗产大学。多视角、

多方位地了解,有助于中国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升非遗的保护水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面对生活环境的变迁、多元文化的冲击,很多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一些非遗项目面临失传的危机。例如,广州灰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已成为广州花都乃至广东地区的文化名片和文化品牌,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但传统建筑行业在现代趋于式微,灰塑发展受到影响。另外,非遗的传承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但传统的家庭式传承、师徒制等口传心授的培养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相对而言,非遗文化传播受众小、传播速度慢、传播形式单一,也需要新媒体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便捷渠道^[2]。供需矛盾成为制约中国非遗事业发展的瓶颈,必须从发展的、战略的角度加以解决。

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累计覆盖人群达到 7.1 万人次。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达 40 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非遗曲艺周、中国非遗博览会等活动形式新颖、影响广泛。“一带一路”倡议为非遗的海外交流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悠久的历史、多样的民族、广袤的地域使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非遗,舞龙舞狮、赛龙舟、粤曲艺术、

潮汕功夫茶等享誉海内外。但面对生活环境的变迁、多元文化的冲击,传统技艺的学习耗时良久,难以以为从业者赢得体面的收入与社会地位……。长久流传下来的文化精粹,如果青少年接触和感兴趣的少,大批优秀的非遗将很难让大众感知,甚至濒临消亡。如何开展非遗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新时代非遗保护及传播的路径

(一) 以知识管理为核心, 铸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是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加强非遗保护。以系统科学指导非遗传承保护的“自组织、自适应”系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促进高质量保护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附则中提到了“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制定”。可参照英国等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做法,适度加强地方立法以保护各地的非遗。将加强非遗保护工作融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讲好非遗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广大公民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彰显其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遗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将非遗保护与

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保护、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发动全民参与,让青少年从小了解和学习非遗,通过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等推广非遗的相关知识;在成年人中间培养专业化队伍,创新非遗保护方式,充分利用各种博物馆、文化馆等场所以让全民参与其中。培养全民非遗保护的意识,保障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二是完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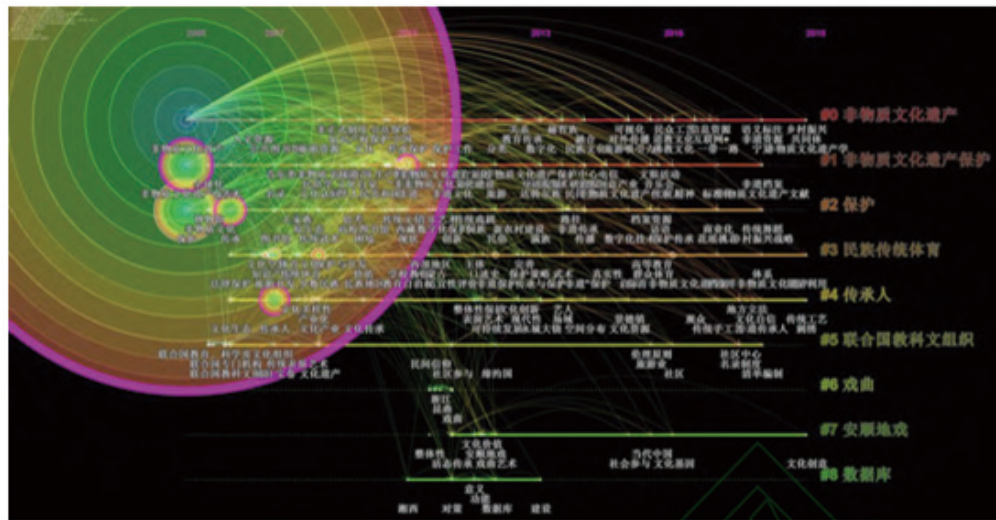


图1 2003年至2023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业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标准化和大数据平台建设。落实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遗传承发展,探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新思路、新途径,广泛开展非遗相关培训、展览、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供给主体多元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满足群众对公共服务的优质化要求。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整合数字文化资源,推进“互联网+公共服务”,搭建大数据、智能化平台,提高服务的丰富性、便利性。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完善非遗生态保护机制,坚持“科学保护,提高能力,弘扬价值,发展振兴”的工作思路,着力保护传承实践、传承能力和传承环境,不断提升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水平。加强专业化、区域性非遗展示展演,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在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组织丰富多彩的宣传展示活动,注意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注重专有性和实用性。

(二) 以商业应用为驱动,推进双创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文创IP为动力,促进非遗文创产业发展。在对非遗充分尊重、传承其本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将实用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巧妙设计绿色、低碳、环保、精致的非遗文创产品,紧贴时代步伐,满足市场需求。打造IP化发展是丰富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产业化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创意产业把非遗激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非遗现代化成果的产权保护,注重其经济效益和实用性。比如广州正打造“中国非遗第一展”,通过非遗项目基地与产品、演艺、直播、文旅等结合,线上线下等多种手段和云平台展示、电商交易等组成立体化系统,形成文创产业价值链生态体系,助推“文化遗产”变成“文化财产”,“文化资源”变成“文化资产”。针对非遗项目的不同特性,进行现代化的文创衍生品、手绘和插画等多种产品化开发,促进非遗消费的新形态、新业态更加多元与丰富^[3]。将非遗与其他产业结合起来并有效传播、推广,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攻坚克难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二是以特色集群为亮点,形成产业价值生态。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为文化建设和

旅游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努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研究制定扶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实施文化和旅游“创客行动”,努力构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加快培育新型业态,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推进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促进旅游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抓手促进就业创业,以品牌建设为重点,推出更多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促进非遗融入特色景区、度假区,在各大机场和高铁站、高端会展中心、免税店等建设非遗特色交易厅或专柜。三是以内外循环为支撑,线上线下促使消费升温。把追求经济利益与非遗保护结合起来能够推动非遗的传承与繁荣,从而使其成为著名品牌而经久不衰。促进特色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推出更多优秀的工艺美术、演艺、娱乐、节庆、展览等传统文化元素产品,开发高质量的动漫、网络音乐、数字艺术等新型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文化供给。通过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使非遗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 以科技升维为助力,实现虚拟现实交互

一是加强数字化保护,发挥传统技艺的独特作用。建立有效的电子平台和相应的数据库非常有必要,现代化手段的运用为民众构建了一个认知非遗的环境空间,对民众进行知识和文化普及有利于非遗的保存与传播。结合电影、音乐、科技以及创意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系统记录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促进资源的挖掘整合和共建共享。把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建设线上线下结合的非遗馆、传承体验中心。让非遗注入现代元素,通过让人民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方式保护非遗,增强非遗个性特色,创建优秀非遗品牌。二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古老非遗相结合,与时俱进、交相辉映。5G将人与人的连接,拓展到万物互联,是新时代智慧社区的基石。5G+VR/MR(虚拟现实、混合现实)促进非遗文创产业“活化”与产业化,破解转化周期长、形式单一、人才稀缺等瓶颈,促进创新性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5G也是智慧城市发展的新引擎,5G+ABCDE,即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

大数据、边缘计算,将开启智慧新时代。通过AI技术与非遗传播相结合,利用VR/AR/MR技术虚实融合,将宝贵的非遗发扬光大。借助新兴科技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入相关软硬件及平台,通过合作研发科学的智慧系统、科技产品及场景应用,传承+创新撬动非遗文创产业千亿级市场。比如以国家级非遗集群和全球跨境电商研究院平台切入,在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融创文旅城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合作建立“VR/MR+岭南非遗”体验馆。5G+VR/MR的非遗传承“活化”,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相互辉映,将有力促进非遗集群文创产业的经济社会效益。三是推动非遗项目“活化”活力,助力科技升维、融合创新。利用数字化矩阵集中呈现传统文化“非遗”+现代科技“数字孪生”,促进非遗的活化传承。通过VR/MR、区块链等技术在非遗文创产业领域的融合创新,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智慧空间场景的转换,向单元、多维、立体化场景空间发展。借助“非遗+互动体验展示”“非遗+科普教育”“非遗+设计”“非遗+跨界对接会”等板块,通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展示、互动体验和科教项目展演,用数字创意形式展示非遗文化和资源,打造创新型非遗体验,促进文创产业的创新升级。通过非遗项目基地与视频、数字音乐、演艺、直播等结合的线上线下手段,通过云平台和展示、电商、交易等立体化系统,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效益。通过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团队立足MR协同创新中心,依托于广州首家5G高校(广州工商学院)和5G产教融合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武大中国产学研合作中心),携手MR领军企业——上海影创(国内第一,世界前三)等战略合作,共同打造虚实交互、产教融合的非遗文创“活化”平台。拥有知识管理系统、MR、工艺设计等14项专利(含2项发明专利),获中国技能大赛VR国赛一等奖。以广州灰塑等国家级非遗切入,产品线覆盖岭南非遗展示博物馆(VR/MR全息)、非遗衍生品(创新产品)集市、直播(工艺品电商、培训、活动)、投融资运作等。科技升维、融合创新,实现智慧场景的转换,向多维、数字化、立体化场景空间发展。

(四) 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凝聚团结海外侨胞

一是营造开放、公共、互动的国际环境氛围和

对话交流机制。不同思想的碰撞和多元文化的交融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人文基础。而非遗在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之一。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非遗领域的合作,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非遗交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促进非遗产品和服务出口。推出非遗主题的影视剧、纪录片、宣传片、舞台剧、短视频等优秀作品。通过中外人文交流活动等形式,交流非遗保护先进经验,向国际社会宣介我国非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加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力度。文化自身具有整体性,体现以文化圈带链为特征的各种生态包括自然、人文、社会生态等综合因素。非遗中往往蕴含着天文、地理、人文、历史、饮食、节日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其中折射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及华裔青少年,要阐释展示好中华非遗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因地因时因人制宜,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东方审美思维方式的培养。搭建非遗研究平台,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非遗传承保护实验平台,加强国际文化专家队伍建设和中外智库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五) 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厚植非遗人才基础

一是建立产教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机制。走访调研非遗文创区域发展和相关产业链,了解项目现状和非遗传承人诉求,发挥产业、教育的各自优势,重视青少年非遗传承保护意识的建立,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非遗传承人群。运用“采于民间、研于课堂、创于展艺、兴于社会”的方式,将传统非遗传承相对零散、单一的培养方式转变为现代化、系统化的专业教育,探索非遗传承与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建设的产教融合的新模式。理论实践相结合,让高校的现代创意设计与地方的传统技艺的“思维碰撞”,利用艺术设计工作室、网络文化工作室,进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活动,助推非遗的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同步呈现。鼓励开

展“非遗在社区”“非遗进校园”活动,校企共建大师工作坊、传承人工作室,梯度化申报非遗传承人;二是深化非遗在人才培养中的广度和深度。探索将非遗传承贯穿于国民教育序列,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将非遗传承保护内容纳入学校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非遗类专业,拓展非遗讲座和课程(公选课、通识课);创建非遗传承基地和教育实践基地,推行现代“大师工作室制”,发展“大师带徒+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加强非遗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编写非遗通识教育读本和专业教材,吸引学生加入非遗事业中来,为非遗培养更多优秀传承人。三是政产学研用合作建立健全非遗人才“成长链”。大力推进政、产、学、研、用合作,建设非遗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加大非遗师资队伍培养力度,在教育培训、活动策划、文化传承、品牌打造等助力培养非遗传承人的梯队建设。充分利用非遗传承的人力资源,组建非遗专业委员会和非遗教育联盟,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和教学科研,做好非遗人才的“传、帮、带”,提升保护质量和价值效率。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相关产业、消费市场信息,探讨非遗人才培养的文化内涵、结构维度、形成因素和发展方向,注意培养既懂文化艺术又懂数字化技术,既具备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思维兼具的复合型非遗人才。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民族的延续,没有文化的昌盛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中华非遗展现地域特色、文化基因和历史文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纽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大力弘扬中华非遗,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 ①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EB/OL]. 党建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4475671938182725&wfr=spider&for=pc>.

参考文献:

- [1] 曹德明.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启示(全4卷)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05-01.
- [2] 李勇, 杨思敏, 管慧等. 新媒体非遗跨文化传播效果分析——以 YouTube 平台为例 [J/OL]. 图书馆论坛, 2023-09:1-13.
- [3] 雷茜. 新消费背景下中国非遗产业创新架构研究 [D]. 西安美术学院, 2023. DOI:10.27399/d.cnki.gxamx.2022.000103.
- [4] 韩美群, 周小芹. 近二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研究回顾与展望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2(01):65-74+184.
- [5] 张勃. 新文科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从高校使命担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耦合关系谈起 [J]. 文化遗产, 2021(04):8-19.

【责任编辑:陈童敏】